

輯六第書叢論公

由自論

6

編社論公



#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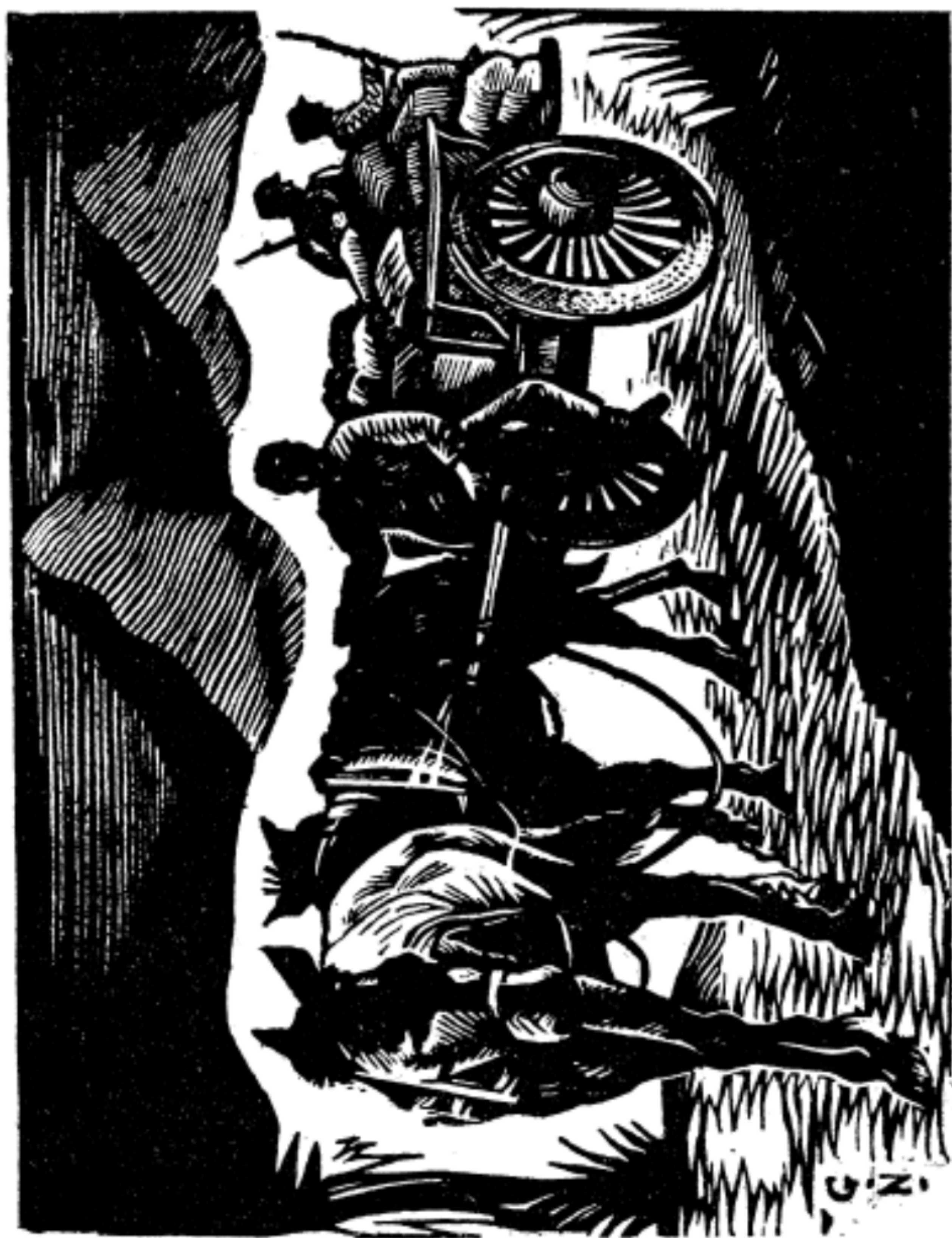
汪精衛的總清算	嚴北溟(一)
五中全會之面面觀	W 莉(一八)
中日在美之宣傳戰	金瑜譯(三二)
蘇聯怎樣尊下建國的基石?	白芒譯(四三)
斯大林與紅軍	蘇聯·伏羅希洛夫·金人譯(七七)
五中全會閉會詞	蔣委員長(九八)
法國達拉第政府的危機	華 崗(一一三)
建立地方報紙和敵後報紙	馮英子(一一八)
意教士間諜案破獲經過與真相(新華日報通訊)	(一二四)
文藝的通俗化問題	梓 年(一三〇)
論自由	一 夫(一三四)
民衆運動論	吳大琨(一五〇)
十九世紀的歷史	曜 譯(一五六)
關於知行問題之研究	陳伯達(一六五)
不知名的軍隊	林 珏(一七七)
編後記	編 者(一八六)



總動員

沃渣作





建 卷 作

轡 重 車

# 汪精衛的總清算

嚴北溟

——轉載浙江潮——

## 一 新年的禮炮

今天是民國二十八年的第二天。在今天，我們大家看到報紙上登載了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就是汪精衛被中央永遠開除黨籍了！這件事發生於二十八年的元旦，發生於我們抗戰十八個月後的今日，它是慶祝新年勝利的第一個禮炮，它是這十八個月來流了無數中華優秀兒女鮮血所換來的代價，它是我中央堅決執行抗戰國策對一切妥協投降份子最有力的教訓。這是怎樣值得我們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同胞之興奮感動而熱烈擁護的一回事啊！

同志們！現在誰也清楚地看到：血的鬥爭已勝利地結束了。民國二十七年，隨着二十八年新歲的到來，中國抗戰局面在各方面都呈現出嶄新而進步的姿態。這裏，由於我國抗戰的堅決持續，由於日寇對華獨占的日益專橫，推動了整個國際形勢由猶豫動搖的狀態走到積極援華一致反日的道路；由於十八個月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由於全國人民一致的覺醒與努力，國內政治愈益走上精誠團結實現民主與普遍動員民衆的正軌；由於日寇物力軍力的大量損耗，國內矛盾的深化，和由於我國抗戰新力量的不斷生長與壯大，敵後方廣泛游擊戰的展開，與運動戰略的運用，使敵人在佔領武漢以後，繼續進攻的威力呈顯出衰頹無力的徵候，以致兩個月來，整個戰局顯出停滯狀態。配合以上國際國



內和敵國三種因素的作用，我們的抗戰在一年半的艱苦支持之下，已渡過了第一階段的敵進我退局面，開始進入第二階段的相持局面，抗戰的前途已閃耀着無限樂觀勝利的光輝。

不料正在舉國上下一致慶賀這樣一個勝利的新年關頭，汪精衛竟會不顧全國人民的唾棄，厚顏無恥的大倡其對日寇投降妥協的謬論。當他這一謬論在國內遭受各方嚴重的打擊以後，他竟擅離職守，潛逃出國，並在香港發出向中央「建議和平」之荒謬絕倫的豔電。所幸中央國策不渝，乾綱獨斷，已將「通敵求降危害黨國」的罪狀插在汪精衛的頭上而給他永遠開除黨籍了。這是抗戰血史上肅清內部奸逆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 二 所謂「豔電」

大家在報紙上可以看到汪精衛那悖謬無恥的豔電。在該電中首先一點就提出向日寇投降乞和的主張：「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一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之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照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為根基，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這一段話可說一字不移地照抄了日寇近衛文磨的鬼話。我們看了這段話，幾乎弄不清楚汪精衛是不是近衛文磨的化身，或者他的代言人。照汪精衛的說法，似乎日寇十八個月來的瘋狂侵略，強占中國土地，屠殺中國人民，都祇是為着「善鄰友好」，都祇是要「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循汪精衛這一錯亂荒誕的論調，那麼，不僅是蘆溝橋事變以來，我們十八個月的抗戰是庸人自擾，甚至「九一八」以來八年中敵寇對我血腥的侵略也是



子虛烏有了。已往的歷史很明白的教訓了我們：八年以前，敵人曾經大喊着日華親善，保持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然而瀋陽城遭了劫，北大營起了火，「九一八」以後，敵人仍舊花言巧語地聲明無領土野心，然而遼吉黑變了顏色；敵人佔領了東三省以後，仍喊着在錦州建立緩衝區，而同時牠的鐵蹄却已踏進了長城。例子真是說不盡許多，五年來我們的領土不斷的在日寇甜蜜的辭令之下喪失了，我們的國難也日益深重了，這樣纔逼得中國出於最後一戰以求民族的生存。到今天，當中華民族解放戰爭已從血路中殺出一條光明的坦途而漸近最後勝利的時候，竟不料汪精衛的喪心病狂，還會相信侵略者那一套妖言鬼語，處處爲敵人曲意文飾，不惜顛倒黑白，淆亂人心。這與其說汪精衛想藉此欺騙國人，毋寧說汪精衛以此表示自己賣身投靠的誠款，想邀得日寇主子的寵愛！

汪精衛電建議的第二點，是實行廣田三原則之一的共同防共：「以日德意防共協定的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這一點，八年來的歷史也充分教訓了我們：敵人雖然一貫的大喊反共，然而我們並沒有看見他胆敢擾亂社會主義蘇聯的觸鬚，而中國却飽受了敵人侵略蹂躪的創傷。蔣委員長說得很明白：「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者，目的不在防共，也不在防俄，而實在借此名義以亡華。」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語。不僅這樣，我們今天當前唯一的危難是日寇的侵略，當前唯一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這需要我們全民族不分黨派，不分階層，不分職業，不分宗教，一致爲抵禦外侮而精誠團結，凡是抗日的都是共患難同生死的兄弟。因此，我們也就根本沒有防共的必要。蔣委員長十二月廿六日在重慶紀念週訓話：「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我個人可以說，他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文化，以至於外交，這一點便是七七抗戰以前他歷來要求不遂而懷恨的一個主因。我們因爲不願上他的圈套，寧使忍受着千辛萬苦，到了最後關頭，寧願舉國犧牲來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汪精衛看不清這點，到今天還來舊事重提，主張和敵寇締結防共



協定，他妄想倒轉歷史的車輪，他妄想抹殺這一年半以來我們正因為不陷敵人圈套（防共協定）而奮鬥所流的鮮血，他妄想中國仍走上法西斯強盜集團那一亡國的外交路線。這不是汪精衛的糊塗昏聩，看不清時代的演變，就是他故意為敵寇張目，以欺騙同胞出賣祖國為快。然而無恥的汪精衛，告訴你吧！中國在盧溝橋事變以前，不加入防共協定，不走這樣一條亡國的外交路線，今後永遠也不會加入了！永遠也不會走這一路線了！而且中國抗戰在本質上是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的神聖戰爭，今後還必然要給全世界所有法西斯侵略強盜以無情的痛擊，讓一切主張日德意外交路線的漢奸們大時代車輪下碾成糞粉！

汪精衛第三點的建議，是中日經濟提攜，這一點也是過去廣田三原則之一，而為我全國人民所堅決反對的。中國在互惠平等的根本原則之下，本來不拒絕與任何國家實行經濟提攜，然而日本的所謂經濟提攜，不僅是貫徹他「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政策，從經濟上榨取中國滅亡中國的陰謀，並且是從政治上破壞中國秩序，妨害中國主權的毒計。過去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日本的具體要求也說明了這一點，這是中國所萬不能接受的。

汪精衛的荒謬無恥，還不止此。他最後一點還建議實施奴化教育，主張中國「今後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換一句話說，不僅中國應成為日本殖民地，不僅中國人應當成為日本的順民，並且更要從文化上泯滅後一代的天良，使子子孫孫俯首帖耳永遠做敵寇的奴隸。汪精衛的祖宗地下有靈，也當放聲一哭吧！

汪精衛曾經是動搖妥協的份子，後來是公開的親日派，現在呢？他賣身做狗，通敵求和，危害黨國的真面目更是澈底暴露了！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漢奸，有秦檜、吳三桂、洪承疇之流，現在我們的「汪先生」竟和他們一同遺臭萬年了！



### 三 照妖鏡下的汪精衛

汪精衛過去曾經有過光榮的革命歷史，在黨國有崇高的地位，到了晚年竟悍然走到漢奸賣國賊的末路，也許有很多人會覺得奇怪吧！其實事情有因有果，汪精衛走到今天公開叛賣黨國的結果，是有其必然性的。這可從三方面去考察：第一是汪精衛的本質，第二是汪精衛的歷史估價，第三是汪精衛的錯誤理論。

先從汪精衛的本質說起。

正因為汪精衛曾經有過光榮的革命歷史，在黨國有崇高的地位，他是一個滔滔雄辯的演說家，他會說漂亮話，會寫漂亮文章，還生成一副很漂亮的面孔，雖老而風韻猶存，他混在革命和抗戰陣線內，誰也看不清他的狐狸尾巴。因了這些，「汪先生」三字在一般人腦中過去確會發生過很良好的作用。然而這祇是一般現象上的表示，汪精衛的本質全不是這樣。

汪精衛的本質是怎樣呢？這可以從汪精衛所代表的社會階級意識說起。目前中國正是由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過渡到自由獨立幸福的新中國之轉形期，而汪精衛就代表了這一轉形期內的三種極墮落的人格，分開來說，他代表（一）半封建社會之沒落的士大夫階級，（二）半殖民地社會之反動的買辦階級，（三）抗戰期內的一切親日妥協份子。這三種人格的綜合化，就出現了今日的汪精衛。

就第一點說，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歷來有一種士大夫階級，因為它經濟基礎的動搖不定，本不能算稱一階級，但這種人在意識形態上確構成另一類型，而立場的動搖不定，以鑽營投機升官發財為整個的人生觀，却是這類人最普遍的特色。在中國封建社會崩潰解體的過程中，此種士大夫階級是沒落了，然而其中得意的一部份却形成了極腐敗的



官僚資產階級，代表一切封建殘餘勢力在政治上作最後生存的掙扎。汪精衛就是這種官僚資產階級的最好代表人。因爲士大夫階級本質上的那種動搖性，決定了他在意識上也是動搖的。總理在日，早在致蔣委員長的手書中說精衛非履艱任鉅之才；而病榻彌留，且曾沉痛說出：「怕的是敵人會來軟化你們。」這是因爲深悉汪精衛的個性，纔有此針對他警惕的遺言。中宣部政治部共同發表的宣言中說得更明白：「汪先生此次行動，在他個人不無原因。過去汪先生在革命過程中，時而表示堅決，時而表現動搖。」正因爲汪精衛是這樣一個易「軟化」而動搖的人，所以他過去雖也會「悲歌燕市」的去炸攝政王，而辛亥革命時倒又反對總理，主張與袁世凱妥協；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汪精衛極力反對總理的「三大政策」，十六年滬漢分裂時，倒又與共產黨聯合反對南京中央政府。其餘如廣州異動，擴大會議等，時而出山，時而稱病，時而出國，數不盡覆雨翻雲極變幻之能事，而賣友求榮，倒是他一貫的拿手好戲。他最近走到極端的漢奸賣國賊的窮途，在程度上雖有深淺之分，在本質上則是他士大夫階級意識——投機善變自私自利之一貫表現，是無足奇異的。

就第二點說，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中國民族資本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踐踏之下，自始就沒有遂其正常之發展，而不能不帶着一種原始的買辦性，形成了在半殖民地社會畸形發展的一部份買辦資產階級。此種買辦資產階級祇有在帝國主義羽翼之下纔能存在與發展，因而他不能不和帝國主義者一鼻孔出氣，也因而自始至終希望和帝國主義妥協勾結而不願進行堅決反帝的鬥爭。帝國主義者最怕的，是所謂「赤化」，買辦資產階級所最怕的同樣也是「赤化」。此種人因爲看到抗戰與本身階級利益的矛盾，常常一口咬定，認爲抗戰只是赤色份子鬧出來的亂子，「國民黨上了共產黨的當」，「將來打勝了，也是共產黨人的天下」，而與其鬧到這樣結果就不如早日停戰，或率性加入防共集團，對內再來一次「剿共」運動，還可保全本階級的利益；至於國家民族是否不因此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那倒是不必關心的事。汪精衛的通電講和，主張和日本締訂防共協定，就是這種心理的充分表現，也是他意識上澈底代表中國最反動的買辦資產階級之明顯例證。

就第三點說，此次中國抗戰的目的，對內在解除數千年封建奴役的命運，對外在掙脫近百年來帝國主義侵略的枷鎖，而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轉變為自由獨立幸福的新中國社會。這一任務是異常艱鉅的，然而也必然會成功的；這是歷史空前偉大的戰爭，也是中華民族最後一次的解放戰爭。在這樣一個歷史飛躍與社會大突變期中，於是有些人怔住了，模糊了，迷惘了，他們看不清時代的正確動向，抗戰的光明前途；他們認為最後勝利不過是一句空話，而與其長此打下去，結果還是失敗，倒不如及早投降的好。唯武器論者，亡國論者，民族失敗主義者，都屬於這一派人，而汪精衛就是這一派人的代表。

綜合上面三點，沒落的士大夫階級之特性是動搖，反動的買辦階級之特性是妥協，而一切親日妥協份子的特性是渴望投降。汪精衛在本質上代表了這三重人格，所以他是一個動搖妥協投降的小人，而結果變成了漢奸。

再從歷史上來估價，有許多人誤會了以為汪精衛最初是革命的，他是 總理的忠實信徒，其實這是不對的。民元以後，汪精衛所過的，全部是縱橫捭闔的政客生涯，除官運亨通外，並無特殊革命功績可言。在他一生中如果有一件事還值得我們青年敬佩的話，那就是拿炸彈去炸攝政王一個軼事。然而我們應該知道，革命是理智的，不是徒憑感情氣憤所能濟事。當時滿清專制王朝的存在是有其數千年的封建基礎的，正確的革命策略和路線，應該如 總理當時那樣，從宣傳組織運動着手，而決不是一個炸彈，打死一兩個旗人所能濟事的。蘇子瞻、張良、博浪椎、秦皇是匹夫匹婦之勇，就是這個道理。差幸汪精衛當時是一個年輕的俊俏書生，邀得慈禧太后的垂憐，饒了他的性命，不然，汪精衛的革命生涯，不早就斷送了嗎？因此，汪精衛的行刺攝政王，其志固可嘉，其方式殊不足取。這祇是一種輕浮的感情衝動，一



種痛快主義的發揮，換言之，就是患了左傾幼稚病。我們知道，凡是易患左傾幼稚病的人，必然也最易患右傾糊塗病，譬如杜洛斯基的談革命，表面上比列寧斯達林還要左傾徹底，然而他現在右傾到做國際法西斯的偵探匪徒。汪精衛左傾的時候，能够憑着青年一鼓的熱忱，高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能够憑着一時的追求時髦，高喚「革命的向左轉，不革命的滾開去」。然而前面說過了，辛亥革命的時候，反對總理貫徹革命主張號召與北洋軍閥袁世凱實行妥協的，不是別人，恰是汪精衛；十三年國民黨實行改組，又倡議反對總理「三大政策」的，不是別人，恰是汪精衛；九一八以後，一貫地執行對日妥協投降的路線，舉如淞滬協定的簽訂，塘沽協定的訂立，又無一而不是汪精衛在他承乏政院兼長外交任內的有名傑作。到了「七七」抗戰爆發以後，汪精衛更是國內和平妥協份子的老大哥，秉承了日本主子的意旨，當每次抗戰遭受部份挫折或小有勝利的時機，即進行對日投降的煽動。所以汪精衛過去的歷史，全部是一個典型的投機份子的歷史，汪精衛的沒落，正說明一切腐化投機的官僚政客者的沒落。在抗戰大熔爐中，今天汪精衛之走到漢奸賣國賊的末路，難道不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嗎？

最後從汪精衛的抗戰理論上來看。遠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以後，他提出了「長期抵抗」的口號，所謂「長期抵抗」就是不抵抗政策的代名詞，只是不好公開說出不抵抗的話來，所以講出這樣一個美妙的名詞來欺騙人民。汪精衛的理論就是最善於用這樣漂亮堂皇的幌子來掩蔽其亡國理論的真面目。到了今天，我們全國上下一體，真正實行長期抵抗了，汪精衛卻又來反對抗戰到底，主張中途講和，「長期抵抗」的狐狸尾巴已原形畢現了。

到了抗戰爆發以後，汪精衛又提出了抗戰犧牲論的理論。他認為中國根本是不能抵抗日本的，抗戰的結果，只是中國全部犧牲，「犧牲到不剩一個人，不留一寸土，纔是抗戰目的的達到。」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提倡抗戰要有犧牲精神，沒有甚麼不對，然而汪精衛明明說出一「犧牲是抗戰的目的，」他不知我們抗戰的目的是生存而不是犧牲，我



們是要在死裏求生的，汪精衛祇看到死，沒有看到生，他不獨看不到中華民族可能在這次抗戰中求得永生，而且日本軍閥統治壓迫下大多數的人民也會要在這次戰爭中因革命而翻身的，他是更看不到了，無怪他要更進一步地認定中日戰爭的結果，祇是「兩敗俱傷」，祇是「同歸於盡」。照汪精衛的看法，抗戰的結果既祇有犧牲，那根本就不需要抵抗，然而所以發生抗戰者，祇是因為日本侵略的加緊，不犧牲也是亡，不如拚着犧牲再亡來得痛快些。這樣，我們偉大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也就成了一時痛快主義的發揮，變成了賭博性的孤注一擲。這種理論不僅否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甚至根本否定了抗戰勝利的可能。這樣，汪精衛在理論上，實在是百分之百地偷運了日寇漢奸的亡國理論，是道地的日本貨！

不僅這樣，他最初還高喊其「焦土抗戰」的口號，以為中國抗戰應當把所有一切化為焦土，使敵寇無所收穫，這樣去消極的打擊敵人。這點從表面上看，也似乎汪精衛是個很高明的民族革命戰略家，然而汪精衛的用意却是別有所在的，透澈的說，他想用這種方法來動搖一部份有資產的人，增加他們對抗戰的恐懼心理，才好從各方面來破壞抗戰。我們應該指出：焦土抗戰與堅壁清野是同樣的意義，在原則上本是對的，它的目標是困擾敵人，利用焦土的办法，使敵人保身不住，換句話說，用焦土來保全其餘的國土，用焦土來爭取最後的勝利。但是汪精衛却片面地強調了「焦土」的意義，把焦土政策曲解為「人與地俱成灰燼，直到中國沒有一個人一寸土」這樣來增加人民對抗戰的恐怖心，以遂行其破壞陰謀。

汪先生變幻真多，在武漢失守長沙大火以後，他又轉過來反對焦土抗戰了，長沙大火正如當局所宣示的：把準備行動的命令誤解為實際行動的命令，其過咎是應該歸當地軍政當局負責的，而決不是「焦土抗戰」在戰略上本身的錯誤。在土地失守以前，實行焦土，避免物力資敵，這一個原則却是絕對正確的。汪精衛抓住了湖南地方當局的弱點，



對焦土抗戰大肆其抨擊，這正表現出他懼怕犧牲渴望投降的鬼胎。在這裏可以看出汪精衛過去的主張「焦土抗戰」，和最近的反對「焦土抗戰」並不是他前後判若二人，而是他反對抗戰破壞抗戰之潛意識的一貫反映。

第四點是他對游擊戰的反對，他在不久以前曾經發表一篇文章，叫做「全面戰爭」，否定了游擊戰的意義，斥為流寇行動。同時故意強調敵人對於點線佔領的作用，說敵人一定可由點線的佔領，控制全面，並進而達到全面的佔領，因此游擊戰爭是不中用的，我們一定要運用正規戰去和敵人做爭取點線的工作。這一理論的錯誤在那裏呢？中國目前因兵器武備還趕不上敵人，還不利和敵人作單純正規戰的死拚，而需要配合廣泛的游擊戰，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十八個月來抗戰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游擊戰對我們的抗戰是有決定意義的，並且已經發展到使敵人日夜焦慮苦惱的嚴重程度。汪精衛之反對平面的游擊戰，肯定中國只有點線爭奪的正規戰纔可以制勝敵人，事實上就無異說不獨點線應讓敵人佔領，就連廣大的平面也應拱手奉送敵人，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應俯首帖耳地做日本人的牛馬。這是何等陰毒的漢奸論調！無奈游擊戰在第二期抗戰中已日增其重要性，最近軍事最高當局已將所有淪陷區在名義上一律改為游擊區，就是明證。汪精衛的企圖中傷抗戰，想替日寇解除苦惱，祇是心勞日拙而已！

第五是他最近對海通社記者的談話，聲明中國自始至終未關閉調停之門。這更顯明的在替日寇代言了。蔣委員長在抗戰初起的時候，就已經以最堅決的語氣封閉調停門戶：「中途妥協便是滅亡」；而汪精衛倒隨時想打開這條滅亡之門，現出他和領袖言論不一致的地方；因為他忝居副總裁的地位，無異領袖的股肱，過去確有許多誤解他的言論可以代表領袖，代表中央，現在汪精衛的漢奸原形畢現，總算給人以真相大白了。

所以從理論上看，汪精衛一貫是漢奸理論的散播者。今天汪精衛走到公開賣國的階段，也是有其理論的根據的。根據以上本質、歷史估價，和錯誤理論三方面的分析，充分說明了汪精衛做漢奸的來龍去脈，決不是偶然的。循汪



精衛漢奸路線的發展，是可能進一步去做敵寇御用下的傀儡，和溥儀王克敏梁鴻志輩合流的。然而這祇不過表示汪精衛走進墳墓的愈快而已！

#### 四 汪精衛開除黨籍與抗戰前途

照上看來，汪精衛的永遠開除黨籍，是有着以下幾點最重大的意義，對抗戰前途都是有極良好的影響的：

第一是表現國民黨的偉大進步。許多反動腐化的份子，要想最有效地進行破壞革命的工作，只有混入革命的政黨中，一方面潛藏在革命的旗幟下搖旗吶喊，一方面進行挑撥離間破壞革命的工作，特別是像國民黨這樣一個掌握政權的政黨，更有許多投機份子混跡進來，圖謀利祿。不但這樣，革命本來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我們的對日抗戰尤其是一個艱苦的程過。在這樣一個長期艱苦的過程中，也必然有許多意志不堅定的落伍份子動搖起來，腐化起來，甚至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而不惜認敵為友，認賊作父。這些混跡進來的反動份子，圖謀利祿的投機份子，動搖墮落的落伍份子，保留在革命陣營中，是破壞革命的禍根，是革命最大的危機。所以一個健全的革命政黨要不斷地展開自己內部對一切腐化惡化份子的鬥爭，把這些身內毒素清除出去，只有經過這樣嚴厲無情的不斷鬥爭與鍛鍊，黨纔能日趨於健全與強大。拿蘇聯來做例子，有對托洛斯基與布哈林等機會主義反動份子的鬥爭；拿最近中國共產黨來舉例，也有張國燾的被開除。國民黨目前擔負抗戰建國的艱鉅任務，要想完成這一艱鉅的任務，就一定要使本身從對腐惡份子的鬥爭中壯大起來，健全起來，進步起來。汪精衛的被毅然開除黨籍，正是國民黨這種偉大進步的表現。

前面說過了，汪精衛自始就是投機政客，封建官僚，而不是忠實於民族國家的同志，目前叛變通敵是有其發展的必然性的；國民黨為肅清內部，整飭陣容，而來一個大檢舉，大肅清，也是有其必然性的。在新年慶賀聲中，國民黨有此新



新的偉大的進步，其前途無限的光明，實在值得我們頂禮以預祝。

第二是表現抗戰國策的絕對堅定。堅持持久戰，堅持抗戰到底，本來是「七七」以來我國既定的國策，但是由於內部仍有少數動搖妥協份子的存在，由於少數漢奸親日派的隱藏在抗戰陣營以內，進行中傷抗戰的陰謀，所以每當抗戰一到緊急的重要關頭，和平妥協的空氣總要乘機昂揚起來。固然，每一次和平妥協的空氣都在最高領袖的嚴正關斥與全國民衆一致的唾棄之下而烟消雲散了，然而其動搖人心的惡影響是不可勝言的。汪精衛的被開除，是和平妥協陰謀最後的總失敗。這昭示了全世界：我們抗戰的國策無論如何是不可以動搖的，從此以後，抗戰的步調是更踏實，更沉着了！

第三是表現中央在戰時執行黨紀國法的森嚴。在目前「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最高原則之下，如果有破壞抗戰力量的份子，一定要拿最嚴厲的國法處置他。不管他過去地位如何高，不管他過去革命歷史如何悠久，不管有他所代表的殘餘勢力多麼雄厚，都是應該毫不留情鐵面無私的予以嚴厲的膺懲。古人所謂「刑亂國用重典」在目前就要用重典去對付一切妥協求和的民族敗類。因此不管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副總裁，不管他是中央政治會議的主席，不管他是國民參政會的議長，一到了發現他有背叛黨國的行爲，就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開除他的黨籍。中央此種毅然決然的大英斷，是值得我們民衆熱烈擁護的，而我們相信在這樣森嚴的法紀之下，一定可以使一般漢奸摺伏下去。所以汪精衛的開除黨籍，不僅不是抗戰力量的削弱，正相反，還是抗戰力量的增強。

我們可以看蘇聯偉大的成功，就在不斷的制裁反革命份子。過去的杜洛斯基，也有他相當的革命歷史，但因爲思想的錯誤，行動的錯誤，不能不給他開除黨籍，驅逐出國；後來蘇聯還有許多的案子，許多有光榮革命歷史的人在不斷的被肅清出去。他們都是參加革命的，蘇聯的人民並不因此而留情，他們毫不客氣的執行他的國法和黨紀，使黨內國



內的組織更加合理，更加健全。所以革命時期，特別是戰爭時期，法紀是非常森嚴的，汪精衛這種反革命份子的應受嚴厲制裁，毫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我們希望中央繼續這種精神，堅決執行法紀來肅清一切有形無形的漢奸賣國賊。因為許多漢奸份子的混身抗戰陣線內，像汪精衛一樣的人，不能說已經沒有，我們不應過低估計這班人的力量，他們破壞抗戰雖不足，而動搖人心，給抗戰以或多或少的不利影響是可能的。所以事實上我們還要以十二萬分的努力，堅決進行肅奸運動，這是我們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第四是說明了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政治進攻的總失敗。日本帝國主義者六十年來壓迫中國的一貫方針，是「以華制華」的兇毒陰謀，在歷史上除了「甲午」「一二八」「長城」「綏遠」幾次很短的戰爭外，長期的進攻方式是「政治進攻」。這種政治進攻比軍事上的進攻更要來得厲害，來得惡毒。因為軍事的進攻是有形的，容易防備的，政治進攻是無形的，不容易防備的，是要從根本上來動搖中國生存的基础。敵寇的政治進攻有兩種最重的方式：第一種就是教唆潛伏在抗戰陣營中的漢奸親日派進行和平妥協的陰謀，誘脅中國中途屈服。汪精衛正是這種政治進攻的良好工具，所以在武漢佔領以後，就愈益加緊其投降屈服的煽動。汪精衛的被開除黨籍，表明了最高領袖與中央當局以及全國民衆對抗戰到底既定國策的嚴正立場。敵人這一政治進攻的新陰謀是完全失敗了！而且也永遠失敗了！不僅這樣，汪精衛的公然通敵，致被開除黨籍，更明顯的告訴了我們：由於我們抗戰到底的堅決性，由於抗戰的日益接近勝利，使漢奸親日派不可能再隱匿在抗日的旗幟之下，繼續其暗中破壞之工作，而只有走到公開叛變的道路了！抗戰陣容從此更整齊了，也更鞏固了！

第五是國內團結的加強。日寇政治進攻的第二個方法，就是分裂我們內部的團結，實施他以華制華的毒計。民國以來，日寇一貫利用這一策略，製造中國的分裂，坐收了許多漁人之利。一直到西安事變解決，敵人政治進攻的分裂陰



謀第一次遭遇到空前的失敗，於是發動了七七的蘆溝橋事變。抗戰以來，敵人還不斷地想使用他的老法寶，然而由於我民族空前的覺醒，我們已經洞燭其奸了。這次汪精衛的提議中日締結共同防共協定，遭受到中樞嚴正的拒斥，說明了敵人陰謀又一次空前的失敗。同時蔣委員長並堅決的表示：「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汪精衛的被開除黨籍，顯示了國內團結的鞏固，教訓了一切甘為日寇爪牙破壞團結的漢奸，結果就祇有自棄於人民，自絕於黨國。最後，汪精衛的背叛黨國更深刻的教訓了全國人民，挑撥離間破壞團結，是日寇漢奸的毒計，全國各抗日黨派人民應當從此更親密的團結起來，粉碎敵人的陰謀！

第六是揭破了民族失敗主義理論的漢奸面目。前面指出了，汪精衛一貫是民族失敗主義理論的散播者。汪精衛危害黨國的事實，充分的證明了一切民族失敗主義理論的毒害，證明了民族失敗主義發展的必然前途就是漢奸賣國賊的道路，汪精衛的被開除黨籍，無論在理論上，在事實上，都粉碎了一切民族失敗主義的根據。

第七是愈加激勵了全國的民心士氣，從全國人民對抗戰的信念與前方的士氣來說，此次汪精衛的被開除，也無異是一服興奮劑。抗戰十八個月了，數十萬方里土地的失陷，百餘萬將士的傷亡，數百萬人民的犧牲，數十萬萬財產的損失，這為的是甚麼？還不是整個民族國家的生存！假定當前線將士正在浴血苦戰犧牲殉國的時候，正當全國民衆輸將出力盡瘁救亡的時候，後方又忽傳來了對敵妥協求和的消息，這將是如何的渙散民心，頹喪士氣？更將何以對得住那些已死的忠勇將士？汪精衛倒行逆施，視國家民族的生存，會不足以易其個人富貴的迷夢，這是稍有血氣聞而憤慨的事。因此，除了一個汪精衛，定可以平服無數抗戰同胞的憤慨，定可以安慰前線無數英勇將士而益加鼓勵其衝鋒前進，犧牲報國。因為為殺敵而死，為國家民族而死，是死有殊榮的，祇要不中途投降，就沒有一個人是白死，是死無代價；而以個人的死，換得全民族的永生，這又是誰個不願意的呢？



第八是對國際間的良好影響。由於汪精衛的被開除，我們可以昭告全世界人士，首先是所有同情和援助中國抗戰的各民主國家，全世界人民大眾和各被壓迫民族：中國抗戰是不會中途妥協的！我們是為世界和平公正義而戰，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決不會辜負全世界人士對我們的期望！這更刺激了國際友人對我更廣大的同情而促進國際有利形勢的愈益發展。同時，由於汪精衛的被開除，我們也無異告訴一切日寇的幫兇者，共謀打劫中國的法西強盜們：你們不要幸災樂禍吧！中國抗戰決不會像你們想像的那樣，可以中途妥協，向你們的盟友屈服。相反，我們一定要驅殺這東方法西斯的瘋狂野獸。讓你們在中華民族的巨人面前發抖！最後，由於汪精衛的被開除，我們也藉此告訴一切對中日戰爭自居中立的國家，特別是英國的現實主義外交家們：你們不要徘徊觀望吧！中日戰爭決不是你們投機取巧趁火打劫的機會！原來英國對中日戰爭的態度，一方面是不願日本絕對打勝仗，致驅逐她在華的全部利益，一方面也不願中國絕對打勝仗，怕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成功，會影響大不列顛帝國統治下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因此英國所期望的，頂好是中國不勝，日本也不敗，而便利他們走第三條路，那就是停止戰爭，誘脅中國投降。因為戰爭停止了，就不僅日本開發各佔領地區需要英國財政上的援助，就是中國政府開發西北西南，也非向英國舉債不可，這豈不是一舉兩得嗎？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他目前借款買軍火給中國的同時，也並不斷絕其在財政上軍火上對日本的接濟，這並不是雙方討好，而是在一面做生意，一面想維持中日戰爭不死不活的局面，以便利他們來走第三條路——調停。這就是英國紳士所採的最好的對付中日戰爭的方式，雖然僅是一個幻想。所不幸的是我們內部居然有汪精衛這類的漢奸，天天在喚『調停之門尚未關閉』，給了英國紳士們的幻想一個更大的誘惑，使他不能不保持其徘徊猶豫的騎牆態度。不然的話，假定英國一旦明瞭中日戰爭祇有兩條路給他走——不援日，即援華，祇能在當中選擇一條，而決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時候，我相信那些現實主義外交家是一定要走援華一條路的，因為目前英日矛盾大過中英矛盾，現實主



義的算盤是打得極清楚的；換句話說，他明知調停是「此路不通」，而為要保全他在遠東的勢力，他就非援助中國驅逐日本獨霸勢力不可。而要使英國採此堅決行動，就祇有我們對外表示更強硬的抗戰到底的決心。現在汪精衛的驅逐出黨，正無異告訴英國紳士說：調停之門老早關閉了！至少從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起，已絕對關閉而堵塞了！這樣，因為中國態度的愈堅決，抗戰的愈加緊，從促進英國態度的轉變，進而爭取一切國際友人更多的更切實的援助，是極有把握的事。

從以上八點看來，可見汪精衛的開除黨籍，其意義是何等重大，對抗戰前途又是有何等良好的影響啊！

## 五 珍貴的教訓

最後我要把汪精衛叛變所得的教訓簡單說明一下，作為本文的結束：

第一，這次事件教訓了我們：動搖妥協傾向發展的前途，必定要走到漢奸的道路。汪精衛就是很好的例子。從今以後，我們更要把警惕性提到最高的程度，粉碎一切和平妥協的漢奸理論。

第二，這次事件告訴了我們：由於敵人長期侵略的失敗，由於抗戰已逐漸進入第二個階段，使敵人愈益增強其絕望的掙扎，加緊唆使其走狗漢奸從事破壞抗戰的活動，因此我們必須加緊並擴大肅清漢奸的工作，使根絕於中國。

第三，敵人分化中國團結的陰謀是更加厲害了！過去曾經分化中國中央和地方的政權，曾經分化中國抗日各黨各派的團結，現在更進一步實行分化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團結了！首先有近衛文麿的宣言「與不反日的國民黨政府談判」，暗示了願意與「親日的國民黨」合作，繼之有汪精衛的公然危害黨國，他附和了近衛，做了近衛的奸細內應。這是敵人由「以華制華」進而採用「以黨制黨」之毒計的試售，可是失敗了！汪精衛的被驅逐，就象徵了近衛內閣



的倒台。可是敵人這種陰謀是不會停止的，我們只有用更堅強的精誠團結來回答。敵人這種團結不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團結，不但是抗日各黨派的團結，不但是中國國內各民族的團結，並且是各抗日黨派本身內部的團結，首先是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因為國民黨是今天擔負領導抗戰建國艱鉅任務的第一個偉大政黨啊！

抗戰已進入第二階段了，抗戰的前途更光明了！走到日暮途窮的日本帝國主義益盡其黔奴技窮之掙扎，漢奸賣國賊愈益表現其賣身作狗之最後活躍，我們也正需要以堅定到底的抗戰國策，精誠懇摯的團結統一，自由光明的民主政治來克服敵人的垂死掙扎，爭取最後的勝利。二十八年新年的第一件大事，清除賣國賊汪精衛，這是照引我們踏上二十八年抗戰勝利大路的明燈！（完）



# 五中全會之面面觀

W 莉

在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正當開幕而未開幕的時候，中國民衆，不分黨派，不分階級，都集中全部的熱情，企望這次大會能給我們抗戰勝利的一個最有力的保證。

現在五中全會已經閉幕，我們想把五中全會的經過與其成果，作一個總的檢討。

五中全會未開幕前，我們就在報上看到它將討論二十四種提案。這二十四種提案是把抗戰現階段中一切重要問題大多包括在內了。接着蔣委員長在五中全會演說，證明中國抗戰的必然勝利，及五中全會的宣言及決議案，都活躍在我們的眼前了。這次大會的成功是值得我們奮興的。究竟這次五全大會是在什麼條件下成功的？對中國抗戰的前途有什麼影響？這都值得我們深刻的研究和檢討。以下就來發表我個人的意見。

## 一 國際形勢的轉變

從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爆發以來，遭受損失的不僅是中國的本身，就是英美法等民主國家，甚至於與日本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德意，也不能例外。所以中日衝突，決不是單純的中日衝突。在中國市場上，國際資本深刻的鬥爭是週知的事實。但在一二八或蘆溝橋事變前，在中國市場上的列強經濟勢力的鬥爭，還是一種複雜和混亂的現象，即不僅



僅是英日、美日的衝突，也表現在英美的尖銳對立上。雖然從蘆溝橋事變後，英美在華的矛盾，並沒有基本上消除。却不能否認，列強對於日本資本之躍進，用政治或純經濟的形態，形成對抗和包圍的形勢。尤其對日的根本對立，充分的表現在日英的關係上。

一九三一年東北事變後，日本向中國市場飛躍的進展，滿州市場變成了日本的獨佔狀態，被逐出的列強資本，受着極度的威脅。尤其是日本進佔平津後，列強恐懼着日本資本再進一步在華北，在整個中國建立像滿洲那樣的優勢地位。其實恐懼已為赤裸裸的事實所代替了。於是列強有覺樹立對策，應付日本資本獨佔中國市場的必要。

中國政府領導的統一及建設運動能獲得歐美諸國的熱烈同情與援助。理由就在於此。但這不是如日本政府御用的學者所說：『中日的事變，是由國際資本相互衝突所蘊釀出來的。』因為這根本是企圖利用列強對日在華的衝突，代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內在的必然性。也無異於否認中日衝突的基本原因。更可由此得出荒謬的結論，中國對日的抗戰不是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僅給英美法諸國所利用吧了。

現在誰也不能否認，中國的對日抗戰，不單是為民族自由的生存，也間接保障列強在華的合法利益。所以列強對華的援助，固然中國是熱烈歡迎的，但也是列強維持在華權利的唯一路徑。

列強由於日本侵略中國所遭受損失的悲慘教訓，也毅然地在物質上精神上積極援助中國的抗戰。

英國於第一次跟美國大借款予中國後，又傳為穩定中國法幣匯價，再貸巨款三，〇〇〇・〇〇〇鎊給中國。這雖未見中國官方的切實承認，但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英國最近致日牒文，態度堅決，措辭異常強硬，痛斥日本毀約，并表示決不承認以武力造成之變動。據星期泰晤士報的評論：『日本蓄意關閉中國市場，排斥西方各國，其對英美兩國如此，即對於德義兩國，亦莫不然。英國政府對日所提出之照會，乃以堅決詞語，說明英國對於此項政策所具態度，其措辭



之堅決，乃為中日戰事發生以來所僅見。其內係謂片面現行條約之任何舉動，均為英國所堅決拒絕，但不反對經由談判途徑討論修正事宜。質言之，英國已與美國採取同樣政策。英國照會與美政府前於去歲十二月杪向日本提出之照會，其內容雖非一致，特其所依據之各項原則，則屬相同。更可相信英國對華援助的強化。這雖與實際行動壓諸日本屈服，不能同日而語，但英國對日態度的轉變強硬，却也是鐵的事實。

美國是更不用說了。

美國總統羅斯福近致國會的咨文，對於任何國家的侵略行為，攻擊甚烈，其提出之應付方法，大致不外於二點：（一）積極擴充軍備以對抗強力政策。（二）立即修改中立法以利於被侵略國。這是針對着侵略國的侵略行動而說的，所以羅斯福在向國會宣讀這一咨文後，並用法意德西各國語言，廣播於全世界，這不啻是對全世界發表意見，並有在精神上鼓勵弱小民族抗戰的意味。

具有遠見的羅斯福總統，已把修改中立法問題在咨文中提出來，而美國的有識之士，及共和黨的部分議員，亦感得中立法的不當。雖然如共和黨議員波拉表示：「經濟制裁，絕非和平措置，乃係戰爭初步辦法，余若不準備作戰，即不願實施制裁。」但這正是自殺政策，美國民衆將不予以支持。

最近海通仰光十八日電：英國輪船「渥塞斯探喜」號，裝到美國飛機及機關槍等，在該處起岸，據悉此項軍火係最近美國貸於中國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借款之定貨，聞其他各批軍火，在繼續輸運中。無論此項消息確實與否，但美國爲了增加中國抵抗力起見，應該多多對華的物質援助，擴大借款數量……

正當美國反侵略態度日趨積極的時候，英國國會中產生新黨運動，他們認爲「和平決非屈服於暴力所可獲得，必須聯合世界愛好和平各民族，組成堅強陣線，一致抵抗侵略國，始克有濟。」這說明了保守黨的分化。也就是張伯倫



妥協外交遭受嚴重的打擊。英國商界要人也鄭重表示「英國在華投機不下三萬萬鎊，較之其他各國投機之總和，尚有過之無不及。往時英貨佔中國入口貨總值百分之八，今後日本若能實現其計劃，則不僅華北五省，甚至華中之貿易，亦將由日本獨佔矣。」

張伯倫單爲英帝國利益着想，也應步美國後塵，立即對日採取強硬態度。

法國對日態度，也同英美採取一致。繼美國去歲十二月三十一日與英國本年正月十四日致日照會之後，法政府亦於本月十九日致日照會。據哈瓦斯電：「巴黎負責人士宣稱：法國政府曾在此項照會中，聲明凡以片面行動修改九國公約之所爲均非法國所能承認，日本在中國境內所欲樹立之「新秩序」實與此項公約相抵觸，而足以妨害法國所保有之權利，自非法國所能苟同。」

自中日戰爭發生以後，九國公約簽字的重要國家，如英美法等國，他們的態度早已顯明，然而他們同時採取類似的行動，用極坦白與堅決的態度，警告日本，此尙爲第一次，也是英美法採取平行行動的第一聲。足以證明英美法爲維持九國公約的神聖及恢復遠東的國際秩序，已準備由消極的抗議，採取積極的措置，而且有更進一步共同行動的可能，其實也祇有採取共同行動，始能發生威力。

總之，中國目前抗戰，正當由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中，國際形勢的發展，對中國是有利的，而且由於中國外交之明朗化，中國抗戰的積極性，更可能爭取國際進一步的同情與援助。

五中全會就是迎着這有利的國際形勢而來的。她看到列強對日在華的衝突，因中國抗戰的堅決，更與日俱增了。爲了保持並擴大這基本的衝突，而使中國的抗戰更有把握地勝利，五中全會是帶着無比的光輝出現在國際舞台上了。



這就是說國際對中國的援助程度，是決定於中國抗戰的堅持性。五中全會為迎合這有利的國際形勢，首先要解決這偉大的任務，即怎樣使中國的抗戰不中途夭折，直至爭取最後的勝利！

## 二 日本的泥腿愈陷愈深

日本原想一鼓其氣，征服中國。上海、南京的失守，而中國仍堅持抗戰，已够敵人心寒。廣州、武漢的失陷，中國不僅沒有屈服，却內部愈加困結，抗戰的堅持，也更鮮明。這時日本配合着他政治的陰謀，想彌補軍事上的缺陷，而使中國不打下而降，結果也失敗了。同時日本在軍事上到處碰壁，大規模的進攻，只表現在虛張聲勢上。日本佔領武漢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能到達岳陽，而剛到岳陽，後路崇陽咸寧即被切斷。現日軍在各戰線上，都停留在膠着狀態中。日軍所佔領的若干據點，不論在華中華南，即是華北，始終在中國的正規軍和流動部隊的前後夾攻中，使日軍進退兩難。日本雖夢想在政治陰謀上，像天羅地網一樣的圍住中國，但中國由於人民政治的覺悟，和蔣委員長賢明的領導，終於把日本所利用的一切工具——漢奸汪精衛及其羽翼——摧毀。這給日本的侵略中國，是一很大的打擊。因此日本的近衛內閣就塌台了。

平沼繼近衛組閣，雖見其侵略野心未滅。但相信仍無法打開危局。平沼在上議院發表演說：『日本雖已獲得若干軍事勝利，但與最後目標，相距尚遠。其間尚有無數困難，故政府人民應團結一致，全國教育制度，亦應以新的基礎，發揚國家精神，將來最重大之工作，為建立最強大軍備，及發展中日滿經濟力量。目前最要急務，則為實施總動員法，及實行內政改革。』海相米內光政發表演說：『對華作戰不但需動員陸軍與海軍，更需動員日本全國人民。日本與東亞之將來，全在此舉。故日本全國人民應團結一致，堅信日本軍隊之最後勝利。』這很明白的告訴我們，日本要征服中國實在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日本自身亦覺愈打困難愈多。日本在目前雖遭受空前的挫折，但其野心勃勃，必達鯨吞中國而後已。陸相板垣很爽直的說：『日本軍隊將繼續留駐中國，其任務不但為剷除反日的蔣介石政府，並為建立和平與秩序的新國家。』日本政府無疑的是要貫徹其侵略政策。平沼最近演說：『政府仍將尊重政黨之權利，關於外傳行將組織法西斯統一政黨之政策，業已切實放棄。』可見平沼內閣，在加強法西斯蒂統治的過程中，仍不能不顧其內部摩擦，以免有損侵華力量。日本政府目前竭其全力使公衆意見側重內政方面之工業重振問題，國債增高問題，以及最近國外貿易之衰落各問題上。按日本本年度應請國會通過之預算總額，約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其中大部分之費用，均用之於對華戰爭方面，此一預算較之去年度之預算案，增加百分之六·八，易言之，即增加三，六九四，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該預算中，其中多項均與軍事有關。至於尋常各部門之經費，則因對華戰事之故，大加削減。如水災防止費，及農村復興費，僅約九百八十萬元。於此可見其經濟拮据，與對華戰爭之瘋狂狀態。所以日本需要對華戰爭作最後掙扎，這是可以預料的。近來日本駐歐使節羣集巴黎，會商加強反共協定。巴黎晚報載稱：『日本各使節此次會議，乃欲草擬德義日三國軍事同盟條約，此項條約，短時期內即可成立。』實際上德國在資本上雖寧願以英國做中心的中國資本主義化，甚至進一步想參加南華鐵道網的建設及海南島的開發，但在政治上仍沿着防共路線。柏林卅日哈瓦斯社電：希特勒頃在「大德意志國衆議院」發表重要演說：『假使此次日本歸於失敗，則德意兩國必將隨日本之後而受他國之進攻，故主張凡屬反共協定中之國家，必須確定其共同陣線。』這都證明日本正在調整德意邦交，與加強軍備，擬作最後一次之總進攻。

五中全會就是迎合『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遭遇之困難，與企圖更瘋狂的侵略』而來的。中國在目前主要是停止日本之進攻，使日本所佔據之線與點，起了根本的動搖，而轉為消極的退守，終於節節崩潰。



但要達到這個目標，同樣的必須中國的抗戰堅持下去。爲了使中國抗戰堅持下去，首先要改造中國的政治——肅清一切主和派及政治機構中的漢奸分子。這歷五中全會顯然是負了這神聖的使命。

### 三 中國抗戰的持久性與政治的進步

十八個月抗戰的經驗，證明了什麼，這是很明白的，就是中國的抗日戰爭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戰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抗戰初起之時，許多人不從敵我力量基本上的對比出發，而從若干一時的與表面的現象着眼，設想戰爭不久就可勝利地解決。這可說是純主觀的幻想。蔣委員長在去年雙十節明白指出：「此次抗戰，非一年半載可了，必經非常之困苦與艱難，殆可獲得最後勝利。」這就因爲敵強我弱，敵是優勢，我是劣勢，敵是帝國主義，我是半殖民地國家。雖然中國的抗戰是一艱苦的持久戰，但十八個月抗戰的經驗，中國必能爭取最後勝利。蔣委員長在五中全會中以事實證明中國必勝日本必敗。蔣委員長說：「……這一次中日戰爭，如果日本能獲得勝利，那就是世界一切戰略戰術和所有軍事學說都要根本推翻，甚至一切事物的原則原理，都可證明爲無用了。」這不是什麼誇大狂，而從理論上事實上都可證明如此。現將蔣委員長所說的話概要地列舉幾點：

(甲) 違反其大陸政策之既定步驟。

(乙) 其「不戰而屈」「速戰速決」與「速和速結」之企圖，皆不得逞。

(丙) 戰略上失敗即(A)不知彼己，(B)一味取巧僥倖，違背「拙速」原則，(C)驅兵深入，陷於「掛形」。

(丁) 政略上失敗即(A)製造傀儡，利用敗類，加深軍人腐化，(B)外交政策，支離矛盾，日益孤危。

(戊) 不認識中國歷史與民族力量，更不會認識現在的時代和中國革命發展的特質。



蔣委員長固然是深刻地認識了敵人的弱點，指出中國抗戰的必然勝利，但不是要我們等待抗戰的勝利，而是要我們認識自身，認識敵人，認識環境與事物發展的必然性，更加緊努力。所以蔣委員長勉勵國人（甲）以我們的統一團結對於敵人的驕妄凌亂，以下剋上。（乙）發揮我們農業國的特長，節約堅持，加深敵人工業國家的弱點。（丙）利用我們天時地利的優點，加緊戰時一切建設，促進敵國社會崩潰的危機。（丁）真實力行三民主義，打倒敵人黷武主義。

蔣委員長這次在五中全會的演說，是針對着中國目前抗戰形勢的特點而來的。目前抗戰形勢的特點是什麼呢？毛澤東先生在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中說：「目前的抗戰，正處在抗日持久戰第一階段轉至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這一過渡時期與將來相持階段的基本特點就是一方面我國的困難加多，另一方面我國更加團結與更加進步。同時日本的困難亦必增多；如「日本因戰線延長，將感兵力的不足與分散，離開海岸鐵路大海的山地戰鬥將給日寇以更大的阻礙。敵後方廣泛的游擊戰爭的發展，將陷於到處受擊，忙於應付，消耗疲憊的境地。日本在華南的行動，勢將引起美、英、日、法日關係的更加尖銳化，日本的反戰及反法西斯運動日益增長」等，都很明顯的暴露在我们的眼前了。

中國目前政治的進步，由於揭穿汪精衛的陰謀而開除汪精衛的黨籍，充分地表現着。自從汪精衛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內肅清了一批投機妥協分子，在全國逐出了一批破壞抗戰分裂統一戰線的親日分子，但是汪精衛這批出亡的漢奸分子，在國民黨黨內仍有他們的爪牙或同情者。就是在全國也有漢奸準漢奸及一切動搖妥協分子做他們社會基礎。這說明了汪精衛及其爪牙，並未失去其陰謀活動的餘地或機會。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在政治的陰謀上，仍然多方的策劃，如企圖拉攏吳佩孚或其他失意政客等卑鄙行為層出不窮。日本能否如願以償，這是另一個問題，但無疑的，日本對華侵略無論在客觀形勢上，或主觀力量上，都還沒有到了筋疲力竭的時候，即中國對日的抗戰是一艱苦的持久



戰而艱苦的持久戰正表現在戰爭的三個階段。現在中國的抗戰正是由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這過渡時期的伸縮性，就看我們主觀的努力能達於如何程度。

五中全會就是迎合中國對日抗戰的持久性與中國政治之進步而來的。現在中國的抗戰正由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但在這過渡時期中，顯然困難是非常多的。因此五中全會的任務，就在解決如何使中國的抗戰迅速的由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如是則敵軍疲於奔命，終至於從中國的領土敗退出去。

上面所談的僅關於五中全會是在怎樣環境中召集的問題。現在五中全會是閉幕了。五中全會的宣言也在各報大登特登了。中國的民衆已看到五中全會的收穫是什麼，但爲什麼會有這個收穫呢？假如我們了解五中全會是在怎樣環境中召集，那就不覺驚奇了。同時我們更會切實的體驗，五中全會的每一個決議，她的意義是怎樣重大？我們爲了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也爲了自身的安居樂業，更要竭誠的擁護五中全會的宣言和決議，並積極的在工作上配合着五中全會所給我們的任務啊。

#### 四 五中全會給我們的是什麼？

五中全會的宣言很鄭重的指示出，『中國抗戰目的，在求獨立生存。』正因爲如此，『中國失地雖廣，死傷雖多，而全國軍民同仇敵愾，精神益振，人人以必死之決心，爲國家建永生之大業。我國素爲愛好和平之民族，今之所以堅忍久戰，不辭一切犧牲者，實爲日本軍閥不斷以武力侵略，肆其蠶食鯨吞，逼我入於最後關頭之結果。』中國人無論其屬於任何階級或任何黨派，都十分明瞭中國此次抗戰的目的，在爲求國家獨立，民族生存。這就是中國在精神上勝過日本之處。日本的侵略中國，不管如何粉飾其醜惡的面目，或如何強詞奪理，淆惑視聽，但彼日本民衆，由於看到感到戰爭對



他不利，整天整夜驅使他們走入飢餓線上，而又不見中國人虐待日本民衆的痕跡了，無疑的將更怨恨政府，反抗政府，至少也要減低對政府侵略中國的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持力量。日本政府雖然高唱精神總動員，但結果是什麼，恐怕就是人民反戰情緒的高漲吧。

五中全會像北極星的無比燦爛，照耀出中國人的每顆心，在爲求獨立生存。這不僅證明我們的抗戰是光明正大，也昭示全世界：『中國的抗戰是爲東亞謀永久和平，爲人類樹立正義』呵。

所以五中全會的宣言，同時宣布中國抗戰建國與友邦的關係。在宣言中，痛斥破壞條約尊嚴，危害世界和平的戎首。并昭告全世界：中國國民不獨贊助門戶開放之原則，且願以公平互助的原則與世界各國作互助和平的合作。這一方答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運動，揭破日本軍閥建立「東亞新秩序」的獨佔東亞的夢想。一方面更進一步的粉碎了日本軍閥在國際間所散播的挑撥離間的中國抗戰勝利後會排斥第三國的謠言。關於中國抗戰勝利後，英國駐華大使寇爾爵士在離滬赴津之前，曾對他的朋友說過，他深信中國抗戰勝利後一定是一個嶄新的民主國家。和英美法一樣。可見事實的真相是決非造謠所能動搖掩沒的。現在五中全會又明白指出中國抗戰建國所希望於友邦和願與友邦和平合作的誠意，而此種和平合作的願望並非決定於抗戰之後，實爲孫中山先生所手定而由中國政府所信守不渝的，當更可廓清各友邦的僅存的懷疑。

但宣言中明確地指出：「……查九國公約之重大原則有二：（一）爲尊重中國主權領土及行政之完整。（二）爲門戶開放與機會之均等。詳察公約之精神，熟觀目前之事實，則知非發揚第一原則之大義，確保其實際之効力，則第二原則必無從實現。……」所以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對於中國此次抗戰，應該不僅是消極的同情，而是積極的在物質上精神上予以援助。并在經濟上與日本斷絕來往。則中國的抗戰能爭取最後勝利，也就是保障九國公約的神聖，和維持



列強在華的合法權利或利益。

五中全會更對內檢討過去的工作，和決定今後努力的方針。在宣言中坦白檢討承認過去一切工作的未盡努力，希望黨員及軍民對一切思想行動，嚴加反省，嚴加檢舉，嚴加改正，以能力自由生命完全貢獻於國家。同時懇切希望：「國同胞不問其過去政治見解與派別之如何，凡願實行三民主義而參加本黨，從事國民革命抗戰建國之神聖事業者，無不誠摯歡迎。」政治建設，特別注重於「加強民衆組織，統一民衆行動，解除人民痛苦，改善人民生活」而爲使全國黨政工作得與軍事相配合，以收共同行動之效。特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以統一黨政軍之指揮，這是不同於國民參政會之權限僅在於諮詢作用上。

五全大會的宣言，實在是使每個民衆都增長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我們由於五全大會宣言的生氣蓬勃，可以斷定五全大會的決議一定是非常適合於目前抗戰的需要，也可說是對症下藥吧！

現在我將五全大會的決議案略述之：

- 一、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
- 二、改進縣以下黨政機構之實施

「我們綜觀宣言的內容，並與全會決議相參證，覺得此次全會之最大成功，即爲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與改進縣以下黨政機構兩事。雖然國民黨自去年四月間召開臨時代表大會以來，即設國民參政會，以實現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主張，但因爲參政會職權僅限於諮詢，對於民意之執行，尚有若干困難。現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在以實現民主政治爲爭取最後勝利的原則下，中國國民黨招致各黨各派之優秀領導人物，參與此次最高會議。」——譯報社論

究竟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性質及其作用是怎樣的？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某高級官員新近對美聯社記者



稱：「……該會在組織上乃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連絡機關，類似中央政治委員會，唯權利較大，作用較廣，因中央政治委員會僅為決定政務，國防最高委員會，則為軍事及政治決定及指揮機關，僅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凡與抗戰有關之政軍黨各種事務，均受其管轄，其目的使各種活動得以調和，以求獲得最後之勝利，鞏固統一，使全國力量及富源均用於對日抗戰一途。是以該機關不設在國民政府之下，而設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其委員包括全國政軍黨及文化界之領袖，是以並不限於國民黨黨員，凡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中國國家社會黨之黨員及領袖，均將被邀參加。據聞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及朱德均被邀加入該會，凡該會所決議者，各軍政黨機關，均須予以遵守。中國目下須盡力吸收民主之精神，該會之目的，即實行此點也。」

又訊：據國民黨人士稱：「國防最高委員會將於二月一日開始工作，國民政府之政治行政機構，全國軍事委員會（軍事行政機關），國民黨中央大本營（執行黨務之機關），均受國防最高委員會之節制。」

如是，可知國防最高委員會的職權是非常重大的。其組織又包羅各黨各派，更能發揮偉大的領導作用。

在這裏是找不出國共兩黨摩擦的地方，只是證明國內團結之進一步的鞏固。而且空喊團結，空喊各黨各派的統一一戰線，而無實際的行政機構，使此項號召切實執行，則於事實仍為無補，現在總算有一健全的行政機構了。

也許有人要疑問：「國共兩黨既合作無間，又為什麼五中全會之宣言，說明國民黨不願有二重黨籍存在？易言之，即拒絕共產黨之希望准許加入國民黨。」我的答覆是這樣的：「國民黨之拒絕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不能解釋為二黨間有摩擦。其實共產黨根本未曾正式作此項提議，共產黨曾提議准許共產黨員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然此點與要求加入國民黨不同。」

根據目前國內政治形勢，共產黨員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一事頗有成功之希望。事實上依照目下之計劃，三民主



義青年團已爲非黨的機關，而改爲國家機關，准許各黨黨員參加。又大公報評論稱：『大會宣言表示中國各黨仍皆保持原狀，並不改變其組織，但均須在三民主義指導下，共同奮鬥，爲民族求解放。』

實在此次大會，在組織國防最高委員會一點上，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由於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建立，我們相信國內之團結更形鞏固。並在共同工作過程中，各黨各派間相互信仰的力量，將更增長。

此外改進縣以下黨政機構。固然屬於國民黨本身的事，但國民黨的擴大與鞏固，對於抗戰的前途是很有幫助的。毛澤東先生說：『今天更當民族危機萬分嚴重之際，我們將盡一切可能贊助國民黨。理由是抗日的友軍越大越好。單一個共產黨的發展進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國主義的。處於第二黨地位的中國共產黨，雖然發起了與堅持了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並在自己的組織上向着廣大革命志士開門，用以力爭抗日的勝利。但若處於第一黨地位的國民黨，依然保存過去的那樣老狀態，那就對於抗戰，對於統一戰線都非常不利……所以共產黨不但不反對，而且十分希望與堅決贊助國民黨擴大與鞏固其組織。』

我們也同毛澤東先生取一樣的態度。希望國民黨切實改進縣以下的黨政機構。抗戰爆發以來，國民黨上層機構及政府上級機關，都有空前的進步，而此種進步，由於下層黨務機構的腐化與政府的下級機關的不健全，的確造成了『首尾不相呼應』之勢，而減失他的作用了。

## 五 結論

這次五全大會是在國際有利的形勢下，日本經濟上政治上遭遇了困難，與中國軍事上政治上獲得進步——肅清汪派及漢奸分子的客觀環境下召集的。所以這次五全大會的進步性，是有目共睹的。



五全大會的宣言和決議，是很能適合目前中國的抗戰形勢。這就是說認清了環繞中國周圍的複雜情形，而提出具體的對案。如建立國防最高委員會，變三民主義青年團爲非黨機關，改進縣以下的黨政機構等。

這次大會在認識中國抗戰的持久性，而加強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機構，實在非常值得寶貴。尤其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五全大會的決議更會嚴厲地執行。這對於中國抗戰的前途是很有大的推動力量的。

我們認清了這次五全大會的意義，必須在自己本位的工作上，努力響應大會的決議。並時時督促黨政機關，根據五全大會的指示，努力負起抗戰的偉大責任呵。



# 中日在美之宣傳戰

金瑜譯

戰事發生後，中日兩國莫不爭相運用宣傳工具，藉博第三國之同情與援助，於是美國成了兩國宣傳競爭場所。本文原係美人波羅諾·拉斯卡所作，內述兩國宣傳之技術，執拙執巧，頗繞興趣。日本評論十二月號，載有日文譯文，反將日本本國所宣傳之幼稚和虛構，暴露無遺。實不值吾人一笑。原文過長，茲先譯日本對美國所宣傳之反響和效果。至於中國方面對美宣傳之內容，俟有機會當再譯刊，以饜讀者。——譯者附識

自去歲七月七日，中日兩軍在北平郊外發生衝突，繼着上海事件爆發，終於兩國捲入全面戰爭狀態中。於是北美合衆國，變成了中日兩國猛烈的宣傳場所。在美國人民中，同情兩國者甚多，因此，兩國即以同情者爲中心，使美國之輿論誘入對本國有利的地位，而開始了激烈的宣傳戰。從兩國寄來的宣傳品，幾達數百萬種，又在美國之兩國僑民，實業，文化，學生，宗教等團體所出版之宣傳小冊子，亦充積在美國市民各階層間。隨着宣傳技術的發達，兩國宣傳之方法，亦頗巧妙。因此一般美國人民，都感到所宣傳者和報載之事實頗多相左處，對於事實之真相到底如何，極難明瞭。若與東北事變當時兩國所宣傳的相比較，則現在兩國宣傳品之內容，係用科學的方法，來敘述非僅感情的一般所想像事實，而冀達到博取同情和因外國之輿論而發生偉大的影響爲目的。戰爭發生後，中國派遣赴美者，有胡適博士爲首之第一流演說家，日本則有高石、鈴木、鶴見等之國民使節和演說家。



對弱者發生憐憫，乃人之本性。被世界批評戰爭武器落後的中國，美國首先對之發生同情，乃為世所周知的事。迄至今日仍未稍減。然而理解日本之立場，認為日本此舉為適當者亦有人在。作者在此，並非來討論「中國此舉為對，抑或日本之主張為正當」之問題，作者既非日本之同志，又非中國之同志；本文目的，是將兩國對美宣傳之技巧，以及在美國所引起之反響，僅盡量地從科學者之立場，加以檢討。

宣傳之目的，事不待言是想影響宣傳對象國之輿論，更希望對象國採用對自國有利之國策。所以美國對兩國如潮湧至之宣傳品，曾加警戒，但終無多效，故感到只有充分認識自己的立場，而實行遠東政策之必要。

在美國之輿論，亦頗多分歧。如實業家（進出口業者，製造業者等）早已諒解日本之立場。此等實業家自然不希望對日貿易受有打擊。反之，如大學教授，學生，牧師等所謂自由主義屬於「人道派」者，則一致對中國表以同情。從日本來美的演說家和使節，在神經敏捷之聽眾前，時常有被拋擲什物，或在演講中被聽眾譏嘲，甚至或者連一個鼓掌的人也沒有。反之，對中國的演說家，因為同情弱者的緣故，時常報以熱烈的掌聲，並且很關心似的來聆聞關於中國的戰爭消息。自然，屬於共產主義一派者，也時常舉行親華示威。以下漸次舉出具體的例子，來檢討中日兩國宣傳的巧拙，效果及其影響等。

在全美所散布之宣傳品，在當時差不多都集中在「戰爭係誰所發動」一點上。日本方面謂：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夕，在蘆溝橋附近——日本軍隊平時所使用之演習場所，如例舉行演習。事先曾通知中國當局，且兵士所使用者，皆非裝配子彈之槍。是夜十一時四十分，中國第二十九軍卅七師士兵，突然發砲，因日本兵士，未曾帶有彈藥致不能還擊。於是只得中止演習，同時報告距離二哩處之以前英國駐屯軍所使用之兵營——日本軍本部。及至該夜十二時許，日本援軍到達，後即對中國兵加以還擊。」（紐育日本人商業會議所發



上述之時間頗不正確且極勉強。又據日本方面稱：此次事變之起因，追溯東北事變當時，可以看出完全是因為中國「違犯條約」和「排日運動」所致。但中國方面則稱：此次行動，乃是出於不得已之反抗，日本過去之「侵略行為」毋寧說就是此次事變之起因。日本反駁中國之說明，美國人民則認為無充分明白的理由。

上海戰爭發生之原因，日本方面稱：

「中國為分削日本之勢力，所以引起南方之紛爭，「一二八」如此，此次亦如此。」（同上註）

至於上海事變之導火綫，關於大山大尉被擊事件，日方稱：

「虹橋係在工部局行政區域，對外人之通行和居住，原係自由。但兩名日本軍人，却在該處被中國士兵所槍殺，並且此兩名，決非武裝者。」（同上註）

無疑的，虹橋依據一九三二年五月之停戰協定，乃係非武裝地帶，此乃為各國所承認者。然而在各國新聞記者，領事團及中日兩國關係者之集合下，將死者海軍士兵尸體解剖後，證明二人非係手槍所擊死，而用步槍所擊死。中日兩國在此點爭論上，日本方面似屬有利。因依據協定，在非武裝地帶，中國巡查持有步槍，違犯協定，自不合理。但是中國當局則稱：此項協定，係受日本強迫所簽訂，應認無效。

歐美人士莫不希望中日戰爭早日結束，而恢復和平。利用此心理，紛爭的當事國，曾表示允許第三國調解的態度。此在外交的手腕上，可以說是運用得很乖巧。懂得這個訣竅，日本的宣傳人們，則故意放出空氣：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英國駐日大使向東京政府提出三點：一、中國軍隊由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撤退，二、新派遣之日本陸戰隊亦同樣由公共租界撤退，三、中國軍隊撤退後之區域由各國軍隊共同戒備。日本政府，對此



要求有受諾的意思，不幸同時東京當局接到上海方面，中國軍用機轟炸日本艦隊旗艦出雲號，日本領事館，陸戰隊本部及在公共租界日人所經營的紡織廠等消息。日本政府則知交涉已不可能，認為中國政府確有作戰之用意，終於捲入全面戰爭中。」

日本此種強硬聲明，是日本得到正當立場的巧妙戰術。然而中國方面則聲稱：「鑑於往例，日本絕無允許第三國調解之事實。單在日本陸戰隊上陸一點上，已足證明日本有戰爭的意志。」此次滬戰爆發的原因，也可以說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已明知對日戰爭已不能避免而發動。

日本對美宣傳，獲得最有效果者即：「若美國同情中國，決定其遠東政策，發動中立法而採用反日政策的話。馬上召來之不利乃美國自身，不是日本。第一日美通商必受阻礙，此對美國之進出口商人，製造業等，勢將有莫大之損失。」此等論調，對於實利主義之美國人，確收宏效。又如日本所宣傳：

「現在日美通商，美國勢屬有利，過去數年間，美國向日本購買一元，日本則向美國購買兩元。去年美國對日輸出額係二億四百萬美金，美國却只買入一億七千二百萬元美金貨物。無疑的，美國已有三千二百萬元美金的貿易順差。日本對美國是世界第三位的顧客，反之，同年度中國輸入美貨四千六百萬元美金，而美國却向中國買進七千三百萬元美金的貨物。無疑的，在美國方面對中國的貿易是逆差。」（註：紐約日本人商業會議所發行“Appeal to Roassen”）

日本向美國輿論界，指出通商上之得失，實利主義的美國人，對於此種宣傳，自不能不加以注意。美國政府之所以不能發動中立法，至少亦有此點之顧慮。

此外日本又稱：



「中國若共產後，外國在華之權益，勢將如何事不待言；中國馬上對外負債一切聲明無效，沒收種種有形之權益，外人生命亦難求保障，正如共產黨蘇俄一樣，對於外人入境，也不自由……」〔日本外交協會發行“Why? Who? How?”〕

「美國南部四五百萬畝（每畝合中國六畝餘——譯者）之棉花，完全依靠日本輸出之原料來種植，百萬人以上依此爲生，換言之，彼等所依賴者即日本」（紐育日本人協會發行“Appeal to Reason”）

在南美，排斥日貨，勢所不能，所以排斥日本，在絲業間亦被抹殺了。

最有力的擁護日本團體，要算在加利福尼亞州所組織的日系美國市民之種種團體。其中「太平洋親善加州委員會」，表面上雖看不出親日，但係日本僑民所組織而成的宣傳機關之一。該會所發行之小冊子內云：

「美國何以對於中日兩國，都要敵對呢？何以不能和兩國保持着親善的關係呢？日本沒有給美國絲毫的威脅，所欠美國的債，亦如數償付。來到日本遊覽的美國人，日本對之比任何國家爲尊重親切。向美國交涉的事從未發生。日本在世界中，是一個最守信用的國家，向美國所借之款，縱一分亦償還之，如此之誠，實足給美國所信賴。所以美國若對如此國家，過於敵意惡意，那麼以後，美國再也不要希望，值得美國人民所信任的國家，給你一種禮儀了。」（一九三七年，在舊金山發行之宣傳冊子“*What is Fighting About*”）

作者覺得，對美國人民感動力最大者，就是日本僑民所組織而成的親日團體之宣言。此等宣言，比之日本外務省幾次的聲明，可以說更有效果。

美國是一個極忌侵略的一個國家，此爲世所周知。日本充分的知道此點，所以絕對不希望給美國人民認爲日本是實行侵略行爲的國家。例如廣田外相之聲明：



「日本之基本政策，乃計劃依賴中日「滿」三國之協力，奠定東亞安定之基礎。然而中國忽視了日本的眞意，動員大軍，對日挑戰，故日本不得不採取僅以武力對抗之一途。」

此外若於駐紐約總領事，於去年十月十五日在電台中演說：

「過去十五年間，中國雖採取排日侮日政策，而日本仍竭力維持鄰善關係。若他國處於日本之立場，我想一定不能如日本這樣的容忍吧？忍耐是一種美德，但亦有限度。當超過限度時，無論何國，自不能不採取必要的步驟。」

日本時常用「日本有拯救東亞赤化使命」之口號，對美宣傳。但是美國人民，對於共產主義思想之觀念和態度，却和日本所想像者不同。共產主義在目前富有之美國人民中，到底不能實行，且非大多數美國人民的對手。不過僅因好奇心所驅使，內地一部分人民，對之加以研究，或稍被沾染而已。所以日本大舉「消滅共產主義」之旗，對美宣傳，可以說無絲毫之效果。美國人民所憎惡者，毋寧說是法西斯，但日本正是法西斯主義國家。若說共產主義是民主政治之敵，日本欲打倒共產主義而想引起美國的同情，乃屬錯誤而且不當。所以日本對美宣傳時，還是不用「消滅共產主義」口號較爲賢明。如果過於利用，反引起人民之猜疑。在美國，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相信蔣介石將軍會傾向赤化。有些人更認爲中國政府與共產黨相提攜，是一種對日作戰的手段，事出無法。所以日本之：

「蔣介石將軍在西安與中國共產黨妥協，中止繼續八年間的共產黨征伐政策。」（紐育日本人商業會議所發行，「The Sino-Japanese Crisis」）

和「日本政府，爲防止東亞共產化，願付以相當的犧牲，此種努力，在中國方面亦有相當的認識。」（日本外

交協會發行「Who Japan has to fight in Shanghai」）



等宣傳，在美國毫無效果，反之恐有百害而無一利。

更有想煽動美國人民，對於日本發生好印象，而使人發出苦笑之宣傳，試舉其一例：

「今蘇聯公然供給中國以武器彈藥，想在中國着手全面赤化，美國政府因此，對政府所有之船舶居然禁止輸送武器彈藥前往中國，此誠可以值得稱贊的漂亮態度……」（京都某實業家著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此外日本對歐美討歡的應酬語，更不值吾人一笑：

「在歐美，對日本縱有發生不利的事件，日本亦不派兵，因為那些國家，對待日本人很合理，故無派兵之必要；換言之，對堂堂法治國家，實無派兵之必要。」（Charles B. Kinny “Some Facts on the Sino-Japanese Un-declared War in China”）

如利用「中國不統一，及無自治之能力」等論調，和歐美來比較，宣傳上說起來雖屬巧妙，可是太危險了。

日本因為中國不能好好地維持治安，為保護日本及外國之權益起見，不得不在中國發生戰爭。以此種論調作根據的宣傳：

「問 戰事勃發以前，在華駐屯軍，曾經做些什麼工作？」

答 日本和列強一樣，為保護在華日人之財產生命起見，故駐兵中國。因為在無治安的中國，外人之生命財產，往往發生危險。」（太平洋親善協會加州委員會 “What is Fighting About?”）

日本想避免外人對本國不利的批評，故意引起外人恐怖的心理，旋運用其巧妙宣傳：

「日本除滿州華北外，幾無平安供給日本原料之國家，列強對滿州華北，雖不仰給原料，縱仰給之亦無困難。」



而日本對華北及滿州的原料供給却極必要。若列強爲日本而將華北滿州加以閉鎖，於是日本則非尋求其他安全供給原料之國家不可，但別國是否肯供給日本呢？萬一不肯的話，那麼結果勢必『戰爭』」（外務省情報部部長河合道雄論文）

日本此種宣傳，無疑的是恫嚇列強，意即如果列強干涉中日戰爭，其本國則有捲入戰禍之可能，但各國人民，是否即因此恫嚇，而任日本在中國搾取侵略呢？

「日本文化，並非是站在侵略歷史上所發展者，大和民族，亦非依靠侵略而發展。日本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吸取新文化，同時創造新文化，日本的國民個個愛好和平。」（一松代議士廣播演說）

「日本之基本政策，乃在確立東亞的安定與和平。此非技術的問題，而是道德的問題。」（若杉紐約總領事廣播演說）

「日本之最後目的，亦在確立東亞的和平，此乃按照一八二三年門羅總統，和一九〇五年羅斯福總統所忠告的方策，而實行者。」（金子堅太郎語）

外交史上，美國所主張之門羅主義，與日本所倡之亞細亞門羅主義，其本質上是否同樣，確有精密研究之必要。總之，日本之宣傳，利用美國之專有名詞——「門羅」，吾美國人民，對此頗有不快之感。

日本雖然拚命的宣傳中國的國民，不是愛好和平的國民，而是好戰的國民。但此種論調頗有疑問。在中國近代史上，吾人可以看到中國被列強侵略的事實，而從未看到中國有侵略鄰國的事例。在日本方面，固認爲中國對日本挑戰之蓄意已久，試舉日本所宣傳者：

「未發生戰爭，未必即是和平，例如在中國時常發生之挑戰行爲，暴行事件，在華外人之合法權益和生命時



常感受威脅。」（日本外交協會發行“*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Short Survey*”）

「試問中國對於日本之協調外交，取何態度？南京濟南事件之發生，莫非是中國想收回旅順大連，奪取日本在滿州之合法權益，一種對日挑戰行爲。所以東北事變之勃發，即起因於中國態度的不誠實。」（太田三郎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 Affair*”）

日本聲明「有保護在華利益的權利，故此次戰爭實爲合法。」試舉英文大阪每日新聞所發行之中國事變一書附錄中所云：

「自戰爭爆發後，從中國各地撤退之日本僑民約有五萬人。……日本在華權益並投資總額約達十四億圓，幾占日本在外投資總額百分之八十。所以日本此次開調軍隊，並非有領土之野心，乃爲生存之原則而戰。換言之，日本保護在華權益，乃日本帝國之死活問題。這點是日本之要求，與列國之主張根本不同處。」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廣播演說：

「現在在日本的中國人，不下二萬六千人，在美國的中國人約有七萬五千人。在海外之中國人總數，比在華外人總數爲多。換言之，即在外華人受有較多之利益。然而中國，却不像外國保護中國僑民一樣地來保護在華外人。在日數千的中國留學生，以及數萬的中國商人，皆平靜的從事讀書和商業。自戰事爆發後，日本當局對之，從未採用絲毫不法行爲……」

又據去年八月廿九日日本駐紐約副領事稻田，在W O X R無線電台之演說：

「中國是一個無組織法的國家，在華外人一旦若無本國軍隊之保護，則時有被殺害之危。所以美國和其他列強，皆駐兵中國。美國政府，常年駐紮軍隊和軍艦於外國者，除中國外無他國。中國軍隊大都無統制，一遇機會即



任意搶奪。例如中國之實業家和銀行家，不信任本國之軍隊與省主席，故中國十分之八以上之資金，均儲存在上海公共租界外商銀行內，在外國人之保護下保管之。」

但據中國方面的宣傳，則事實大相逕庭。因此美國人民對日本之宣傳，不得不起疑竇之心。

藍衣黨的活動，為日本最所憂慮者，所以從日本方面而來的宣傳品，大都對藍衣黨加以攻擊。例如：

「現在事實上，支配中國的是藍衣黨。其會員最近已由一萬人增到百萬人。藍衣黨通同國民黨，和在國民黨支配下之許多秘密結社，實行排日政策，給日本以最大的威脅，故日本非完全將此種無形之大勢力，加以消滅不可。」

目下宣傳手段中之一種，即盡量描寫敵兵之殘暴行為。中國方面之目標，則集中在打倒日本軍國主義身上。但日本亦不甘示弱，如半官半民式之同盟通信社，所散布之「通州事件中國兵之殘虐性」一項消息，可做代表。日本外交協會並列舉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止之中國士兵對日人虐殺事件，向世界宣布，指摘中國人之殘暴性，冀獲世界的同情。但日本對於「中國人為何對日本人如此殘虐」之理由則少提及，此為日本宣傳所失敗之處。中國方面則指出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國，乃因瘋狂的軍閥，在指導着日本的國政。在歐美，因為日本是九國公約簽字國之一，日本在中國之行動，乃違背該公約，所以對日本，頗多攻擊。日本對於此點之反駁，則甚消極。中國以反抗殘暴心理為根據來宣傳，實比日本為占優勢。在美國許多畫報照相中，看見無數之日本兵士殘暴場合，和幾萬之難民羣，確引起美國的同情。而日本於去年十月九日之日本外務省聲明書中稱：「上海市政府當局，將有把在上海之三萬日人，一齊加以殺害的計劃。」但事實是否如此？無疑，這是日本的虛構。

「日本是東亞文明之擁護者，」這的確是一句很好聽的口號，「假使中國赤化，或者政權操在無責任的軍閥手



中，則中國四萬萬民衆，勢將不堪其苦。同時在華外人之生命財產，以及其一切權益，將到如何地步，實非吾人所想像。」

——如此的文明擁護論，作者認爲與事實不合。當中國誤炸匯中飯店和胡佛號郵船事發生後，日本即大事宣傳：此乃「中國飛機故意之暴舉」！自經中國政府之道歉賠款後，日本之宣傳目的，亦成泡影。

宣傳戰，無疑是一種技術戰。日本宣傳技術較中國爲拙，已是不能諱言的事實。現舉去年十月廿四日之“*Times*”（外務省機關報）芝染太郎所發表之論文——「宣傳和武士道」——中的一段，即可明瞭此亦爲日本自己所承認：

「日本宣傳之所以如此笨拙，乃因日本民族，僅賴嘴在作表面上之辯解，並未配以武士道精神……軍用嘴來爭論，無疑，日本人是弱者，若揆諸戰爭，則日本是世界最強者。若希望宣傳戰而獲勝利，無寧說是失敗者倒爲痛快……」

日本對外宣傳之中樞機關，計有外務省之文化事業部，陸軍省之新聞班，海軍省之軍事普及部，此外如最近設置直屬於首相之內閣情報部。



# 蘇聯怎樣奠下建國的基石？

白芒譯

## 一 干涉和內戰消滅後的蘇維埃國家·恢復時期的困難

戰爭結束之後，蘇維埃國家開始轉到和平的經濟建設的軌道。必須醫治戰爭所帶來的創傷。必須恢復被破壞的國民經濟，把工業，運輸，農村經濟引入秩序。

但轉向和平的建設，是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來進行的。內戰的勝利不是輕易獲得的。國家被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和三年的與干涉的戰爭所破產了。

一九二〇年農村經濟的總生產只約及戰前的一半。而且戰前的水準是貧困的，沙俄農村的水準。加以一九二〇年許多省份都被歉收所包括。農民經濟度着困難的境遇。

更壞的是處於荒廢狀態中的工業情況。一九二〇年大工業的生產品比戰前約少七倍。大多數工廠和製造廠停頓了，礦井和礦山被破壞了，被焚燬了。五金工業處於特別困難的狀況中。整個一九二一年銑鐵的熔鑄總只有十一萬六千三百噸，就是說，只及戰前銑鐵生產的百分之三。燃料不夠了。運輸被破壞了，國內所有的金屬和雜貨的屯積差不多都用盡了。國內異常缺乏最必需的用品：麵包，脂肪，肉類，鞋子，衣服，洋火，鹽，煤油，肥皂。



當戰爭進行的時候，人們安於這種缺乏和不足，而有時甚至於不指出這些。但現時，當戰爭已經沒有了，人們忽然感覺到這些缺乏和不足之不能忍耐並開始要求立刻消滅牠。

農民中的不滿表現出來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軍事——政治聯盟是在內戰的火焰中創立和鞏固起來的。這種聯盟是支持在一定的基礎之上：農民從蘇維埃政權方面得到土地並保衛牠不受地主、富農的侵犯，工人則依糧食徵收制從農民方面得到糧食。

現時這種基礎覺得已經不夠了。

蘇維埃國家不得已依照糧食徵收制從農民方面取得對國防所需要的全部剩餘。沒有糧食徵收制，沒有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內戰的勝利將不可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戰爭干涉所逼迫出來的。當戰爭在進行時，農民是同意糧食徵收制而且不覺商品的缺乏，但當戰爭已告結束以及地主翻身的威脅已成過去，農民對全部剩餘之被取已開始表示不滿，不滿糧食徵收制並開始要求足量商品之供給。

如列寧所指出，整個戰時共產主義制度與農民的利益相衝突了。

自發的不滿也波及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把內戰重要的負擔移到自己身上，他英勇地和自我犧牲地反對白黨和干涉者的軍勢，反對荒廢和飢饉。優秀的，最覺悟的，最具自我犧牲精神的和最紀律化的工人們燃着革命熱誠的火焰。但深刻的經濟破壞也影響到工人階級。少數還開工的工廠及製造廠在工作中遭逢更多的罅隙。工人被迫從事小手藝，發火器的製品，祕密的買賣。無產階級獨裁的階級基礎開始削弱，工人階級渙散了，一部份工人退歸農村，不成爲工人了，非階級化了。一部份工人的不滿在飢饉和疲憊的基地上表現出來了。

在黨的前面提出了製定適應新環境的，全國經濟生活一切問題的黨的新配置。



黨着手製定了一切經濟建設問題的新目標。

但階級的敵人沒有睡着。他企圖利用困難的經濟狀況，企圖利用農民的不滿。在西伯利亞，在烏克蘭，在坦卜夫斯基省（安頓諾夫派）爆發了白黨和社會革命黨所組織的富農暴動。各種反革命份子——門雪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白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的活動復活了。敵人轉向反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新策略。他開始塗改蘇維埃花朵的顏色而提出的已經不是舊的，已經失敗的口號：「打倒蘇維埃」而是新的口號：「擁護蘇維埃，但不要共產主義者。」

克倫斯達反革命的叛亂——是階級敵人新策略的明顯表現。這種反叛是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一星期前開始的。這個反叛的首領是與社會革命黨，門雪維克以及外國的代表們相聯繫的白軍。反叛者自己的意向是在恢復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及私有財產制度，在初期他們是竭力用「蘇維埃」的招牌來掩飾的。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沒有共產主義者的蘇維埃。」反革命企圖利用小資產階級羣衆的不滿，籍以在似是而非的蘇維埃口號之下來推翻蘇維埃政權。

兩種情況使克倫斯達的反叛易於產生：在軍艦上的海員成份之惡化以及在克倫斯達布爾塞維克組織之薄弱。參加十月革命的舊海員差不多每個都退回戰場上並參加紅軍隊伍作英勇的戰鬥。沒有在革命中受過鍛鍊的，新的補充也加入艦隊。這些補充者是反映農民不滿糧食徵收制的，完全未熟的農民羣衆。至說到那個時期克倫斯達的布爾塞維克組織，牠因戰場上的動員而激劇地削弱了。這些情況使社會革命黨門雪維克及白軍有可能爬到克倫斯達並佔領牠。

叛軍取得了頭等的堡壘，軍鎗，大量的武器及子彈。國際的反革命謳歌勝利了。但敵人的歡呼太早了。叛軍迅速地



爲蘇維埃軍隊鎮壓下去。黨遣派其最優秀的兒女——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以瓦洛錫洛夫爲首去反對克倫斯達的反叛者。紅軍士兵沿着薄冰進到克倫斯達。冰融化了，溺斃很多人。終於突擊幾乎不可逾越的克倫斯達砲臺。對革命的忠誠以及不辭艱苦，情願犧牲性命以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決心佔着上峯。克倫斯達砲臺爲紅軍的突擊所佔領了。克倫斯達的反叛被消滅了。

## 二 黨內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反對派的失敗，向新經濟政策轉移

黨的中央委員會及其列寧的多數派曾經明白在戰爭消滅及向和平的經濟建設轉移之後，沒有更多的根據來保留由戰爭和封鎖的環境所創立的戰時共產主義的嚴格制度。

中央委員會了解糧食徵收制的必要性墮失了，應以糧食稅來代替牠，使農民有可能隨意利用他自己生產剩餘的大部份。中央委員會了解此種辦法提供復活農村經濟，擴大發展工業所必需的五穀及技術原料之生產，復活全國的商品流轉，改善城市的供給，創立工農聯盟新經濟基礎的可能。

中央委員會也估計到工業的復活是最先的任務；但牠認爲沒有吸收工人階級及其職工會來參加這個事業，工業的復活是不可能，如果使他們相信經濟的荒廢也如干涉和封鎖一樣，同是人民危險的敵人，相信黨和職工會無條件地會進行這種事業，如果牠們對工人階級不用軍令的辦法來行動，如在戰場上常有的一樣，那裏軍令是真正必須的，而用說服的辦法，說服的方法，是可以吸收工人來參加這個事業的。

但不是全體黨員都如中央委員會那樣的想法。



各反對派——托洛斯基派，「工人反對派」，「左派共產主義者」，「民主中央派」等——處於混亂的狀態中並在向和平的經濟建設軌道轉移的困難性前面動搖。黨內會有不少過去的鬥雪維克，過去社會革命黨人，過去的猶太職工派，過去的鬥爭派以及從俄國各區來的，五花八門的半民族主義者。他們大部份是附和於各種各樣的反對派集團。他們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知道經濟發展的法則，沒有黨的——列寧的鍛鍊，這些人只加強了反對派集團的混亂和動搖。他們中有些人想無須削弱戰時共產主義嚴格的制度，有的，相反地，想必須「更加旋緊螺旋釘」。別的思想黨和國家應當從國民經濟恢復事業的方面離開，這種事業應當全盤轉移到職工會手裏。

很明顯的，在此種混亂的條件之下，在黨的若干階層中可以找到一種，爭論的愛好者，各種反對派的「領袖們」，他們竭力逼黨爭論。

爭論就這樣地發生了。

爭論是從職工會的作用問題開始，雖然關於職工會的問題在當時不能成爲黨的政策之主要問題。

托洛斯基是反對列寧，反對中央委員會列寧多數的爭論和鬥爭之急先鋒。他想把情況尖銳化，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在第五次全俄職工會臨時大會的共產主義者代表會議上提出「旋緊螺旋釘」，「盪搖職工會」的可疑口號。托洛斯基提出「職工會」立刻「國家化」的要求。他是反對說服工人羣衆的方法。他贊成把軍事的方法移到職工會中去。托洛斯基反對職工會民主的開展，反對職工會機關的選舉制度。

托洛斯基派提議露骨強制，露骨指揮的方法以代替工人組織的活動，沒有牠將成爲無意義的說服方法。在受托洛斯基派領導的職工會工作中，他們就用自己的政策把衝突、分裂和解體帶到職工會中去。托洛斯基派用自己的政策恢復無黨籍的工人羣衆來反對黨，來割裂工人階級。



職工會的爭論在事實上比職工會問題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如較遲一點在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的議決案中所指出，爭論在事實上牽涉到「對已經起來反對戰時共產主義的農民關係問題，對無黨籍的工人羣衆關係問題，一般地說是牽涉到內戰業已開始時期黨對羣衆的態度問題」（聯共（布）決議案第一冊，第六五一頁）。

其他反黨的派別跟着托洛斯基之後也起來了：「工人反對派」（舍列普尼考夫，米特維志夫，柯崙泰及其他）、「民主中央派」（沙普朗諾夫，多洛布尼斯，博高斯拉夫斯基，奧辛斯泰，斯米爾諾夫及其他）、「左派共產主義者」（布哈林，普列奧·拉任斯基）。

「工人反對派」提出整個國民經濟管理權移交「全俄生產者代表大會」的口號。在經濟建設中牠取消了黨的作用，否定了無產階級獨裁的意義。「工人反對派」把職工會與蘇維埃國家及共產黨對立起來。牠認爲工人階級組織最高的形式不是黨而是職工會。「工人反對派」本質上是無政府——辛提嘉主義者的反黨派別。

「民主中央主義」派要求小組織和派別的完全自由。民主中央派也如托洛斯基派一樣企圖破壞黨在蘇維埃和職工會中的領導作用。列寧把民主中央派叫做「比一切叫喊還要大聲」的小組織，而民主中央派的綱領是社會革命黨——門雪維克的。

在反列寧和黨的鬥爭中，布哈林幫助了托洛斯基。布哈林與普列奧——拉任斯基，舍列卜略考夫，沙考列尼考夫一起創立「緩衝」派。這派擁護和掩飾最兇惡的祕密的小組織者——托洛斯基派。列寧稱布哈林的行爲是「思想墮落的堆積」。布哈林派很快與托洛斯基派公開地聯合起來反對列寧。

列寧及列寧主義者把主要的打擊朝向反對作爲反黨派別基本力量看待的托洛斯基派。他們提出托洛斯基派



把職工會與軍事組織混合起來的罪證之後，告訴他們不能把軍事組織的方法，移到職工會中去。列寧及列寧主義者製定了自己的綱領以抵銷反對派的綱領。在這個綱領中指出職工會是管理的學校，經營的學校，共產主義的學校。職工會應當把牠自己的整個工人建立在說服的方法之上。只在此種條件之下職工會才能發動一切工人與經濟的破壞作鬥爭，才會吸收他們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

在與各反對派的鬥爭中，黨的組織在列寧的週圍團結起來了。在莫斯科的鬥爭是有特別緊張的性質。反對派在這裏集中其基本的力量目的在爭取首都的組織。但莫斯科的布爾塞維克給秘密小組織者這種襲擊以堅決的抵抗。在烏克蘭的黨組織中也展開了尖銳的鬥爭。烏克蘭的布爾塞維克由當時在那裏充當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的莫洛託夫同志領導之下粉碎了托洛斯基派和斯列普尼考夫派。烏克蘭的共產黨依然是列寧黨的忠實支柱。在巴庫粉碎反對派是在奧爾容尼豈志同志領導之下組織起來的。卡加諾維切同志在中亞細亞領導與反黨派別作鬥爭。

一切基本地方的黨組織都附和列寧的綱領。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有六百九十四位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七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個黨員。發言權的代表有二百九十六人。

代表大會把職工會的爭論做個總結並以壓倒多數的票數批准列寧的綱領。

列寧致開會詞之後就聲明此種爭論是不容許的奢侈。他指出敵人企圖用內部的鬥爭來分裂共產黨。

代表大會估計了現有的小組織派別對布爾塞維克黨，對無產階級獨裁是最大的危險之後，特別注意到黨的統

一問題。列寧對這個問題作了報告。全國代表大會裁制了各反對派並指出他們「在事實上是幫助了無產階級革命



的階級敵人。」

全國代表大會下令立刻解散一切的小組織派別，並委託各組織嚴格注視不容許的任何小組織的活動，同時不執行全國代表大會議決者無條件並立刻地開除黨籍。全國代表大會賦予中央委員會全權，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破壞紀律的情形下以及在復活或允許小組織的情形下採用黨的一切懲罰方法，把他們從中央委員會及從黨內開除出去。

一切這些決定都寫在列寧的提議之中，並由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個「關於黨的統一」的特別議決案。

在這個議決案中全國代表大會請全體黨員注意黨的隊伍之統一和團結，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的統一，這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期因許多情況使國內小資產階級人民動搖加強的那個時候特別必要。

「同時——在議決案中指出——遠在關於職工會的全黨爭論之前，黨內已經發現了小組織的若干標誌，就是說已產生具有特殊綱領並在某種程度上企圖閉塞和創立自己派別紀律的小派別。必須使覺悟的工人明瞭在事實一定引到和睦工作之削弱和牠的敵人混入執政黨中加深分裂，並利用牠達到反革命目的之企圖的加強，重演的任何小組織之有害和不許。」

再，全國代表大會在這個議決案中說：

「無產階級的敵人利用一切離開嚴格堅定的共產主義路線的傾向，這在克倫斯達反叛的實例中最明顯地表現出來，那個時候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和世界各國的白黨立刻表現其決心，甚至採取蘇維埃制度的口號，只要推翻俄國無產階級的獨裁，那個時候社會革命黨和一般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在克倫斯達利用暴動的口號好像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名義之下反對俄國的蘇維埃政府。這些事實完全證明白黨企圖而且會塗上共產主義者的顏色，甚至於比他



們「更左些，」只要削弱和推翻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柱。克倫斯達反叛的前夜，比得格勒的門雪維克的刊物也同樣地示出門雪維克利用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使實際上推動和贊助克倫斯達叛軍，社會革命黨人及白黨，在言詞上裝做是反叛的反對者和蘇維埃政權的同流，好像只附帶些少的修正。」

議決案指出：黨的宣傳應當以黨的統一及無產階級先鋒意志統一之實現，是無產階級獨裁勝利基本條件的觀點，事實地解析小組組織活動之有害及危險性。

在全國代表大會的議決案中又說到另一方面黨的宣傳應當解析蘇維埃政權敵人最新策略方法的特徵。

「這些敵人——議決案指出——已信任公開白黨旗子之下反革命之無希望，現在竭其一切努力利用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用把政權轉移給外表上最接近於承認蘇維埃政權的政治派別之某種方法來推進反革命」

（聯共（布）議決案第一卷，第三七三——三七四頁。）

議決案繼續指出黨的宣傳「應當剖明過去革命的那些經驗，那個時候反革命贊助最接近於頂革命的政黨之小資產階級的派別，使動搖和推翻革命的獨裁，用這種方法替資本家和地主的反革命開一條進一步完全勝利的道路。」

也由列寧提議，經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吾黨新狄卡及無政府主義傾向」之另一議決案密切地接合於「關於黨的統一」之議決案。

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個議決案中討論了所謂「工人反對派」全國代表大會承認宣傳無政府——新狄卡主義傾向的思想不能插足於共產黨並號召全黨與這種傾向作堅決的鬥爭。

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由糧食徵收轉到糧食稅，轉到新經濟政策之最重要的議決案。



在這個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中，表明列寧政策之全部的智慧 and 遠見。

在全國代表大會的議決案中說到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收。自然物的糧食稅較糧食徵收爲少。稅收的總數應在春耕之前公佈出來。精確地規定納稅的期限。稅則之外剩下的一切歸農民完全支配，賦予後者販賣這些剩餘的自由。列寧在自己的報告中指出貿易的自由開始引到國內資本主義的若干復活。從而允許私人的貿易和准許私人工業家開設小企業。但無須害怕這一點。列寧認爲商品流轉的若干自由在農民方面創立經濟的利益性，提高他的勞動生產率並歸結到農村經濟迅速的高漲，國家工業在這個基礎上將恢復起來，並將排擠私人資本，積累力量和資財可以創立雄偉的工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後轉到堅決的進攻，籍以消滅國內資本主義的殘餘。

戰時共產主義是用突擊和巧妙的進攻以奪取城市和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堡壘之嘗試。在這個進攻中黨跑得太前，冒險與牠的基礎相脫離。現時列寧提議稍微後退一點，暫時退近自己的後方，從突擊轉到更長期的包圍堡壘，積聚力量，籍以從新開始進攻。

托洛斯基派及其他反對派者們認爲新經濟政策只是退却。此種解析對他們是有益的，因爲他們是採取恢復資本主義的路線。這是對新經濟政策非常有害的，反列寧的註釋。實際上，就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一年之後列寧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聲稱退却業已結束了，並提出一個口號：「準備向個人經濟的資本進攻。」（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一三頁。）

反對派是頂壞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布爾塞維克政策問題最大的笨漢，無論新經濟政策的本質或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所採取的退却之性質，他們都不了解。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本質在上面已經說過了。至說到退却的性質，那末退却是各種各樣的。有一個時候，當時黨或軍隊被迫退却，因是牠是失敗了。在那種場合下軍隊或黨退却是爲着保留



自己以及保留自己的幹部以作新的戰鬥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列寧完全不是提出這種的退却因爲黨不僅沒有失敗和沒有被擊破，而且相反地，牠自己在內戰時期粉碎了干涉者和白軍。但也有時候，當時得勝的黨或軍隊在其進攻中跑得太前，不能保證自己的後方根據地。這形成嚴重的危險性。在那種場合下有經驗的政黨或軍隊找到平常所需要的，使不與自己的根據地相脫離，稍微後退一點，接近自己的後方，與自己後方的根據地更加鞏固地聯繫起來。保證自己的全部必要，以後從新走向更堅決，更有勝利把握的進攻。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就運用此種暫時的退却。列寧向共產國際第四屆世界代表大會報告施行新經濟政策的原因時，就直接說到「我們在其經濟的進攻中前進得太遠了，我們不能保證自己的充份的根據地，因此必須採用向有保證的後方暫時退却。」

反對派的不幸就在於牠自己的愚蠢不了解而且一輩子不能澈底了解新經濟政策時退却的此種特性。

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新經濟政策的議決案，保證了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鞏固的經濟聯盟以建設社會主義。

全國代表大會的其他議決案——關於民族問題的也是服從這種任務的基礎。斯達林同志做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斯達林同志說我們消滅了民族的壓迫，但還不夠。任務是在於消滅以前的困苦的遺留——先前被壓迫諸民族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落後性。在這種關係上應當幫助他們趕上中部俄羅斯。

再，斯達林同志指出在民族問題中有兩種反黨的傾向：大強國的（大俄羅斯的）狹義愛國主義和地方的民族主義。全國代表大會判定這兩種傾向是對共產主義及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之有害和危險的傾向。同時全國代表大會把自己的主要打擊朝向反對主要危險的大強國主義，就是反對在沙俄時代大俄羅斯狹義愛國主義者對於俄羅斯民族所表現出那種關係之殘餘和遺跡。



### 三 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總結，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創立，列寧的疾病，列寧的

#### 合作社計劃，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新經濟政策之施行遇到黨內不堅定份子的反抗。反抗是從兩方面進行的。一方面是「左的」狂吠者之發言如羅勉納志，沙切金等型的政治畸形者，他們「證明了」新經濟政策是放棄了十月革命所爭取的勝利，是向資本主義的回轉，是蘇維埃政權的顛覆。這些人因為它自己對政治的無知以及不懂經濟發展的法則，不了解黨的政策，陷入狼狽狀態，並在自己的週圍散播消極的情緒。另一方面，是簡直投降主義者的發言，如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諾維夫，沙考利尼柯夫，康米尼夫，斯列普尼考夫，布哈林，黎考夫及其他，他們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的「全能」前面屈服，並企圖在蘇維埃國家內鞏固資本主義的陣地，要求對國內及國外的私人資本大大地讓步，要求在國民經濟中把蘇維埃政權的許多最高司令臺在租借地或私人資本參加的混合股份公司原則上讓給私人資本。

無論這些或那些都是外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

黨揭露了並孤立了這些或那些份子。黨給手足無措者和投降屈服者以堅決的抵抗。

對黨的政策之現有的此種反抗再度憶及黨肅清不堅定份子之必要。因此中央委員會對黨的鞏固進行了巨大的工作，組織了一九二一年的清黨。清黨是要有非黨份子參加的公開會議上來進行的。列寧忠告認真地清黨「……清出詐欺者，官僚化者，不忠實者，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以及清出「正面」塗得非常好而精神上依然是門雪維克



主義者的門雪維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三頁。）

清洗的結果從黨內被開除出去的共計有十七萬人，或者約及全體黨員的百分之二十五。

清洗大大地鞏固了黨，改善了牠的社會成份，加強了羣衆對黨的信仰，提高了牠的權威。黨的團結性和紀律性增長了。

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年就示出其正確性。向新經濟政策轉移大大地鞏固了在新基礎上的工農聯盟。無產階級獨裁的全能和堡壘也增長了。富農的土匪行爲幾乎完全被消滅了。農民中農在糧食徵收制度取消之後幫助了蘇維埃政權與富農匪類作鬥爭。蘇維埃政權把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指揮陣地都保留在自己手裏：大工業，運輸，銀行，土地，國內貿易，國外貿易。

黨在經濟戰線上達到了大改革。農村經濟很快地向前推進。工業和運輸達到了初次的勝利。暫時還很緩慢，然而可靠的經濟興旺業已開始了。工人和農民感覺到並且看到黨是站在正確的道路上。

一九二二年三月黨召集了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代表大會上參加了五百二十二位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五十三萬二千個黨員，就是說比上屆全國代表大會的人數爲少。發言權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黨員人數的減少，可以用已經開始的清黨來解析的。

在全國代表大會上歸納了新經濟政策第一年的總結。這些總結允許列寧在全國代表大會聲明：

「我們退却已經一年了。我們現在應當代表黨說：够了！退却所追求的那個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正在結束，或者已經結束了。現在提出另一個目的——力量的從新編配。」（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二三八頁。）

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不是拚活而是拚死的殘酷鬥爭。「誰戰勝誰」——問題是



這樣提出。爲要勝利應當用盡量發展城市及農村間商品流轉的方法，保證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民經濟間的聯結。爲此必須學會經營，必須學會斯文地貿易。

貿易在這個時期是立在黨前面的任務鍊子中基本的一環。不展開城市與鄉村間的商品流轉，不鞏固工農的經濟聯盟，不提高農村經濟，不把工業從荒廢中引出，解決這些任務是不可能的。

同時蘇維埃的貿易還是非常薄弱。貿易機關也很薄弱，在共產主義者方面還沒有貿易的習慣，還沒有研究了敵人——新經濟政策下的資本家，還沒有學會與他們作鬥爭。私有的商人們，新經濟政策下的資本家們利用了蘇維埃貿易的弱點把正頭以及其他日用必需品的貿易都抓在它們自己的手裏。關於組織國家及合作社貿易的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經濟的工作又以新的力量沸騰起來。勝利地消滅了遍滿全國的凶年的結果。農村經濟很快地恢復起來。鐵道更好地開始工作了。從新工作起來的工廠和製造廠的數量愈益增加起來。

一九二二年十月蘇維埃共和國慶祝巨大的勝利：遠東的紅軍及游擊隊把海參崴——留在干涉者手裏的蘇維埃土地之最後地段從日本干涉者方面解放出來。

現時當蘇維埃國家的整個領土已從干涉者方面肅清出來，而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的諸任務要求進一步鞏固蘇維埃國家各民族的聯盟，日程上提出把各蘇維埃共和國更密切地聯合爲統一的國家聯邦問題。應當把一切民族的力量聯合起來以建設社會主義。應當組織強固的國防。應當保證我們祖國一切民族多方面的發展。爲着這個目的必須把蘇維埃國家的各民族更加接近起來。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全聯邦蘇維埃第一屆代表大會召集了。在這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列寧和斯達林的提議，



曾經創立蘇維埃諸民族自願的國家聯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最初加入蘇聯的有俄羅斯蘇維埃聯盟社會主義共和國（蘇俄）、外高加索蘇維埃聯盟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稍遲一點在中央亞細亞組織了三個獨立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烏茲貝克、土爾克曼及塔吉克。現時一切這些共和國在自願與平等的基礎上，其中每一保留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聯合為蘇維埃國家統一的聯邦——蘇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創立是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布爾塞維克黨對民族問題的列寧、斯達林政策的巨大勝利。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的全體會議上發表演說。列寧把蘇維埃政權存在的五年作個總結之後，確信地指出「從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將變為社會主義的俄羅斯。」這是他對全國的最後發言。一九二二年秋季黨遭遇了極大的不幸：列寧病重了。整個黨，一切勞動者把列寧的疾病當做自己的哀戚。一切人活着都為可愛的列寧的生命而擔憂，但列寧就在抱病的時期內也沒有停止他自己的工作。雖已重病，列寧還寫了許多很重要的論文。在這些最後的論文中，他把已進行的工作做個總結，並指出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方法以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在這個計劃中列寧提出他自己的併合農民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的合作社計劃。

列寧在一般的合作社中特別是在農村經濟合作社中看到千百萬農民所能接收和了解的，從小的個人經營向大的共同生產的組合——集體農場轉移的道路。列寧指出吾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應當向透過合作社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走去，向集體主義原則逐漸貫輸到農村經濟的道路走去，開始在消費領域內，而以後在農產品生產領域內，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獨裁和工農聯盟的條件下，在對農民關係上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條件下，在現



有的社會主義工業條件下，正確地組織，包括千百萬農民的生產合作社，是在牠幫助之下，在吾國可能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工具。

一九二三年四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集了。這是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之後列寧不能參加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全國代表大會上參加了四百零八位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三十八萬六千個黨員，就是說比上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爲少。這裏表現出清黨依然繼續，有很大成數的黨員從黨內開除出去的結果。發言權的代表有四百一十七人。

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列寧在其最後的論文和信札中所提供的一切指示都估入自己的議決案中去。

全國代表大會對把新經濟政策當做從社會主義陣地退却，當做向資本主義屈服的一切人，對提議向資本主義賣身投靠的一切人以堅決的抗拒。托洛斯基的同僚，拉狄克和克拉辛在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提出這些建議。他們提議對外國的資本主義討好，把蘇維埃國家切身需要的工業部門租借給他們。他們提議償付十月革命所取消的沙皇政府的債款。黨把這些提議當做叛逆的加以惡評。黨不放棄租借地的政策，但只在有益於蘇維埃國家的那些部門和那些範圍之內。

遠在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布哈林和沙考列尼柯夫就提議取消對外貿易的獨佔。這種提議也是把新經濟政策向資本主義屈服去了解的結果。列寧當時惡評布哈林是投機者新經濟政策下的資本家，富農的保護人。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堅決地駁斥對對外貿易牢固性的侵犯。

全國代表大會也給托洛斯基以對農民的毀滅政策迫黨的企圖以抗拒。全國代表大會指出不可忘記小農經濟在吾國佔優勢的事實。牠着重指出工業的發展，重工業也在內，應不是與農民羣衆利益相反的方向進行，而是與牠們



聯結爲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這些議決是朝向反對托洛斯基，他提議用剝削農民經濟的方法來建設工業，這實際上不承認工農聯盟的政策。

托洛斯基同時提議封閉有國防意義的那些大製造廠，如普切洛夫斯基，卜良斯基以及別的如他所斷定是沒有獲利的。全國代表大會不滿地駁斥了托洛斯基的提議。

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用書面遞到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把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工農檢查委員會合併起來。這個機關所負的任務是保衛吾黨的統一，鞏固黨和國家的紀律，盡量改善蘇維埃國家的機關。

全國代表大會對民族問題也加以嚴重的注意。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者是斯達林同志。斯達林同志着重指出我們民族問題政策的國際意義。西方和東方的諸被壓迫民族在蘇維埃國家中看到民族問題解決和民族壓迫消滅的模範。斯達林同志指出必須奮勇地工作以消滅蘇聯各民族間經濟和文化的平等。他號召全黨與民族問題中的諸傾向——大俄羅斯的狹義愛國主義以及地方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作堅決的鬥爭。

在全國代表大會上曾經揭破民族——傾向者及他們對少數民族的強國政策。當時喬治亞的民族——傾向者門志萬及其它曾經起來反對黨。民族——傾向者曾經反對外高加索聯盟的創立，反對外高加索諸民族和睦的鞏固。傾向者曾經把自己當做真正的強國狹義愛國主義者對待喬治亞的其牠民族。他們把一切非喬治亞，特別是亞爾曼尼亞人從伏夫里斯遷徙出去，頒佈法律，根據這，凡與非喬治亞人結婚的喬治亞女子，喪失喬治亞的公民資格。托洛斯基，拉狄克，布哈林，斯克利普尼克，拉考夫斯基贊助了喬治亞的民族——傾向者。

全國代表大會之後立刻召集各民族共和國的民族問題工作人員的特別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曾經揭破韃靼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派別——蘇爾旦——加利埃夫及其牠和烏茲貝克民族——傾向者——法伊茲拉，賀特瑪埃



夫等。

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兩年來新經濟政策的結果做個總結。這些結論鼓起最後勝利的勇氣和信心。

「我們的黨依然是團結的，緊密的，經得起偉大的轉變，帶着廣泛地展開的旗子向前邁進，」斯達林同志在全國代表大會上曾經這樣說道。

#### 四 與國民經濟恢復的困難性作鬥爭，因列寧的臥病，托洛斯基

基派積極性的加強，黨內的新爭論，托洛斯基派的失敗，列寧的死，列寧死後黨員的徵收，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

#### 大會

爭取國民經濟恢復的頭幾年，獲得了巨大的勝利。一九二四年前，在各部門中都看到高漲。播種場從一九二一年起大大地增加了，——農民經濟愈益鞏固起來。社會主義的工業也增長和發展起來。工人階級的人數大大地增加了。工農的生活比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已經開始更加容易和改善。

但一切還使自己覺感到未被消滅的荒廢的結果。工業比戰前的水準依然落後，牠的增長較全國的消費大為落後。一九二三年底約計有一百萬失業工人，——國民經濟緩慢的增長不能提供溶解失業工人的可能性。因為城市製造品價格的非常昂貴以及我們的貿易組織內塞滿了新經濟政策下的資本家和新經濟政策下的份子，使貿易的發展屢受挫折。因此蘇維埃的盧布開始厲害地動搖，牠的價格低落了。這一切阻礙了工農狀況的改善。

一九二三年秋，因為我們的工業和貿易機關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破壞，經濟的困難性若干地尖銳化了。工業商



品與農業產品間劇烈的分離擺在面前。麥子的價格低賤，而工業品的價格無比地昂貴。在工業中會有很高的雜費支去，這使商品昂貴了。農民由出賣麥子所獲的貨幣很快地貶值。再加上當時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坐着托洛斯基份子畢達考夫，他頒給經濟工作人員一種罪惡的指令，毀掉從出賣工業品所獲的利潤，不停地提高價格，好像是爲着發展工業。實際上這種新經濟政策資本家的口號只能歸結到工業生產基礎的萎縮和工業的破壞。在這些條件下，農民取得都市商品是不利的，他停止購買牠們。反映到工業的銷售恐慌開始了。工資的發給也發現困難了。這引起工人的不滿。有些工廠最落後的工人拋棄工作。

黨的中央委員會指出消滅一切這些困難和缺點的道路。曾經採取消滅銷售恐慌的辦法。曾經實行廣泛消費品價格的降低。決定施行幣制的改革——轉到堅強和穩定的通貨——金盧布。整理發給工人人工貨的事務。曾經指出透過蘇維埃的和合作社的機關以開展貿易，並從貿易中把各種私人投機者排擠出去。應當和睦地捲起袖子進行事業。忠於黨的人們那樣想了和做了。但托洛斯基派不是那樣做。他們利用列寧因爲重病離開機構的缺席，對黨及其領導下了新的攻擊。他們決定不利時機來到時粉碎黨並推翻牠的領導。他們在反黨的鬥爭中利用了一切：一九二三年秋德國和保加利亞革命的失敗，國內經濟的困難，列寧的抱病。就是在這個對蘇維埃國家困難的日子，那個時候黨的領袖臥病床褥，托洛斯基開始了他自己對布爾塞維克黨的進攻。他把黨內一切反列寧的份子都集合在自己的週圍，整理了反對派朝向反黨，反其領導，反其政策的綱領。綱領就叫做四十六個反對派的聲明書。在反列寧黨的鬥爭中，一切反對派別——托洛斯基派，志齊派，「左派共產主義者」的殘餘和「工人反對派」都聯合起來了。他們在其聲明中預言嚴重的經濟恐慌和蘇維埃政權的顛覆，並要求小組組織和派別的自由作爲越出情況的唯一出路。

這是爭取恢復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提議而禁止的小組組織活動的鬥爭。



托洛斯基派關於改善工業和農業，關於改善國內的商品流轉，改善勞動者的狀況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問題。而且他們對這些也沒有興趣。他們感到興趣的只有一個：利用列寧的缺席，恢復黨內的小組織並動搖黨的基礎，動搖牠的中央委員會。

跟着四十六人的綱領之後，托洛斯基的信也發表了，他在那裏以污泥灌浴黨的幹部並對黨提出許多新的，誹謗的責難。托洛斯基在這封信中重複了黨並非初次聽到的門雪維克的舊調。

托洛斯基派首先破壞黨的機關。他們明白沒有鞏固的黨的機關，黨是不能生活和工作的。反對派企圖動搖和破壞這個機關：把黨員與黨的機關對立起來，把青年與黨的舊幹部對立起來。托洛斯基在自己的信中想倚賴學生青年，依賴不知道黨與托洛斯基主義鬥爭歷史的青年黨員。爲要爭取學生青年，托洛斯基就誇獎他們，稱之爲「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同時聲稱列寧的老先鋒隊之蛻化。他指出業已蛻化的第二國際領袖們之後，就無恥地暗示老布爾塞維克先鋒隊也向同樣的道路上走。托洛斯基企圖用關於黨的蛻化之批評來掩飾他自己本身的蛻化及其反黨的陰謀。

反對派的兩種文件四十六人的綱領和托洛斯基的信件均由托洛斯基派分散到區委及支部，並迫黨員加以討論。

他們糾纏黨作爭論。

因此，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當職工會問題爭論的時候以及現在，全黨的爭論均爲托洛斯基派所糾纏。雖然忙於更重要的經濟問題，黨接受挑戰並揭開爭論。

爭論波及全黨。鬥爭帶着殘酷的性質。鬥爭在莫斯科進行得特別尖銳。托洛斯基派首先想奪取首都的組織。但爭



論沒有幫助了托洛斯基派。牠只恥辱了他們。托洛斯基派在莫斯科以及在全聯邦當頭被擊。只少數的高級學校支部和機關支部投票擁護托洛斯基派。

一九二四年一月黨的第八次臨時代表大會召集了。牠聽了斯達林同志總結爭論的報告。臨時代表大會裁判了托洛斯基的反對派，聲稱黨把牠當做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從事的。臨時代表大會的議決以後為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共產國際第五屆世界代表大會所批准。

國際共產主義無產階級贊助布爾塞維克黨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

但托洛斯基派沒有停止其破壞的工作。一九二四年秋，托洛斯基印刷了「十月教訓」的論文，他在那裏企圖以托洛斯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這篇論文的對吾黨，對其領袖列寧之密集的誹謗。共產主義及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敵人都抓着這本誹謗的書籍。黨對托洛斯基加在布爾塞維克英勇歷史上的這誹謗是表示不滿。斯達林同志揭破托洛斯基以托洛斯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的企圖。斯達林同志在自己的發言中指出「黨的任務在於把托洛斯基主義當做思潮埋葬掉。」

一九二四年出版的斯達林同志的關於列寧主義諸基本問題的理論著作在意識上粉碎了托洛斯基主義以及擁護列寧主義事業上具有嚴正的意義。這本小冊子是列寧主義之優越的解析和嚴正的理論的奠基。牠以馬列主義理論的尖銳武器，當時武裝了和現在武裝着全世界的布爾塞維克。

斯達林同志在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中團結全黨圍繞於其中央委員會的周圍並動員牠作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在吾國勝利的鬥爭。斯達林同志會證明托洛斯基主義意識的粉碎是保證前向社會主義進一步的勝利運動所必需的條件。



斯達林同志總結了這個時期與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說：

「不粉碎托洛斯基主義，不能達到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勝利，不能達到把目前的俄羅斯變為社會主義的俄羅斯。」

但黨的列寧政策的勝利，為全黨及工人階級所遭遇的最大不幸所慘淡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附近的高爾克逝世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布爾塞維克黨的創造者——列寧。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聽到列寧逝世的噩耗如服重喪。在列寧埋葬的一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宣佈停止工作五分鐘，鐵道停頓了，工廠和製造廠的工作停止了。全世界的勞動者以萬分的悲哀送他自己的嚴父和導師，最佳的友人和擁護者列寧到墳墓中去。

蘇聯的工人階級以更大的團結於列寧黨的週圍來回答列寧的逝世。每一覺悟的工人在這些喪期內都想到自己對正在實現列寧遺囑的共產黨的關係，無黨籍的工人有成千成萬份聲明書到黨的中央委員會要求容納他們入黨。中央委員會歡迎前進工人們的這種運動，並宣佈大批吸引前進工人入黨，宣布入黨的列寧的徵收。有幾萬新的工人加入黨了。加入的是準備犧牲自己的性命爭取黨的事業，爭取列寧的事業的那些人。當時在短促的期間內有二十四萬以上工人加入布爾塞維克黨的隊伍。加入黨的是工人階級前進部份，最覺悟的和最革命的，最勇敢的和最紀律化的。這是列寧死後的黨員徵收。

列寧的死，表明吾黨如何接近工人羣衆以及工人如何珍重列寧的黨。

在列寧的喪期中，斯達林同志在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黨致偉大的誓詞。他說：

「我們，共產主義者是特種的人物。我們是由特種材料裁成的。我們是構成偉大的無產階級戰略軍隊的，列寧同志軍隊的那些人。沒有比屬於這種軍隊最高的光榮。沒有比以列寧同志為奠基人和領導者的黨員地位更高的了……」



列寧同志離開了我們，囑咐我們高高地支持和保留黨員偉大地位的純潔。我們向你宣誓，列寧同志，我們忠誠地執行你的這種遺教！……

列寧同志離開了我們，囑咐我們保留吾黨的統一如瞳仁一樣。我們向你宣誓，列寧同志，我們忠誠地執行你的這種遺教！……

列寧同志離開了我們，囑咐我們保留和鞏固無產階級的獨裁。我們向你宣誓，列寧同志，我們不惜自己的力量忠誠地執行你的這種遺教！……

列寧同志離開了我們，囑咐我們用一切的力量來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向你宣誓，列寧同志，我們忠誠地執行你的這種遺教！……

列寧同志不斷地告訴我們吾國各民族自願聯盟的必要，在共和國聯邦範圍內他們和睦合作的必要。離開了我們的列寧同志囑咐我們鞏固和擴大共和國聯邦。我們向你宣誓，列寧同志，我們忠誠地執行你的這種遺教！……

列寧不只一次指示我們，鞏固紅軍並改善牠的狀況是吾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同志們，我們也宣誓，我們不惜力量以鞏固我們的紅軍，我們的紅色海軍！……

列寧同志離開了我們，囑咐我們信仰共產國際的原則。我們向你宣誓，列寧同志，我們不惜自己的生命以鞏固和擴大全世界勞動者的聯合，共產國際！

這是布爾塞維克黨對自己的領袖，將在幾世紀中活着的列寧的誓詞。

一九二四年五月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集了。全國代表大會參加了七百四十八位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七十三萬五千八百八十一個黨員。黨員的數目比前屆全國代表大會激劇的增加，可以用因列寧死後的徵收新加



入的黨員約有二十五萬人來解析。具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四百一十六人。

全國代表大會一致地判定托洛斯基反對派的立場，規定牠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是列寧主義的修正，並批准黨的第八次臨時代表大會「關於黨的建設」以及「關於爭論總結」的決議案。

全國代表大會以鞏固城市和農村聯合的任務為出發點，提供進一步擴大工業，首先是輕工業的指示，同時着重指出五全工業迅速發展的必要性。

全國代表大會批准對內貿易人民委員會的創立，並在一切貿易機關的前面提出掌握市場以及從貿易領域內把私人資本排擠出去的任務。

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擴大國家賦予農民低息信用以及從農村中排擠出高利貸者的任務。

全國代表大會把農民羣衆盡量合作化作為農村工作基本任務提出。

最後，全國代表大會指出列寧死後徵收黨員之巨大意義並請黨注意以列寧主義的基礎對青年黨員，首先是列寧死後徵收入黨的——教育工作的加強。

## 五 恢復時期結束前的蘇聯，關於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社

會主義勝利的問題，季諾維夫及康米尼夫的「新反對派」

，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路

綫



布爾塞維克及工人階級在新經濟政策道路上奮勇工作的四年餘已經過去了。恢復國民經濟的英勇工作將近結束了。蘇聯的經濟和政治的力量愈益增長了。

這個時期國際的形勢也改變了。資本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大戰後羣衆的第一次革命襲擊停止了。德國，意大利，保加利亞，波蘭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妥協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在這件事上是幫助了資產階級。革命暫時的低潮來到了。在西歐資本主義暫時的，局部的穩定也來到了——局部地鞏固了牠的陣地。但資本主義的穩定不能消除破壞資本主義社會的諸基本矛盾，相反地：資本主義局部的穩定尖銳了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間，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民族間，不同國家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穩定在資本主義諸國中準備了矛盾的新的爆炸，新的恐慌。

蘇聯的穩定與資本主義的穩定並列地發生了。但這兩種穩定根本地互相區別。資本主義的穩定是資本主義新恐慌的預告。蘇聯的穩定是意味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之新的增長。

雖然西方的革命是失敗了，但蘇聯的國際地位還是繼續鞏固，誠然，速度是較慢的。

一九二二年蘇聯被邀參加在意大利的金努埃城所召集的國際經濟會議。在金努埃的臨時代表大會上，因資本主義諸國中革命失敗而歡躍的帝國主義各政府企圖對蘇維埃共和國加以新的壓迫，在這次是採用外交的形式。帝國主義者們向蘇維埃國家提出無恥的要求。他們要求由十月革命所國有化的工廠和製造廠歸還外國的資本家們，要求償付沙俄政府的一切債務。在這些條件之下，帝國主義的各政府答應蘇維埃國家小小的貸款。

蘇聯反駁了這些要求。

金努埃臨時會議沒有提供什末結果。



一九二三年英國外務大臣登爾藏在哀的美敦書形式上的新干涉之威脅也得到應有的抗拒。

帝國主義諸國摸捉到蘇聯的鞏固性和相信牠的堅定性的後，接二連三地開始與我國恢復外交的關係。在一九二四年與英、法、日、意的外交關係均被恢復了。

很明顯的，蘇維埃國家會爭取得和平休息的整個時期。

國內的環境也加變了。受布爾塞維克黨所領導的工農的自我犧牲的工作帶來了牠自己的成果。國民經濟迅速的增長擺在面前。在一九二四——二五年經濟年度內，農村經濟已接近戰前的規模，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八十七。蘇聯的大工業在一九二五年約已提供戰前工業生產品的四分之三。一九二四——二五年蘇維埃國家已能夠把三萬八千五百萬盧布投到基本的建設中去。全國電氣化的計劃勝利地執行了。在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的指揮地位也鞏固了。在與工業及貿易中的私人資本作鬥爭也獲得了嚴正的勝利。

經濟的高漲本身帶來了工農狀況進一步的改善。工人階級的增長以極快的速度進行了。工資增加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農民的物質狀況大大地改善了。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工農的國家能夠劃出二萬九千萬盧布去幫助經濟不裕的農民。羣衆的政治積極性在工農狀況改善的基礎上有力地增加了。無產階級的獨裁鞏固了。布爾塞維克的威信和影響也增長了。

國民經濟的恢復將近結束。但簡單地恢復經濟，簡單地達到戰前的水準，這對蘇維埃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是不够的。戰前的水準——這是落後國家的水準。應當向前推進。蘇維埃國家所爭取到的長期休息保證了往前建設的可能。

但在這裏要用全力提出關於前途的問題，關於我們的發展，我們的建設之性質，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問



題。應當把蘇聯的經濟建設引上何種方向，朝向社會主義，抑或朝向某種別的方向？我們是否應當和是否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或是判定我們施下肥料於基地是爲了別的，資本主義的經濟。

一般地說，在蘇聯是否有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如果有可能，那末在資本主義革命延緩和資本主義穩定的條件之下，是否可能建設地？是否可能在新經濟政策的道路上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前者在吾國盡量鞏固和擴大社會主義的力量，同時暫且給資本主義以若干的增長？應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應當從那一端開始這種建設？

在恢復時期結束前，這些問題已不是當做理論的問題而是當做實踐的問題，當做日常經濟建設的問題擺在黨的前面。

對這一切問題必須給與直截和明白的回答，使我們建設工業和農村經濟的黨的經濟工作人員以及整個人民知道事業是引到那一方向去，向社會主義抑或向資本主義？

沒有明白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對建設的全部實踐工作將成爲沒有前途的工作，盲目的工作，空虛的工作。

黨對這些問題給以明白和確定的回答。

是的，黨回答社會主義的經濟在吾國可能和應當建設起來，因爲吾國有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一九一七年十月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戰勝了資本主義，確定了牠自己的政治獨裁。從那個時候起，蘇維埃政權採取一切方法粉碎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並創立建設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條件。剝削資本家和地主；把土地，工廠，製造廠，交通，銀行變爲全民的財產；施行新經濟政策；建設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施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這些設施就是如此。現時主要的任務在於全國展開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也以此在經濟上絞殺資本主義。



我們全部的實踐工作，我們一切的行動應當服從執行此種主要任務的諸要求。工人階級能夠做到這一點而且他正在做着。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應當從全國工業化先開始。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這是那一基本的鍊鎖從那裏可以開始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建設的旋轉。無論西方革命的延緩，無論在非蘇維埃諸國中資本主義局部的穩定都不能阻止我們前向社會主義的推進。新經濟政策只能使這種事業更加容易，因為黨施行牠就是為着使我們國民經濟社會主義基礎的建設更加容易。

黨對吾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問題的回答就是如此。

但黨知道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勝利並不就此算是完盡了。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轉變而是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全世界歷史的勝利。但牠仍是蘇聯內部的事情，並且只構成社會主義勝利問題的一部份。牠的國際方面構成問題的另一部份。斯達林同志奠定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勝利為原則之後，屢次指出應當分別這個問題的兩方面，國內的和國際的。至說到問題的內部方面，就是國內諸階級的相互關係，那末蘇聯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完全能夠在經濟上克服牠自己本國的資產階級並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但還有問題的國際方面，就是對外關係的領域，蘇維埃國家及資本主義諸國之間，蘇維埃人民與國際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領域，後者仇視蘇維埃制度並尋找機會舉行反蘇維埃國家的新的武裝干涉，進行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新企圖。因為蘇聯暫時還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國家，而其餘的國家依然是資本主義的，那末產生資本主義干涉危險性的資本主義對蘇聯的包圍繼續存在。顯然的，目前有資本主義的包圍，也將有資本主義干涉的危險性。蘇聯人民只用自己一國的力量能消滅這種外部的危險，反蘇聯的資本主義干涉的危險嗎？不，不能夠的。不能夠是因為消滅資本主義干涉的危險性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而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只有在至少是幾個國家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結果上才有可能。但從這裏應當說，表現



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消滅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上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還不能認為是澈底和最終的勝利，因為外國武裝干涉的危險性和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依然未被消除，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對此種危險性依然沒有保證。為要消滅外國資本主義干涉的危險性，應當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

自然，蘇聯人民及其紅軍在蘇維埃政權的正確政策之下，會給新的外國資本主義干涉以應有的抵禦，也如他們給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的第一次資本主義干涉的抵禦一樣。但這還不是說，這將消滅了新的資本主義干涉的危險性。第一次干涉的失敗沒有消滅了新干涉的危險性，因為干涉危險性的來源——資本主義的包圍繼續存在着。如果資本主義的包圍還將繼續存在，是沒有消滅干涉的危險性和新干涉的失敗。

從這裏應當說，在資本主義諸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蘇聯勞動者切身的利益。  
黨對吾國社會主義勝利問題的提法就是如此。

中央委員會要求把這種提法在將行召集的黨的第十四次臨時代表大會上加以討論，使牠當做黨的提法，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黨的法律而被批准和通過。

黨的這個提法對反對派發生了驚惶失措的作用。牠使他們驚惶失措是因為黨賦予這種提法以具體的——實踐的性質，把牠與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踐計劃聯繫起來，並要求把牠變成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黨的法律的形式，黨的第十四次臨時代表大會議決案的形式。

托洛斯基派起來反對黨的提法，以門雪維克的「不斷革命論」與牠對立起來，這種理論敢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嘲笑，牠並且否定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可能性。

布哈林派沒有決定作直接反對黨的提法的發言。他們還是偷偷摸摸地開始把它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平地生長



到社會主義的「理論」與牠對立起來，並以「致富」的「新」口號來補充牠。在布哈林派看來，社會主義的勝利不是意味着資產階級的消滅而是牠的培養和致富。

季諾維夫與康米尼夫暫無表示，但有過一時曾經聲明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因為牠的技術、經濟的落後性，然而以後發現這是不得已地隱藏在叢林之中。

第十四次黨的臨時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四月）裁判了公開和祕密的反對派份子的一切這些投降的「理論」，並批准黨對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提法，通過了相當的議決案。

進退為難的季諾維夫與康米尼夫認為舉手贊成這個議決案較為好些。但黨知道他們只為延緩與黨鬥爭的期限，決定在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黨宣戰」。他們集合了在列寧格勒自己同僚並形成了所謂「新反對派」。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

全國代表大會是在緊張的黨內環境之下來進行的。從黨的存在以來還沒有過這樣的情形，最大的黨的中心，如列寧格勒的整個代表團竟起來反對牠自己的中央委員會。

參加全國代表大會有一百六十五位有表決權的代表和六百四十一個有發言權的代表，共代表六十四萬三千個正式黨員和四十四萬五千個候補黨員，就是說比前屆全國代表大會人數稍微少些。這是因為被反黨份子所充塞的高級學校及機關支部局部清黨的結果。

斯達林同志做了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報告。他描寫了蘇聯政治及經濟力量增長的顯明圖景。無論工業或農村經濟因為蘇維埃經濟制度之優點，在較短的期間內被恢復起來而且接近了戰前的水準。雖然有這些進步，斯達林



同志的提議不要安心於此，因為這些勝利不能消滅吾國繼續依然是落後的農業國的那個事實。農村經濟提供全部生產品的三分之二，而工業則只提供三分之一。斯達林同志說，在黨的前面立着把全國變為工業國，經濟上不倚賴資本主義諸國的整個問題。這個可能做到，而且這個應當做到。爭取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成爲黨的中心任務。

「把吾國從農業的變爲工業的，能够用自己的力量生產必需的配備品，一切核心和吾黨總路綫的基礎就在這裏。」——斯達林同志指出。

全國工業化保證了吾國經濟的獨立性，鞏固了牠的國防力量並創立了蘇聯社會主義勝利所必需的條件。

季諾維夫派起來反對黨的總路綫。季諾維夫派沙考列尼柯夫把在帝國主義的巨頭間流行着的資產階級的計劃與斯達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計劃對立起來。根據這個計劃蘇聯應當依然是農業國，主要生產原料和糧食，把牠們輸出國外而從那裏輸入機器，這些機器我國本身沒有生產而且也不應當生產。在一九二五年的條件之下，這個計劃是當做工業發展的外國經濟束縛蘇聯的計劃，是鉗錘蘇聯工業的落後性以利於資本主義諸國的帝國主義巨頭的計劃看待的。

採用這個計劃等於把吾國變爲資本主義世界無助的，農業的附庸，使牠在資本主義包圍前面依然是無武裝的和軟弱的，歸根結底葬送了蘇聯社會主義的事業。

全國代表大會惡評了季諾維夫派的經濟「計劃」是束縛蘇聯的計劃。

如他們斷定（違反列寧的！）我們國家的工業好像不是社會主義的工業，或者聲明（也是違反列寧的！）中農好像不能成爲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的同盟者，就是這些橫暴的言論對「新反對派」也沒有幫助。



全國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這些橫暴的言論當做反列寧的言論加以惡評。

斯達林同志暴露出「新反對派」的托洛斯基——門雪維克主義的本質。他指出季諾維夫和康米尼夫只是重彈黨的敵人的舊調，列寧當時與此曾作過無情的鬥爭。

很明顯的，季諾維夫派這是最壞地掩飾着的托洛斯基派。

斯達林同志着重指出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工人階級與中農鞏固的聯盟。他指出當時黨內對農民問題有過兩種傾向，這對此種聯盟的事業是危險的。第一種傾向是過低估量和減少富農的危險性，而第二種傾向則在富農面前狼狽周章，驚惶失措並不充分估計到中農的作用。但問題在於那一種傾向更壞些，斯達林同志回答：「牠們兩種都壞，無論第一種或第二種。」「如果這些傾向發作起來，牠們會解體和破滅黨。幸虧吾黨有那種能夠中止第一種和第二種傾向的能力。」

黨，真的粉碎和切斷了「左」傾和右傾。

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把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討論作個總結之後，一致地反駁了反對派投降的計劃並在牠自己著名的議決案中寫道：

「在經濟建設的領域內，全國代表大會是從吾國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有『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列寧）做出發點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為爭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鬥爭是吾黨的基本任務。」

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批准了新的黨章。

從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起，吾黨開始稱為聯邦共產黨（布爾塞維克）——聯共（布）。

在全國代表大會上被粉碎的季諾維夫派不服從黨。他們開始反對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案的鬥爭。在第



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季諾維夫派立刻召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列寧格勒省委會議，後者的上層份子是由季諾維夫，查魯基，巴卡埃夫，埃夫多登莫夫，苦克林，沙發洛夫以及其他兩面派在仇視黨的列寧的中央委員會精神上教育起來的。在這次會議上共產主義青年團列寧格勒的省委通過了聯邦共產主義青年團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拒絕服從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案的決議。

但列寧格勒共產主義青年團季諾維夫派的上層份子完全不能反映出列寧格勒共產主義青年團羣衆的情緒。因此，牠很容易被粉碎，而列寧格勒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很快地在聯邦共產主義青年團中重新佔有牠相當的地位。

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時曾經遣派大會的代表團——莫洛托夫，豈洛夫，瓦洛錫洛夫，加里寧，安得列夫等同志到列寧格勒去。應當向列寧格勒黨組織的黨員們解析用欺騙方法獲得出席資格的列寧格勒代表團在全國代表大會上所站的那種立場之犯罪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性質。會議上關於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工作報告在風暴中進行。曾經召集新的，非常的黨的臨時代表大會。列寧格勒黨組織的壓倒多數黨員羣衆（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完全地贊同了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決案並判定反黨的、季諾維夫的「新反對派。」後者在臨時已成爲沒有軍隊的軍官。

列寧格勒的布爾塞維克們依然站在列寧、斯達林黨的前列。

斯達林同志總結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之後說：

「聯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意義在於牠會把新反對派的錯誤揭露到底，拋棄其背信和啜泣，明白和確定地指出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的道路，給黨以勝利的前途，並以此武裝無產階級堅信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斯達



## 六 簡略的結論

轉到恢復國民經濟和平工作的年份，是布爾塞維克黨史上頂負責任的時期之一。在緊張的環境中，黨會完成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困難的轉變。黨在新經濟政策基礎上鞏固了工農的聯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被創立起來了。

在新經濟政策的道路上，曾經達到恢復國民經濟決定的勝利。蘇維埃國家勝利地走過國民經濟發展的恢復時期，並開始轉到新的時期，全國工業化的時期。

從內戰向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轉移，特別是在初期伴着極大的困難。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敵人——聯共（布）隊伍中反黨的份子在這整個時期中進行了反列寧黨的殘酷鬥爭。托洛斯基是這些反黨份子的領袖。康米尼夫，季諾維夫，布哈林在這個鬥爭中是他的助手。反對派在列寧死後想解體布爾塞維克黨的隊伍，分裂黨，以對蘇聯社會主義勝利事業的不信任來傳染牠。依本質說來，托洛斯基派企圖在蘇聯創立新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別的政黨——資本主義復辟的政黨。

黨在列寧的旗幟之下團結於牠列寧的中央委員會的周圍，團結於斯達林同志的周圍給托洛斯基派以及他們在列寧格勒的新朋友——季諾維夫，康米尼夫的新反對派以失敗。

布爾塞維克黨積聚了力量和資財之後，把全國導向新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階段。（譯自斯達林親自參加起草的最新聯共黨史鑑定本第九章——譯者附註。）



# 斯大林與紅軍

蘇聯伏羅希洛夫作  
金 人 譯

## 發 端

我們的歷史的和平建設時期，充滿了偉大意義的事件。這些年來，時光簡直像海水一般流了過去，決不是河水。我們的周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簡直超過了公認的限度和範圍。斯大林同志的豐富的和多方面的革命事業都和這些事件緊緊地連繫着。最近五六年來，斯大林同志是站在展開的和沸騰的鬥爭中心。只有用這些事實才可以說明斯大林同志的意義，真是國內戰爭勝利中最優秀的組織者之一，但却一直被掩沒着，還沒有得到應得的估價。

今天，我們的朋友的五十歲誕辰，我想要部分地來彌補一下這種缺憾。

自然，在論文中，我是很少談到斯大林同志的軍事工作的特殊性質的。我只是想用那不久以前才公佈的幾件很少為外間人所知道的文件中的事實，來把同志們的記憶重新恢復一下，用事實底簡單的證明，指出斯大林同志在內戰的緊張時期中，所負的特殊的任務。

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中間，斯大林同志可說是個唯一無二的人物，中央委員會把他從這個戰綫調到那個戰綫，揀着革命最受危險，最可怕的地方調去。那種凡是平安靜謐的，著有成績的地方，我們就見不到斯大林同志。但



是，凡是因有許多原因會使紅軍動搖或者反革命勢力在繼續增高威脅着蘇維埃政權底生存的地方，或者那種騷亂和恐慌可以隨時造成孤立和慘劇的地方——斯大林同志就在那裏出現了。他夜間不睡，他組織，把指導權把握到自已的堅強的手中。應該摧毀的，他毫不憐惜——從新改進，健全設備。斯大林同志自己在一九一九年致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中曾經把這種情形寫出，說是把他「變成一個清除戰地的馬廐的專門家」了。

## 蔡里城

斯大林同志是從蔡里城戰綫上開始自己的軍事工作的。這是非常偶然。一九一八年六月初，斯大林同志以南俄全部給養事務指導員的資格，帶着一隊紅軍和兩輛鐵甲汽車向蔡里城出發。他在蔡里城遇到了令人不能相信的混亂狀況。不僅是在蘇維埃的職業的和黨的團體內，甚至在軍事指揮機關內，還要更加混亂和騷動。斯大林同志每一步都遇到一般性的障礙，妨害他執行自己的直接任務。這許多障礙，是爲這時得到了占領了烏克蘭的德國侵略者們的大量援助，因而特別迅速增漲起來的哥薩克反革命勢力所造成的。哥薩克的反革命盜羣迅速地占領了鄰近蔡里城的許多據點，因此不僅可以截斷向飢饉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有計劃的輸送糧食的可能，甚至使蔡里城也感受到非常的危險。

這時，在其他許多地方事情也並不樂觀。莫斯科正發生着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暴動，穆拉維耶夫在東方叛變，捷克斯拉夫的反革命勢力在烏拉爾方面發展着和鞏固着，在最南方——英國人向巴庫前進。全部被燃燒在一個火環中。革命遭受着巨大的災難。一個跟一個的電板順電綫由列寧那裏飛到蔡里城，或回去。列寧警告着危險，鼓勵着，要求採取毅然決然的手段。蔡里城的情況是有很大意義的。如果使頓河方面的暴動發生和失掉蔡里城，我



們也就要失掉有全部生產力的，糧食豐富的北高加索。大林同志很明白這點。他迅速地以一個有經驗的革命份子的確信，只有在他可以影響到軍事的指揮的條件下，——這一任務在目前的條件中是有決定意義的！——那工作也才可以發生某種意義。

「蔡里城的南部綫還沒有恢復原狀，」——他在一張七月七日，寫有幾個特殊的字句，「我要趕快到前方去，我只能寫關於事情的話」——的送給列寧的字條中這末寫着。

「我要驅逐和咒罵一切應該挨罵的人們，我希望，趕快恢復起來。也許您可以確信，我們是一個人也不能寬恕的——無論自己，無論別的人們，糧食我們總可以弄到。如果我們的軍事『專家們』（臭皮匠們！）沒有睡覺和沒有發懶，陣綫也就不會被截斷了；如果陣綫能以恢復起來，那就不是靠了軍人們的力量，恰好用不到他們。」

後來，對於列寧因恐怕在蔡里城發生左派社會革命黨暴動所抱的不安，他很簡短地，堅定地和清楚地回答：

「對於歇斯底里病的患者有什麼關係，請確信吧，我們的手並不顫抖，對待敵人，我們就要像對待敵人的樣子。」

再更進一步地諳視到軍事機構的內部，斯大林同志已確信它是在一種孤立狀態中了，而且在有些部隊中——簡直就不願意對毫不客氣侵入來的反革命勢力加以反抗了。

已經是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的時候，斯大林同志打電報給列寧：

「事情是因此而更加複雜化，北高加索區的司令部已經簡直不能執行和反革命勢力鬥爭的任務。事情不僅是我們的「專家們」神經質地不肯對反革命勢力作決死的戰爭，甚至他們好像只是「司令部的」，只會「畫畫綫」和傳遞工作計劃的工人，對於戰鬥非常冷淡……一切人都覺得自己彷彿是外人，客人。軍事委員們不能補救這缺陷



斯大林同志不僅限於這種殲滅的特點；在這一文件中他還給自己作出了行動的結論：

「當加里寧（那時北高加索方面的指揮官——作者）前綫已經和軍需站斷了關係，而北方——則和糧食區域斷絕了關係時，再要我對這事冷淡下去，我以為自己是不可能了。我要就地來整理一下這許多和別種的缺陷，我要採取許多方法，我要達到把許多壞事的官吏和指揮的人們撤換的目的，不管形式上的困難，我必需要克服的。這兒可以明白，我要對一切最高機關負責，把整個責任放到自己身上來。」

情勢開始越來越緊張了。斯大林同志施展着巨大的力量，在最短時間內，由一個監督給養的非常代表變成了蔡里城前綫上的全部紅軍力量的事實上的指導者。這一種情況在莫斯科也通過了，於是責任就放到斯大林同志身上來了：「整理秩序，把隊伍團結成正規部隊，設定正確的指揮機關，驅逐一切的不負責任的人」（由共和國的革命軍事會議來的電報上批着：「本電報經列寧同意發出的。」）

這時，在經由頓河沿岸的草原侵入來的德國軍隊的壓迫下，退回來的烏克蘭的革命軍的殘餘隊伍到了蔡里城。以斯大林同志為首領組織成革命軍事會議，它是要和正規軍的組織聯合起來的。斯大林同志的火熱的性格，他的力量和意志完成了那種昨天還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在很短的時間內設定師、旅、團的制度。司令部，軍需機關和整個後方都用積極的方式來肅清叛革命的和仇敵份子。蘇維埃的和黨的機構改善和緊張起來。老的布爾塞維克們的和革命工人們的團體環繞在斯大林同志周圍團結了起來，並且在南方反革命的頓河近處生長成的紅色布爾塞維克的堡壘代替了孤立的司令部。

那時蔡里城已經充滿了各種毛色的反革命份子，從右派社會革命黨直到保皇黨的暴徒們。這一切老爺們在斯大林同志和從烏克蘭來的革命軍還未到來之前，都自己覺得幾乎是很自由地生活着，在等候着最好的日子。爲了保



證紅軍力量在前線上的改組，必需要用鐵一般的，無情的掃帚把後方肅清。革命軍事會議，由斯大林同志領導下，建立了專門的「柴加」(註)而且把肅清蔡里城的反革命勢力的責任加到它身上。

敵人的證據有時是很寶貴和有趣的。譬如在白衛軍的雜誌「頓河潮」上，由一九一九年二月起，一位叛變了我們和跑到克拉斯諾夫的隊伍中去的諾索維克上校(曾任陸軍作戰局局長)描寫着這個時期和斯大林同志的任務：

「斯大林的主要任務是北方各省的軍需事宜，而且爲了執行這一任務起見，他獲得了無限制的全權……」

戈里亞集——蔡里城一綫已經完全被切斷。北方只剩了一處地方還可以得到援助和維持聯絡——這就是伏爾加河南方，在琪霍列次克被志願軍們占領以後，情況也變成完全不安定了。對於想要把自己的後備軍從司塔福洛波里斯克省調遣過來的斯大林，這種情況使他結束了在南方的使命。但是像斯大林那樣的人，還不能立刻順手地離開他已開始的事業。說句公道話，他的力量是任何舊時的統治者們所要羨慕的，而且對於處理事務和情勢的能力更是值得許多人學習的。

漸漸地，他好像變成了沒有事情的人一樣，更確實的說，一方面在減少着他的直接任務之下，斯大林開始躡進了管理城市的各部門，主要的是踏上了保衛蔡里城的巨大任務，特別是對於一般所稱爲革命陣地的整個高加索方面的任務。」

後來，對於蔡里城的特殊形勢，諾索維克寫道：

「這時蔡里城的整個氛圍都緊張了起來。蔡里城的非常委員會用了超速度工作。沒有一天不在那種頂可靠的

(註)即反革命運動及投機取締非常委員會。



和頂秘密的地方發現各種的黨徒。城中的一切監獄都塞滿了……

陣地上的鬥爭達到了頂緊張的地步……

從七月二十日以來主要的推動者和執行者就是斯大林。從直通的電綫上和中央簡單地談着現在機構的管理對事務的如何不便利，如何不適宜，這樣使莫新科方面由直通電綫發佈了命令，命令斯大林擔任了全部軍事的……和民政機關的首領……」

而且諾索維支後來更自己承認，這許多次的叛變的鎮壓是有根據的：

「這時當地的，擁護立憲會議的政綱的反革命組織，特別加強了，而且從莫斯科得到了金錢，預備向從事解放蔡里城的工作的頓河的哥薩克們作積極的援助。

最可惜的，是從莫斯科派來的這一團體的首領阿列克塞耶夫工程師和他的兩個兒子，對於現實的情況太缺乏認識了，所以因了根據想和從前曾為非常委員會的布爾雪維克們供職的，現在正在積極進軍的塞爾維亞的大隊聯合起來，而制定的不正確的計劃，致使團體被揭穿了……

斯大林的批語很簡短：「槍斃。」阿列克塞耶夫工程師，他的兩個兒子，和他一道的許多軍官，其中一些是屬於團體中的，而另一部分則只是因了參加它的嫌疑，都被非常委員會捉住了，而且迅速地，沒經過任何審判，都槍斃了。」

然後轉到後方，（北高加索區的司令部和它的附屬機關）的毀滅和清除白衛軍的工作，諾索維支寫着：

「這一掃蕩的特點，是在於斯大林對於從中央拍來的指示電的關係。當自己覺得很困難地才把各區機關安置好，現在被斯大林的破壞弄成非常不安的托洛次基拍了一個電報，認為必需要把司令部和人民委員會照舊形式留着，以便使它們可以工作時，斯大林在電報上作了一個斷然的和有意義的批語：



『不要理會它。』

於是這個電報就沒被理會，而所有的砲隊和司令部的人員仍舊坐在蔡里城的駁船上。

蔡里城的本來面目在短時期內已經簡直辨認不出了。城市不久以前花園裏面還奏着音樂，布爾喬亞和白色的軍官們還一同公開地可以向那裏跑去，成羣地沿馬路蕩着，現在已變成紅色的軍營，嚴密的關防和軍紀統治了那裏的一切。後方的這種堅強現象，很快地，順利地在我們的，正在前方作戰的各團的精神中反映了出來。指揮的和政治的機構，以及紅軍的羣衆，開始感到他們是被一隻堅強的革命的手在管理着，這隻手領導着爲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而鬥爭，毫不容情的懲罰一切，在這一鬥爭的途徑中所遇到的迎面走來的人們。

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不僅限於在辦公廳內。當秩序已經整理好，當革命的組織已經恢復好的時候，他就出發到前綫去，這時前綫已經延長到六百公里以上了。他除非是斯大林，他才有這樣偉大的組織者的才能，一點軍事的準備都沒有（斯大林同志從來沒在軍隊中供職過），會在那時的非常困難的情勢中，這末正確地理解專門的軍事問題。

我記得，彷彿現在一樣，一九一八年的八月初，克拉斯諾夫哥薩克部隊向蔡里城進攻了，企圖用中央突破的方法，把紅軍的各團都推到伏爾加河中去。在許多日子中，以頓巴斯的工人們組成的共產黨員師爲首，用特殊的力量擊退了組織完善的哥薩克隊伍的壓迫。這是一些大緊張的日子。我們看看這時的斯大林吧。和平日一樣，安靜的，深思的他，幾夜幾夜地不睡覺，處理着戰地和司令部中的艱巨的工作。陣地上的情勢已到了幾乎要演悲劇的程度。在非次哈拉烏洛夫，馬曼托夫和其他的人指揮下的克拉斯諾夫部隊，用着想得非常妥善的運動戰法，壓迫着我們的疲倦的，受了很大損失的軍隊。構成馬蹄形，把自己的兩翼依付在伏爾加河上敵人的陣地，一天一天地越來越厲害地逼緊來。

我們連一條出路都沒有。但是斯大林對於這些根本就沒有去想它們。他只有一個意念，一個唯一的想頭——勝



利，無論如何要摧毀敵人。斯大林的這一不能屈服的意志影響了所有他附近的戰友們，不管那種幾乎已是無出路的情勢，無論誰對於勝利也不懷疑。

而且我們勝利了。被擊潰的敵人退向遠遠的頓河方面去了。

## 披爾梅

一九一八年底，東戰綫上形成悲慘的局面，特別是在被壓迫着要退出披爾梅的第三軍的地區上。被敵人用半圓形包圍着的這一軍人，到十一月底，士氣已經沮喪到極點了，六個月不間斷的戰鬥的結果，既缺乏足用的可靠的後備軍，後方又無保障，給養更是困難（第二十九師有五晝夜簡直就得不到一塊麵包）在零下三十五度的嚴寒中，失迷着道路，戰綫又特別延長（四百公里以上）再加上第三軍司令部的孱弱無力，便形成不能擊退敵人的優勢武力的壓迫的情況了。

爲了構成一幅傷心慘目的圖畫，還得再加上許多軍官的指揮組織的叛變，把一些整團的隊伍投降成爲俘虜，彷彿是從後備軍中挑選出來的最壞的隊伍，指揮簡是不靈極了。第三軍在這種情況中日趨崩潰，混亂地退却下去，二十天的功夫，退了三百公里，在這些日子中損失了一萬八千戰士，數十門砲，幾百挺機關槍和其他東西。敵人迅速地向前移動，向烏亞特加和整個的東部戰線實行威脅。

由於這許多情況，擺在中央委員會面前一個問題，即必需調查明白造成悲劇的原因和火速把第三軍的部隊恢復秩序。派誰去執行這一個困難的任務呢？

列寧給那時的革命軍事會議主席打電報：



「接到了許多從披爾梅方面來的黨的消息，都講到軍隊的悲慘狀況和酗酒的事件。我想派斯大林去——我怕司迷勒作事太軟弱……而且聽說他也酗酒，恐怕不能担負恢復秩序的任務。」

中央委員會決議：

「決定由中央委員會委員德捷爾仁斯基和斯大林組成黨調查團，去調查退出披爾梅的和在烏拉爾戰線上的最近幾次敗仗的詳細原因，要對一切指出的事件加以說明。中央委員會要調查團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來迅速恢復第二和第三軍各區的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〇〇〇七九號司悅爾德羅夫的電報。）

這一決議彷彿只限於斯大林同志和德捷爾仁斯基同志「調查退出披爾梅和在烏拉爾戰線上的最近幾次敗仗的原因」的職權。但是斯大林同志却把自己的「黨務調查」的工作重心改到設法恢復原有局面，鞏固戰線和他的工作方面來了。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第一次致列寧的電報中，對於調查團工作的結果，斯大林幾乎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悲劇的原因」的事，但却看出一個問題，即必需要設法解救軍隊。

這就是那個電報：

「給國防會議主席列寧同志。

調查已經開始。關於調查的進行我們將隨後報告。我們現在認為先應當向您報告一件急不容緩的，關於第三軍的困難情況。事情是因為第三軍（原有三萬餘人）只殘餘差不多一萬一千名疲憊的，衰弱的，僅能支持敵人的壓迫的兵士了。總司令部派去的軍隊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一部分還是仇視我們的，正在嚴厲的淘汰中展轉着。爲了救出第三軍的殘餘部隊和遏止敵人向烏亞特加方面的迅速推進（依據由戰地指揮部和由第三軍中所得到的證據，這種危險簡直已很具體化），絕對必需火速遵照軍長的命令，頂少要從俄羅斯調三團非常可靠的隊伍去。我們迫切地請



求在這一方面，對必要的軍事機關施以壓力。再重復一遍：對烏亞特加不採取這種方法，那就威脅披爾梅的命運，這是參加的同志們的一致意見，依據了我們所有的一切證據，我們也贊成這意見的。斯大林，德捷爾仁斯基。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烏亞特加。」

直到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斯大林同志才和德捷爾仁斯基同志一同把自己的簡短的調查「悲劇原因」的報告書送出去，這是根據了下面的事實做成的：軍隊向敵人攻擊時的疲憊和無力，我們的缺乏後備軍，司令部和軍隊的隔離，軍長的無能，革命軍事會議方面對管理戰地的不能容忍的犯罪行為，它用自己的矛盾的命令混亂着戰線，把戰場上一切迅速援助第三軍的可能性都摧毀無遺，從後方派來的援軍是不可靠的，用舊的方法暴露出補充的情形，因蘇維埃的和黨的組織上的無助和無能而暴露出後方的非常不鞏固。

同時，斯大林同志用他所特有的那種迅捷和堅決，製成和實現了許多提高第三軍戰鬥力的實驗方法。

「到一月十五日，——我們在他的向國防會議所作的報告中讀到，——向前方派遣了一千二百名可靠的士兵；過了一天——又派兩營騎兵。二十日把第三旅的第三十二團派了出去（預先特別精選過的。）這些部隊給與了遏止敵人進攻的可能，改造了第三軍的精神，也展開了我們向披爾梅的進攻，非常有成績，在軍隊的後方進行着對蘇維埃的和黨機關的嚴厲的肅清工作。在烏亞特加和許多縣城內組成了革命委員會。鄉村中的堅固的革命團體的設置也繼續不已。一切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都改變了新的步調。軍事稽查方面也肅清和改革過。省非常委員會用新的黨工作人員肅清過和補充過。烏亞特加的困難是解除了……」和其他。

這一切方法採用的結果，不僅遏制了敵人的繼續活動，而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中，東戰線方面竟改成攻勢了，並且在我們的右翼上占領了烏拉里斯克。



斯大林同志這是多末明瞭而且實現了自己的「調查悲劇原因」的任務啊。調查完了，弄明白了這些原因，就在當地，用自己的力量解決了它們，和完成了必要的轉機。

## 彼得格勒

一九一九年春，在白色愛沙尼亞人，白色芬蘭人和英國艦隊援助之下，猶金尼契將軍的白衛軍，執行着珂爾恰克所命令的「占領彼得格勒」的任務，把革命隊伍拚命從東戰綫向自己處引來，又開始了意想不到的攻擊，對彼得格勒造成了事實上的威脅。情勢的嚴重性更因在彼得格勒發現反革命的陰謀而更加深刻化了，陰謀的指導者們多為在西戰綫司令部供職的，或在第七軍以及在克羅斯達特海軍根據地供職的軍事專家們。布拉克——巴拉霍維支配和着猶金尼契向彼得格勒的進攻，在普司關甫方面造成了很多成績。叛變在戰場上開始了。我們有幾團人都跑到敵人方面去了；所謂「紅色山」和「灰色馬」要塞的衛戍軍都全部公開地來反對蘇維埃政權。恐慌包圍了整個第七軍，戰綫動搖了，敵人已到了彼得格勒城畔。必需急速設法挽救危局了。

中央委員會爲了這個目的，又選任了斯大林同志。三個星期之內，使斯大林同志完成了轉機。軍隊的動搖和恐慌都迅速肅清，司令部也緊張了起來，一次又一次地來實行徵發彼得堡的工人和共產黨員，毫不留情地消滅着敵人和叛徒。斯大林同志參加到軍事指揮的戰鬥工作中去。下面是他打給列寧同志的電報：

「在清除『紅色山』以後，緊跟着就清除了『灰色馬』，它們上面的武器還很齊備，發射迅速的……（電碼不

明）……全部要塞和堡壘的。海軍專家們確信，從海上把所有的海軍技術都傾到岸上來，是可以占領「紅色山」的。我却只能爲這所謂技術悲悼了。「紅色山」的迅速被占，是要用我這方面的和一般文官們的對戰鬥事務的頂粗暴



的干涉來說明，那種干涉是要不顧海上和陸上的司令，以及自己人間的關係的。我以為應當用自己的任務來聲明，以後將要不管我那一切對技術的尊敬，要自己行動起來。斯大林。」

過了六天，斯大林同志向列寧報告：

「我們軍隊中的轉變已經開始了。一週以來，我們已沒有發現一次部分的或大批的逃亡的事情了。逃兵整千地回到隊伍裏來。從敵營逃到我營來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一週以來，逃到我們這兒來的有四百人，多數都攜着槍械。昨天白天，我們的攻擊開始了。雖然還沒有得到援軍，但敵人在我們所停留的那一綫上已經站不住腳了——離彼得堡也很近了。現在進攻頗為順利，白軍亂竄，凱爾諾窩——沃倫民諾——司列平諾——加斯珂窩一綫已在今天被我們占領。我們捉住了很多俘虜，二門或者還要多的大砲，還有自動腳踏車，子彈。敵人的軍艦並沒有出現，看來是怕「紅色山」的，現在它已完全是我們的了。請火速依照我的命令送二百萬發子彈給第六師……」

這兩個電報充分表示出了斯大林同志那種偉大的創造工作，用它克服了紅色的彼得堡附近的危險情況。

## 南戰場

大家都還記得一九一九年秋天的事吧。整個的國內戰爭的決定的，轉變的時期來到了。被協約國武裝起來，用它們的參謀部來援助着的丁尼金的白衛軍到了奧遼爾附近。整個綿長的南方陣綫，都像緩慢的波濤一般向後退去。內部的情況越來越困難。給養的困難異常尖銳化。產業因為燃料的不足都停頓了。國內，甚至在莫斯科，反革命分子活躍不已。危險威脅着圖拉，危險籠罩在莫斯科上空。

必需挽救這種情勢。於是中央委員會以革命軍事會議委員的資格派遣斯大林同志到南戰場去。現在已經沒有



再秘密的必要了，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被派遣以前，曾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三個基本條件：

(一) 托洛次基不應當參與南戰場的事務，他也不應當超過他的界限。

(二) 一定要趕快從南戰場調回大批工作人員，凡是斯大林同志認為在恢復軍隊秩序上有妨礙的人們，和

(三) 必需迅速向南戰場派遣斯大林同志選定，那些足以勝任這個任務的新工作人員。這些條件都完全被接受了。

但是要想把握住這個叫作南戰場的，配備有幾十萬人的廣大場所（從伏爾加河到波蘭的烏克蘭境），必需要有正確的作戰計劃，必需使戰綫有整飭的任務。那末才能把這個調動和集中一切優秀的力量，向主要方面給敵人以打擊的目的交結軍隊。

斯大林同志在戰場上遭遇到了很難確定的和困難的情況。敵人在主要的方面，庫爾斯克——奧遼爾——圖拉，打擊着我們，東部一翼只能得不到幫助地停在原處。對於戰鬥命令有什麼關係呢，只是使他覺得舊計劃（九月的）是想要經過頓河草原，向左翼——從蔡里城至諾沃羅西依斯克——方面給以主要打擊。

「南戰場的基本的攻擊計劃不要變更；而主要打擊的任務是要由負有消滅頓河和庫爾斯克方面的敵人的使命的，邵林的特別隊伍擔負的。」（註）

斯大林同志認識着當時的情況，迅速地下了決心。他根本推翻了舊計劃，提出了新的意見，而且還把它們送給列寧，就是下面那個文件，它自己是可以說明一切的。它非常有趣地，非常明顯地描寫出了斯大林同志的戰略的天才，在決斷問題上面也非常特殊，我們以為把它全部錄出是很有益處的。

（註）一九一九年九月總司令官的命令。



「兩月之前，總司令部原則上並沒有反對抵抗那種，經過頓河流域，由西往東來的主要打擊。如果它始終沒有去抵抗這一打擊，那末就是因為受了夏天南部軍隊撤退的結果的「餘毒」，也就是說因了東南戰線的軍隊悄悄地發生黨派分歧的原故，黨派的再發生，時間上損失很大，使丁尼金得到了很大便宜……但是現在的情勢和它有關係的黨派力量，基本上已經改變了：第八軍（從前的南戰場的主力軍）在南戰場區內移動了，直望着頓河流域，布簡內依的騎兵軍團（另一主力）也在南戰場區內移動，新力量——萊多維亞師——增加了，它在一月之後，整理着，又從新給丁尼金以威脅了……爲什麼會迫使總司令部（大本營）固守着舊計劃呢？顯然，只是一種固執，如果需要說——就是那種總司令部中的稱爲「戰略家」的雄鷄所造成的，對於共和國非常糊塗和非常危險的黨派性……數日前總司令部命令邵林經由頓河荒原，沿着那種也許只有我們的飛行家可以飛過去，而我們的步兵砲戰簡直不能通過的路線，向諾沃羅西依斯克進攻。

無疑地，這種瘋狂的（理想的）在我們敵人的區域內，在絕對無路可通的條下的進軍，簡直是威脅我們。很容易明白，這種在不久以前的實習，向哥薩克部落的進軍，已經證明只能把丁尼金四周的哥薩克們爲了保護自己的部落更團結起來來反對我們，只能把丁尼金造成了頓河的教主，只能給丁尼金製造哥薩克軍隊，也就是只能加強丁尼金的力量。因此現在必需一點時間不要就誤，——改變已經被實習所否定了的舊計劃，用經由哈里科夫——頓河流域向羅斯托夫方面給以主力打擊的計劃來代替它。

第一，我們在這裏已經不在敵人的包圍中了，相反的——是在同情我們的環境中了，可以使我們的移動容易；

第二，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鐵路綫（頓河流域的）和培養着丁尼金的軍隊的主要動脈——伏倫涅日——羅



第三，我們可以利用這種移動把丁尼金的軍隊切爲二部，留一部分志願軍以餌誘馬霍諾，對於哥薩克軍隊的後方給以重大威脅；

第四，我們可能使哥薩克與丁尼金發生不合，這時丁尼金因了我們的迅速的移動，必定努力想把哥薩克軍隊調向西去，但是大多數哥薩克是不肯去的……

第五，我們可以獲得煤炭，而丁尼金却失掉了煤炭。這一計劃的採行是不能遲緩的……

簡短的說：舊的，已經失掉生命的計劃，無論如何不能再用了，——這對共和國非常危險，這確是使丁尼金的環境會變得輕鬆。要用別的計劃代替它。對於這方面的情勢和條件不僅已經成熟，而是已經迫切地需要這種變動了……沒有這種變動，那末我在南戰場上的工作便都變成無意義的，犯罪的，不必要的了，如果不能給我全權，或絕對信任我願意怎麼作就怎麼作，那末就讓我滾開，不要再留在南戰場上了。

您的斯大林。

如對這個文件再加解釋便成多餘了。斯大林同志是多末注意自己，是用多麼好的方法來測度最短的作戰路向。在內戰中，一種單純的數學原理是不够用的，而且也常會錯誤。如果他要經過敵人的勢力範圍，從蔡里城到諾沃羅西，依斯克的道路就會變成很長。相反的，如果他經過工人的哈里科夫，經過頓巴斯，從圖拉到諾沃羅西，依斯克就會變成很短。在這種對路向的估計中，表現出斯大林同志的基本性質，他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是一個真正的內戰的戰略家。

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斯大林同志的計劃。列寧親手給戰地司令部發下命令，火速撤銷已經過時的命令。在哈里科夫——頓巴斯——羅斯托夫方面的南戰場上給了一個主力的反擊。結果：內戰中的轉機完成了。丁尼金的軍隊都被



拋到黑海中去，烏克蘭和北高加索也都從白軍手中解放出來。這一切的大功都是應歸於斯大林同志的。

還應當提一件和斯大林同志有關係的，在南戰場發生的重要的歷史的事件。我曾經擔任過組織騎兵的工作。這是把騎兵師配合到大隊軍隊中來的第一次試驗。斯大林同志看出了騎兵在內戰中的力量。他清楚地明白他們在殲滅的運動戰方面有巨大的意義。但是在過去，誰也沒會有過這種自信的經驗，相信騎兵隊伍的行動怎樣好。甚至在書本上也未曾有過關於這種事情的記載，因此，這種方法或者引起人的懷疑，或者引起簡直的反對。但是斯大林同志並不如此：他如果一確信了自己的計劃的有益和正確，他永久是一直向前去實現它們。於是在十一月十一日共和國的革命軍事會議接到了由南戰場的革命軍事會議送來的，下面的報告：

「共和國革命軍事會議。

南戰場革命軍事會議在本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會議上決定，因鑒於目前形勢的條件，要用第一和第二騎兵軍團的戰士組成一個騎兵軍和一個狙擊旅（然後可以增加第二旅。）

騎兵軍革命軍事會議的構成份子：軍長布簡內依同志，委員：伏羅希洛夫同志和施察簡珂同志。

附件：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南戰場革命軍事會議甲字第五〇五號決議。

上附決議請准予追認。」

不顧一切困難，甚至是在違反中央的意志下組成了騎兵軍。它組織的開始是由斯大林同志經手的，因為他自己明白類似的組織的必要性。這一個歷史的事件是大家已都清楚知道的。

斯大林同志還有一個特徵在南戰場上很清楚表現出來：善用突擊的集團來活動；選擇着主要的方向，把優秀的力量集中在一方面，予敵人以打擊。因此，他在選擇方向的一方面也達到了優秀的技巧。



丁尼金的軍隊被擊潰以後，斯大林同志已獲有了第一流組織者和軍事領袖的權威是不容反對的事實。當一九二〇年一月中在羅斯托夫附近，因為戰地指揮機關的粗鹵過失，致使我們的進攻發生了危險的延誤時，當因逐漸恢復力量的白軍可以消滅我們的勝利的成績，以致重新發生威脅時，中央委員會給了斯大林同志下面一個電報：

「因了確立高加索戰場上的指揮的真正統一，援助戰區司令官和軍司令官的權威，廣泛地利用當地的軍力和物質，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認為您有絕對參加到高加索戰場的革命軍事會議去的必要……請通知一聲，什麼時候您向羅斯托夫出發。」

斯大林同志雖然因了自己的健康關係，以不離開當地較好，但仍服從了命令。後來使他非常不安，因為這種經常的調動將要被許多當地的黨機關誤解，它們會歪曲地「告發我是在無聊地從這一州向那一州亂跳亂鑽，因為它們並不知道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註）

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同志商量着，列寧在二月十日拍給他一個電報：「我不會失望，因為……一切事情只要您不更調就會弄好的。」

當烏蘭蓋里在白色的波蘭軍的鼓噪下，從克雷米半島爬出來時，又使剛才解放的頓巴斯和整個南方都感到了新的可怕的威脅，中央委員會作了下面的決議（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

「因了烏蘭蓋里的成功，和加於庫爾的威脅，必需承認烏蘭蓋里戰綫有巨大的，非常獨立的意義，應當把它畫成一個獨立戰場。委任斯大林同志負責改組革命軍事會議，集中全力於烏蘭蓋里陣地，依照總司令部與斯大林同志所商得結果，戰區指揮官派葉郭羅夫或福龍捷。」

（註）斯大林全志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電報。



同日列寧會致斯大林一書：

「剛才把各陣綫政治局來了一次分配，爲了使您可以專門在烏蘭蓋里戰場上工作……」

斯大林同志組織成了一條新陣綫，因了這種工作把他的病也弄好了。

斯大林同志把西南戰場的革命軍事會議的委員送進白色的波蘭軍隊中。波蘭軍隊的潰滅，基也夫和頓河右岸烏克蘭解圍，向嘎里琪亞方面的深入，騎兵第一軍——斯大林同志的成績——的有名的挺進的完成，一切都表示出了他的熟練的和巧妙的領導的優秀的結果。

烏克蘭方面波蘭軍戰綫的毀滅，幾乎把波蘭第三軍的全部在基也夫附近消滅，向別爾吉喬夫和日托密耳加以重大打擊。而且平行着活動的騎兵第一軍完成了使我們西部戰場轉向總攻擊的形勢。後來西南戰場的活動直把紅軍推進到里奧埠附近。後來因了我軍在華沙附近的失敗，才使已離里奧埠僅有十公里的，準備向里奧埠衝擊的騎兵軍遭到挫折。

但是這個時期的事變是那末多，要想把它弄明白，是必需很多的文件的參考和詳細的分析的，那就要超出我們論文的範圍以外了。

對斯大林同志只用這末簡單的幾筆軍事工作的描寫，是不足以說盡他的軍事領袖的和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基本特徵的。

只要有什麼事情一進眼睛——斯大林同志這種才幹就可以很快地把握住具體情形，而且隨意地把它運用起來。斯大林同志爲使殘酷的敵人動搖，混亂和散漫起見，他認爲什麼地方是爲了革命利益的，永遠是毫不遲疑地把全付責任負擔起來，或予以根本的變更。如果什麼地方需要革命的環境時，斯大林同志就決定違反着各種法條，各種同



僚的意見去作。

斯大林同志在深思過的和爲高級軍事機關所支持的決定條件下，永久是個嚴厲的軍紀和集中化的同情者。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送交革命軍事會議的保衛計劃中，和德捷爾仁斯基一同寫道：

「軍隊的活動，是不能像一個自滿的單位，而應當完全是一個自治的單位；它在自己的活動中，對鄰近的隊伍，特別是對於共和國的革命軍事會議的訓令有着直接連繫；最有戰鬥力的軍隊，在各種同樣條件之下，它可以在中央的命令的不正確中忍受危險，和避免和鄰近的隊伍的行動上的衝突。在戰場上，特別是東戰場上，必需要建立爲實現決定的，嚴密考慮過的戰略訓令的各部隊活動的嚴厲的集中制。在決定命令中專橫或草率，對一切條件都沒有仔細研究，就遽然地把命令改變，而共和國革命軍事會議也就允許把命令弄成這樣不確定，這簡直是要失去指揮軍隊的可能性，弄到白消耗力量和時間，混亂戰場的局。」

斯大林同志爲了保證被委託的事業，永遠是個人負起總責任，不拘泥於那種「官樣的分工。」

斯大林同志非常注意到軍隊的給養。他知道和明瞭，戰士們必需吃得好和穿得暖。不論在蔡里城，在披爾梅，以至在南戰場，他無論如何總要想辦法使軍隊的給養足用，因此才可以使他們變成有力和堅強。

在斯大林同志身上，我們看到一個無產階級陣營中的組織者典型的特徵。他對於補充軍隊的階級性特別注意，務期軍隊中真正都是工人和農民，「不是榨取別人工作的人們。」他把在軍隊中展開政治工作一事提到非常高的意義，在必要的時候，他屢次地發起召集共產黨員，把他們的大多數送到戰士的隊伍中去。斯大林同志對於選擇軍事委員一層特別要求得嚴苛。他不客氣地批評了那時的全俄事務局的軍事委員們的派遣「學徒」的方法。他說：

「軍事委員應當是軍事的靈魂，專門家們的領導者」（一九一八年由蔡里城發出的電報。）



斯大林同志加強了軍隊後方的政治工作的重大意義。他在關於第三軍的報告中寫着：

「我軍的不健全處——爲由於黨工作的擱置，工農兵代表會議的不能熟練地變通實現中央的命令，各地非常委員會弄成特殊的絕緣的形勢所表示出的後方的不鞏固。」

斯大林同志對選擇人位方面是非常嚴厲的。不管職位，也決「不看面孔」，他用最僵硬的手法更換無用的專門家，委員，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同時，斯大林同志也永久援助和保護那些向他表現出對革命忠實的人們。這樣就使斯大林同志造成了許多著名的有功的紅軍官長。當一個內戰的真正無產階級的英雄帕爾霍維科同志，（後來曾升到騎兵第十四師師長，死於和馬霍諾匪徒戰役）於一九二〇年初，因誤會被判處極刑時，斯大林同志一聽到這事，立刻要求火速無條件地把他釋放。這一種類似的事實是舉不勝舉的。斯大林同志，在許多人中，可說沒有誰能及上他那末善長深刻地估價，把自己的生命交給無產階級革命的人了，官長們都知道這事，而凡是爲了我們事業的鬥爭受過他所領導的人也都知道。

斯大林同志在內戰中是這樣的。在後來的許多年的爲社會主義的鬥爭的過程中他還是這樣。

內戰要求斯大林同志的力量，精神，意志和智力的極大緊張。他把自己的全付生命都交付了出去。但同時也使他從內戰中獲得了自己以後工作的許多經驗。

斯大林同志在內戰的各種不同的複雜條件中，發揮着革命的戰略的偉大天才，永遠能正確地判斷着主要打擊的基本方向，靈活地考察着適宜的環境，運用着戰術，完成所希望的結果。無產階級的戰略和戰術的特質，在內戰以後還有許多殘留在他身上。他這種特質是全黨都很明白地曉得的。對這種情形的最好說明，是托洛次基派和他的同類的想用自己的小布爾喬亞意識變更馬克斯，列寧的偉大學說的企圖。不久以前才完全被毀滅的右派機會主義份子



們也有許多人很曉得這事。

斯大林同志在和平的環境中，不倦地和列寧的中央委員會共同進行着比在內戰中還要成功的鬥爭，和一切黨的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有意的和無意的敵人作猛烈的鬥爭。

同時，真正的戰爭雖然早已停止，但斯大林同志始終是不倦地從事於保衛無產階級國家的工作。就在現在，他和從前一般，很明白紅軍是國防上的最親近的和最可貴的朋友。

（譯者按）這篇東西是兩年前，當斯大林五十歲壽辰時，蘇聯紅軍元帥伏羅希洛夫所發表的祝文，但我們却從這裏看到了一個偉大的人格是如何成長起來的，這對於我們在目前的環境中，在前敵指揮軍事的長官們該是一個很好的參考；因此，我匆促地把它譯出，願呈獻給我們一切為祖國，為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殘酷鬥爭的英雄們。



# 時論選輯

## 五中全會開會詞

蔣委員長

——以事實證明敵國必敗及我國必勝——

### (一) 本屆全會的任務和我們抗戰革命應有的堅持貫徹的精神

各位同志，這一次全體會議舉行於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意義是非常重大，任務也特別艱鉅。本席最近屢次指出我們抗戰應該分爲兩大階段，自從廣州失守，武漢退出以後是第二期。第一期任務在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維護我們後方準備工作，戰略與政略，確立長期抗戰的基礎。完成我們長期抗戰的一切布置。第二期的任務，就要承接前期奮鬥的成績，實施我們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計劃，與發揮我們抗戰的力量，以達到抗戰勝利與建國成功的目的。所以這次全會是我們轉守爲攻，轉敗爲勝，以我們的努力來決定興衰存亡的一個大關鍵。臨到這個存亡興衰的大關鍵，我們到會同志就應該檢討過去的事實，確定今後的方案，提高奮鬥的勇氣，以從頭做起的精神，腳踏實地來貫徹到底。近來抗戰形勢，一方面我們軍心民心比前格外堅強，內外情勢，亦是日趨有利。全國同胞皆認爲我們國家危險已經過去，對國家前途非常樂觀，必勝的心理，亦更加堅強。可是我們本黨的使命，也就日益艱鉅，因此全體同志必更關心於黨國的前途，研究有沒有更好的策略和計劃。



## (二) 目前我們第一要務在認識抗戰目的和敵我情勢堅定決心

### 與信心

本席的意見，認為我們革命黨的精神，是祇問我們本身做不做，就是問我們本身革命不革命，換言之，就是說：我們抗戰不抗戰。如果我們能做，能抗戰到底，就不怕沒有計劃，也不怕沒有辦法。要知道我們革命真正的辦法，就是「以拙制巧」，「以寡克衆」，本着我們三民主義，向前邁進。我們如果能像第一期抗戰的精神一樣的犧牲奮鬥，而且能更進一步實事求是的做去，那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就毫無疑問。如其不然，或知而不行，或行而不力，或一時努力而不能持久，或開始積極而半途消極，或祇講形式而不求實際，或徒有志願而沒有確切實行的方案，或有了方案而不能勇猛的執行，那麼有利的時機也就會輕易放過，好轉的形勢也將無補於事實。所以一切成敗興亡的根本，全在我們有沒有革命的精神，和有沒有必達目的的信心和決心。我們有了這個決心，纔可以根據決心來定出有效的方案。我們對革命救國和抗戰必勝有了堅強的信心，纔能够不怕艱難，不畏危險來切實執行所定的方案，以抵於成功。所以我要求我們同志，第一件事就是要確立決心和信心，從什麼地方生出來呢？就是要對我們抗戰目的和抗戰局勢有正確的認識。有了正確的認識以後，決心才不是血氣之勇，才可以持久奮鬥，到底不懈，有了正確的認識以後，我們的信心才是有確實根據的信心，才能够堅忍不拔。我們爲什麼要抗戰，爲的是我們要求國家民族的生存自由，要遵奉三民主義來革命救國。而敵人根本不許我們生存，我們此時如果不能抗戰，妄想中途妥協，這就是半途而廢，這樣我們民族就要整個滅亡，世世子孫就要永爲奴隸牛馬，萬劫不復。我們若不能抗戰到底，我們國家就要淪爲敵國的奴屬國與殖民地，而且從此國際正義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永無保障。我們總理一生倡導革命，救國救世的担負，都要付之東流了。



### (三) 敵國有必敗之理其事例如下

自從敵國政府和他首相近衛先後發表聲明以來，他這一個併吞中國以獨霸太平洋侵略全世界的陰謀，已是舉世共曉，不待再說。我現在所要向各位同志講明的，就是敵國目前已經失敗，且有種種理由，證明他最後一定要遭受最大的失敗，我們祇要奮鬥下去，就有必然勝利的把握。先就敵人方面來說：且不提這十八個月以來，他在我中國南北各戰場上死傷了七十萬以上的官兵，消耗了九十萬萬的戰費，弄到他國內羅掘俱窮，農工停滯，社會墮落，釀成政治上的騷擾不安。這些還都望有形的跡象就是從他發動侵略到現在一切戰略政略上的運用，以及對我中國的觀測預計，和他對時代的認識來講，實在是處處違反原理，步步陷入於錯誤，當此成敗利鈍，存亡絕續之交，本席要根據真切的事實，為全會列舉敵人必然失敗的事例，對各位同志提出詳細的分析報告。

#### (甲) 違反其大陸政策之既定步驟

第一：敵國這次發動侵略，人人知道是實行他的大陸政策，所謂大陸政策，依照他們內定機密的傳統政策，和他們公開的田中奏摺，侵略我中國的全部，乃至獨霸亞洲，統一全球。但他在佔領東北尚未穩定之時，而就要來侵略佔華北，他的力量達到華北以後，又由慢性的侵蝕變為急性的鯨吞，於是公然來佔我平津，這已經和他所謂大陸政策既定的國策與戰略，全是背道而馳了。不單如此，他還要再進而至於華中，甚至侵入華南佔我廣州，這是他更進一步的來破壞他們自己的傳統政策了。他進入了華中以後，不但戰略上陷入進退不能的地步，就是政略上也迫令他不能不倒行逆施，與世界各國為敵，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這是他第一件必敗之道。



(乙)其「不戰而屈」「速戰速決」與「速和速結」之企圖皆不能得逞

第二：他對我們中國最初的企圖，是要不戰而屈，但我們終於戰而不屈，已經非其意中所料了。既戰之後，他就想速戰速決，但自南口淞滬忻口南京一直到了魯南會戰，以及鄱陽湖邊大戰，到山脈之戰，一步步深入，終於不能速戰速決，於是反轉來又渴望速和速結。在我們未退出武漢以前，他的雜誌報章上就竭力鼓吹中止戰事，或設法停戰，一面以種種狡計詭謀，想誘我們入彀，圖騙世界，圖取便宜，但是不久他又圖窮匕見，拿出他所謂「興亞院」「東亞協同體」一套狠毒計劃出來。現在不但中國全國民衆深悉其陰謀，就是世界上也灼見其野心所在，他這個企圖又明明失敗了，這是他戰略企圖上的第二失敗。

(丙)戰略上失敗(一)不知彼己(二)一味取巧僥倖違背「拙速」原則

(三)頓兵深入陷于掛形

第三：從戰略上看來，他不單違反三個軍事上的原則，而且更犯了軍事上三個大忌：(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終沒有夢想到中國抗戰到十八個月之久，不但不爲所屈，而且愈戰愈強，他也沒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序之後，要疲竭到以五個人來拚中國一個人的地步。第二戰區，有中國方面死一人而日軍要死十四人半的統計。(二)他一味希圖取巧僥倖，如想以輕巧取勝，而結果適得其反，完全違背了孫子「兵貴拙速」的原則，弄到政潮迭起，反戰空氣日濃，而自誇爲唯一戰時內閣的近衛文麿，乃不得不因此下台，又證實了孫子所談「兵久而國不利」的名言。(三)昔人所謂「頓兵深入」的大忌，原爲對強者而說的，現在他從東海邊頭深入到幾千里外中國的內地，使得他已佔領的地區轉變成了中國正規軍和遊擊隊縱橫活動的勢力所在，處處要受中國的控制，時時遭到中國的打擊，欲進



則愈陷愈深，要退則到處荆棘，這真是做到了孫子所謂「鈍兵挫銳，屈力殫貨」的地步，已經踏入了孫子所說的「諸侯乘其弊而起」的危機。目前形勢，日人確已自陷於孫子所稱的「掛形」的境地，真所謂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到了「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的地步了，這是他戰略上最顯著的失敗。

(丁) 戰略上失敗 (一) 製造傀儡利用敗類加深軍人腐化 (二) 外交方策支

離矛盾日益孤危

第四就戰略上來說：他對於中國祇能拉攏若干形體不全，聲名狼狽的敗類藉做傀儡，利用流氓土匪做爪牙，一方面以加深他們軍人的腐化，他方面更暴露出他種種罪惡與愚蠢，供舉世的嘲諷。而且不自量度，妄想把他東扯西湊仿效摸擬而得的文化來併吞我們中國悠久獨立的文化，以武力和政治侵略，來掠奪我們的經濟，結果不單弄到他束手無策，一事無成而且反加深了他國內以下剋上的現象。至於在外交方面，他本來企圖緩和蘇俄，結果祇自形其卑怯，妄想交歡美國，更引起其反感，存心拆散英法美的陣線，而結果又適得其反，步步支離，處處矛盾，這就是所謂根本既錯，枝節就一無是處了。

(戊) 不認識我國歷史與民族力量更不認識現在的時代和我們革命發展的特質

第五講到他對於我們中國的認識，他既不認識我們中國自來民族潛在抵抗力的雄厚，也不認識現在是民族主義發達澎漲而不可遏制的時代，又不認識我們中國歷史的真相，他一味以金元清自待，終以中國民族為可欺可亡，不成問題，而不知道宋明挫敗的主因，在於當年朝廷內極少數人不明敵情，不辨利害，精神受敵脅制，終於被敵欺誘降服，並非我們全民族的滅亡。現在敵人竟妄想「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之下，於短期內統制我們中國的夢想。他



全不想想他侵略我們東北，費了四十年以上的光陰，用了很大的兵力，耗了不少的經費，至今依然不能控制我們的東北，更無論乎統治。這種眼前的事實教訓，他還不知省悟，反而要變本加厲，併吞我們中國的全部，甘蹈最近失敗的覆轍，這全是由於他根本不認識我們中國民族，不認識我們三民主義的力量，不認識我們國民政府的特性，更不認識今日的時代，以及今日中國的革命戰略，與革命戰術。老實說：從前拿破崙侵略帝俄，那時節全面攻擊和長期抗戰的戰略戰術還沒有發明，拿破崙以如此雄才策略，有如此大軍，尚且不免於覆敗，何況今天我們是一個民國，民族精神普遍發展，舉國民衆敵愾同仇，在國民政府命令之下，實行現代革命的戰略和戰術，任何武力也決不能僥倖求逞。孫子地形篇有「知敵之不可擊，知吾卒之不可以擊，知地形之不可以戰」之三大原則，我今再爲孫子續一原則曰：「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擊，知地形之可擊，而不知時代之不可擊者，則無勝之道也。」敵人不知對方之情勢，尤其不認識時代，更不待煩言而可明。

#### (四) 敵國之必敗即我們之必勝吾人應強化精神力量堅持抗戰

##### 全力決戰而決不能中途妥協投降

祇就上面所說的五點，已可斷定敵人有必敗之理。現在敵我相持，勝敗異勢，敵之必敗已甚明，我有可必勝之道。單就軍事上說：在第一期作戰的時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帶作戰，他的陸海空軍與機械化部隊可以進出運用，縱橫自如，在這樣的戰場上作戰到了十八個月之久，他不但不能使我們失敗，而且我們還愈戰愈精，愈戰愈強。此後第二期作戰，進入到了內地河山交錯，沙漠無際，交通給養極不便的戰場，他的伎倆當然更難施展。何況他全國兵力已使用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了，大家都知道敵國的軍備，本來以百分之三十準備用於中國，而其他百分之七十全爲備俄之用，今日



他在我中國不僅使用百分率已超過了他預期的一倍以上，而且在中國死傷人數，已經到了他全兵力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了，至於敵軍詳細的數字，等到軍事報告時，再對各同志詳細說明。各位看敵軍的兵力使用與死傷，已經到了這樣程度，這就可證明他侵略的失敗，已經是確定了，而且以後的戰場，彼我難易相較而論，我們一個子彈，至少可當作三個子彈來用，我們一個士兵，至少可抵敵人五個士兵的力量，而敵人方面適得其反。以後作戰，由我們這一年半過去的事實和經驗來說，敵人至少要以五個人當我軍一個人，要以三個子彈，當我軍一個子彈來用，或許還要加多幾倍，亦未可知，所以今日問題，祇要我國不投敵以可乘之隙，就是最後勝利確有保障。什麼是投敵以隙呢？我若精神受其威脅，意志為所動搖，自甘屈服，急求妥協，那就是敵人所大欲。惟有這樣，敵人就可以解脫他無法自拔的苦境，補救他無法可挽回的弱點，而我們國家民族也就要自此永遠沉淪，萬劫不復了。總之，我們能持久抗戰，必能得到勝利，如不能堅決抵抗，而與敵妥協，訂什麼和約，那敵人就可根據着屈服條約上所享有的地位，更無止境的深入，到了這個地步，那我們中國就要在敵國所稱「東亞新秩序」「日滿支不可分」「東亞協同體」等等新造名詞烟霧籠罩之下停止了呼吸，蔽塞了眼目，受盡磨難，歷盡犧牲，全部中國無論何地，無論何人，都要受敵人的宰割蹂躪，萬無倖免之理。精神一被脅制，局勢立即變遷，而且屈服條約一經簽訂，主奴名分隨之確立，這樣就無異於犧牲我們中國自己世世子孫未來的生命，反而去救了敵國的危亡了。

明白了我上面所列舉敵人方面自造失敗自作罪孽的各種事例以後，各位同志，就可以知道這一次中日戰爭，如果日本能獲得勝利，即就是世界上一切戰略戰術和所有軍事學識都要根本推翻。甚至一切事物的原則原理都可證明為無用了。明白了今日敵人多方脅制誘降的意義以後，各位同志就可以更明瞭我們所應該竭力堅持的是什麼，明白說一句，就是要立定決心，不屈不撓，也就是說我們的精神絕對不要被敵人所脅制，我們更絕對不能受敵人欺騙，我



們一定要持久抗戰，奮鬥到底，不但使敵人過去「速戰速決」的目的不能達到，而且要使他現在「速和速結」的狡謀成爲粉碎。這就是我們今日唯一的方略，這就是敵之失敗，也就是我國勝利的基礎。我慎重的告訴各位同志，這是以受全國安危重託的統帥地位，就十八個月來深切體念而得的結論，特再提出來貢獻於我們全會同志的。諸位同志更應該使全國同胞明瞭我們今日何必要以宋明歷史爲前車之鑒，要知道宋明的滅亡，並不是敵人外族有如何優勢的力量，而完全由於當時政府少數將吏以及社會士流意志精神的動搖畏怯，乃至全國人民受他影響，弄到全局敗壞，不可收拾。我們今天有如此良好的國民精神，有如此深厚的革命基礎，又有我們本黨適合時代的三民主義，祇要不自暴自棄，任何力量也不能滅亡我國。今天的事勢很顯明，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敵人必然將更兇橫的憑藉其武器兵力，來作孤注一擲的掙扎，我們的方針，却是很簡單很明瞭，我們從第二期抗戰開始以後，就要用我們革命的戰略戰術，以更奮勇堅決的抗戰根本打擊敵人，已搖動的意志，已疲竭的力量，很迅速地促起敵人的總崩潰，來完成我們革命的任務。我再告訴我們同志一句話：我們目前如果妄想妥協，希求僥倖的和平，就無異自投羅網，自取滅亡。須知敵國前近衛上月廿二日發表的所謂調整國交的談話，實在是誘降的文告，而不是講和的條件。如果依此而講和平，老實說就是降服。我們中國民族有氣節，有廉恥，有前途，抗戰一年有半，犧牲盡管重大，力量愈戰愈大，但凡我們中華民族黃帝的子孫，爲要對得起我們的祖宗父母，對得起後代，對得起自身，對得起無數爲抗戰犧牲的先烈，就決無甘心降服之人。我們今天惟有全力決戰，以必死之心來抗戰，到達完成目的之日爲止。要知道降是生中求死，決無倖生之望，戰則死中求生，且有必勝之道。

(五) 從我們自身檢討在歷史地理文化民族精神和經濟上都有使敵人必不可勝的基礎



我現在再就我們中國抗戰自身作一檢討，我可以說，不但敵人有必敗之道，而且我國有必勝之理。孫子說：「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要做到不可勝，當然我們流血流汗，來努力奮鬥。但是我們從歷史地理文化經濟以及民族精神各方面來看，拿以往事實來說，我們先天條件上實在有使敵必可不勝的基礎，只要配合上我們人為的努力，必可以戰勝敵人而絕無疑義。

（甲）就歷史來說：我曾經說過，宋明之亡是一姓一家朝代的敗亡，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滅亡，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以來，是永沒有被人屈服過的，不僅是沒有被人滅亡而已。而且宋明當時朝代的覆亡，也只是由於極少數的將員無膽識，無氣節，只知個人苟且偷安，自私自利，而不顧民族禍福，以致數百年朝代整個覆亡。但是那時是君主專制時代，朝庭和民間隔成兩橛，痛癢既不甚關切，人民抵抗力也一時不能發揮，實際上當時整個民族的精神，是並未受制於外族的，而且是始終與外族侵略者抵抗到底的，待到民族普遍覺醒以後，雖時隔二三百，終能夠剷除夷狄，光復河山。而況現在是以民為主的民國時代，現在國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亦就是國民的政府，革命的政府，必為民族利益而奮鬥的，亦是保障國民利益而存在的，是認識我們自己的責任，而不能受人威脅的，是要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而絕對不怕武力侵略的。我們今日的抗戰，是政府人民意志精神與力量交互密合的一致行動。孫子所說的「道者，全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這是戰爭取勝開宗明義第一個大原則。我們這一次對敵抗戰，確實能做到一個原則，我們全國一心上下一志，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老弱婦孺，皆知殺敵自衛，皆聽約束指揮，真是所謂「死而無怨」更無人願出賣祖國世代的生命，而甘作日奴，我國幾千年來所謂「可殺不可辱」的志氣，已經由敵寇的獸行普遍喚起。所以就歷史來說：中國決無可亡之理，從以往歷史來看今日，由民族意識及時代精神來測驗這次的抗戰，中國更無被人戰勝征服的可能。



(乙)就地理來說，我國本有天然足禦外侮的地利，從前長城的建築，就是人民利用地勢以作禦敵設備的一個偉大的工程。我國面積廣大，東西經度跨有六十五度以上，自南至北，兼有寒溫熱三帶的氣候，所以我國論述軍事的成功，就以天時和地利並舉，內地及西部湖沼縱橫，山岳錯雜，平原沙漠，無所不備，所以就面積言，過去無論任何外族，只能占我一部分一時期，而不能永久佔我之全部，就是元清全力最盛時，也祇能佔到幾個據點，而我們民間反抗的勢力依舊存在着及於全國。今日敵人僅以七千萬人口，要來吞滅我人口比他大六倍以上的廣大富庶的國家，要來消滅我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民族，豈非夢想。至於從現在抗戰地勢言，我國地形複雜，已如前段所說，再配上堅強的民氣和人力，任何武器均有窮於使用的時候，所以就地理言，我國又必無被敵戰勝征服的可能。

(丙)就文化來說：自有歷史以來，亞洲國家就祇中國有獨立的文化，亦祇有中國以文化沾被外族，乃至使侵入中國的外族都受了同化，決沒有任何外來文化能消滅我國固有的文化。至於現代科學，則是世界共有共享的文明成果，但中國文化自然有其獨特的精神，這不必廣為徵引，祇看現在我國內地鄉僻人民的無分男女，遇到敵人，每每有忠義節烈可歌可泣的行爲，就可見中國文化力量根植的深厚，敵人要想以不東不西的模擬文化來消滅我們民族精神，他在許多淪陷區內已經受了不少失敗的教訓，祇要我們齊心一志，堅決奮鬥，抗戰愈久，民族正義必愈發揚，而且在抗戰期間，將要錘鍊出我們文化更切實的力量。所以就文化及民族精神言，中國又決無被敵滅亡的可能。

(丁)就經濟來說：現在戰爭起因，往往在經濟的掠奪，而成敗勝負，也往往以經濟能否持久為決定的因素。我國是農業國家，正在建設期中，突受暴力侵略，當初原是深可顧慮的一種危機，但是自從開戰至今十八個月中間，不但我們財政基礎沒有受到如何重大影響，而且金融是始終穩定的，後方民衆的生活更沒有受到戰時的影響，而且大多數省份由於去年農產豐收，消費節約，民間反而顯出充裕的現象，這就是因為我們是農業國家，富有堅強的持久力，不比



工業國家容易受到戰爭影響。我們現在進入了第二期抗戰以後，深信戰時經濟決無問題，我們在抗戰根據地的西南西北諸省，積極的開發國防工業，中小工業，和鑛產林木，以全國的技術人才資本，集中力量來做，必可為國民經濟建設確立永久的基礎，就是軍需民生也可不虞匱乏。我們農業國家戰時經濟持久力的堅強，這更是敵人所未會計及的一點，又是敵人一個最大的失敗，所以就經濟言，中國是足可長期抗戰，而沒有被敵屈服的可能。

## (六) 國際形勢發展的方向必趨於維護信義與和平各民治國家

亦日加強其遏止侵略的準備和決心吾人更應循此公理

### 正義發展的道路貫澈抗戰到底的國策

現代戰爭，不僅應知彼知己，尤需要知道國際形勢發展的方向，敵人不但不認識自己，不認識我們中國，簡直也不認識時代環境，當然要步步趨於失敗。這一年來的國際形勢，大體說來表面上雖然是動盪不安，而其潛伏的主流，總是朝着維護信義和平的方向前進。尤其是歐美幾個民治大國，應付變局非常謹慎，在民衆方面，排斥侵略主張公道一天的有力，就是他們的政治家，一方面苦心孤詣的想穩定現有的局勢，同時也絕不放鬆充實自身力量的準備，從種種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他們有遏止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最近這種形勢更是日趨明顯。我們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早已看定世上唯有公理正義的道路，纔是人類共循的道路，凡是能自強自立的國家，即使一時困苦犧牲，也是義所當然，久而久之，自然可以得到正義方面的共鳴。就最近國際演變的跡象來印證，我們六七年來的觀察實在是絲毫不爽，這不是我們有什麼先知預覺的本領，我們就是抱定總理救國救世革命的立場，所以一切都發乎良知和正覺。



## (七) 我們的抗戰是哀兵是義戰是要救中國以求有所貢獻於

### 東亞與世界自古哀兵必勝義戰必成

同志們必須明瞭的，我們總理畢生革命，救中國亦所以救世界，我們抗戰不屈的國策，就是遵奉這個寶貴的遺教，這是三民主義的革命信徒所應該一致堅決固守到底的。我們總理曾言中國恢復了民族地位以後，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總理在民族主義及各種遺教中又嘗一再訓示：中國是東亞的支柱，是亞洲的大邦，當中國強盛的時候，四鄰安服，衷心歸向，環繞我國周圍的民族，都能保持獨立，和樂共存，總理更從歷史事實指出「我們向來沒有以經濟力去壓迫他族……中國的和平思想，到漢朝時已經是很充分」我們不侮鯨寡，不畏強暴，講互助，求自強，崇尚信義，反對侵略，所以總理又說：「中國強盛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存在，日本本強了不過二十年，這便把高麗滅了，」這就是中國向來以濟弱救傾為政策，以自存共存為原則。我們國民革命，就是要發揚我們這個信義和平的道德，促成世界人類共同永久的安寧與幸福。歐洲戰事終了的時候，總理起草了一部建國方略，目的是要促成中國產業的近代化，亦就是為世界資本技術創一個極好的出路，免得世界人類再因爭奪資源市場而發生慘酷的戰爭。中間最緊要的一句話，就是以「操之自我則存」的原則來利用外國資本和機器，可惜這一個悲天憫人救國救世的主張，沒有具體實現，反而日本利用歐戰後的時機，步步向我侵略，九一八以來，我國始終委曲忍耐，尊重和平，日人繼續擴大侵略漫無止境。他全知道現在是「民族自決」和「民族主義」思潮澎湃的時代，小民族尚且要求崛起獨立，世界列強也都改變過去態度和方式，在這樣的時代，敵人還妄想以七千萬人口的國家，來吞我四萬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塘沽協定以後，我國立國生存到了最低的限度，到了這個地步，日本還要破壞中國生命所繫的一線生機，無端起釁，但我平津這一個最低限度尚且



不許我們保存，那就是生不如死雖存猶亡了，與其雖存猶亡，就祇有拚命奮鬥，古語說：「兩邦相遇，哀者勝矣。」我們那時節萬無再不抗戰之理，我們的士氣民心，完全是悲哀憤激，有死無他，這是世界上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哀兵。」而我們的抗戰也就不僅為捍衛本國的獨立生存，同時更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所以我們這一戰，又是堂正的「義戰」，而敵人無底的侵略中國，乃是師出無名的自殺自殘的「暴戰。」我們在開始抗戰的時候，早已算定今天的一切艱難困苦，甚至比今天還要加深十倍百倍的艱難困苦。但是這一個神聖義戰既然加到我們民族的肩頭，我們就必然要排除萬難，以無上的犧牲來達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任務，我們一定要打擊侵略，要國際條約恢復效力，要公理正義伸張，尤其要以我們的堅決抗戰，證明暴力橫行之必敗，改移世界全體人類的視聽，永保國際的和平。

## (八) 認識自身認識敵人認識環境與事物發展之必然性即可曉然

### 於成敗勝負之數

同志們必須知道，抗戰以前，全世界視我國為三等國家之不如，現在我們與一等強國的日本戰鬥到一年半以上，尚且不為敵人所戰勝，我們當然不必再畏敵人的暴力。我們的前途當然還有很多的困難，但是抗戰進入了第二期以後，我們確信戰局必然是一天天順利，一天天接近光明，問題全在我們有沒有不屈不撓，長期持久的精神，有沒有舉國一致，愈戰愈奮的努力。由於上面的敘述，各位同志可以確實認識我國自身支持奮鬥的實力，認識敵國的戰略政策，認識其他方面各種實際情勢與演變的過程，由此體悟到世界一切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即可曉然於成敗勝負之數之所在。自古大勇生於大智，我們對於抗戰之使命和前途既有這樣顛撲不破的正義，就必能自然而然的生出勇敢無比的決心和信心。



(九) 今後我們要作爲毫無憑藉的從頭做起針對着敵人的情形

來努力

現在我們抗戰是已經進入了第二期，無庸諱言的我們已損失了不少的土地和大部份的交通線，犧牲了同胞不少的生命和財產，被攫奪了無數的產業和資源，可是我們要知道，革命的工作，本是從頭做起的，我們今天就要以現有的土地人力軍力財力效法我們同盟會以前革命先烈手無寸鐵毫無根據而舉起義旗，反抗民族統治的精神，從小處低處極艱難困苦處腳踏實地，定下具體行動的方案和計劃，定出了方案計劃後，就要竭我們的心血能力，一條一句都要切實做到。敵人宣稱「戰事要百年化」，我們認爲抗戰建國的工作決沒有時限可定的，五年不成則十年，十年不成則百年，一天不達到目的，我們就一天不停息。我們怎麼樣來努力呢？我們要針對着敵人的情形來努力。

(甲) 以我們的統一團結對付敵人的驕妄凌亂以下剋上

今日的敵人，正如孫子所謂「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日崩。」我們知道了這一點，就要以我們的統一團結來對付敵人的驕妄凌亂，以下剋上的敗象。

(乙) 發揮我國農業國家之特長節約堅持加深敵人工業國家的弱點

我們知道敵人在戰爭期內，工業停頓經濟破綻日益顯露，我們就要發揮我們農業國家的特長，刻苦節約，堅忍支持，來加深敵人工業國家的弱點。



(丙) 利用我們天時地利的優點加緊戰時一切建設促起敵國社會崩潰的危機

我們知道敵國大欲所在，是要根本毀滅我民族經濟基礎，我們就要加緊充實我們戰時一切的建設，培養持久抵抗的力量，以促起敵國社會崩潰的危機。我們知道敵國去年以來，天災流行，風災水災，加以陸續發生不斷的大地震，使他們國內被迫作戰的民衆格外受到痛苦和損失，我們就應該利用我們天時地利的優點，加緊農業生產，以抵抗天災人禍不可終日的島國的缺點。

(丁) 真實力行三民主義打倒敵人贗武主義

我們知道敵國人民痛苦日深，敵國政府統御無力，他的朝野上下反應意識日濃，我們就要真實力行我們的三民主義，堅強打擊敵人殘民以逞害人自肥的贗武主義。總之，我們今天的要務，是要以精神勝物質，以勤儉補缺乏，以加倍努力補已往的蹉跎，以犧牲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心來補我們武器和近代軍備的不足。

(十) 我們要認清黨和自身所負的革命責任確立負責盡職奮鬥

到底的誓願一致快幹硬幹苦幹實幹來爭取抗戰的勝利

完成革命的大業

同志們更須認識本黨對於國家的責任和黨員對於革命的責任。我們在抗戰緊張中這樣的集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要使這一次全會為抗戰第二期定下了確實具體貫徹到底的方針和計劃，我們自身也必須在總理遺像



之前，確立自身負責盡職奮鬥到底的誓願，實行黨的決議，尊重黨的紀律，鞏固黨的基業，竭盡黨的使命。我們不必理會抗戰期中有多少枝節，或困難，我們應該時刻自問有沒有盡到我們的責任。世界上決沒有一個自強自立的革命黨，而不能領導革命以底於成功的，也沒有一個有悠久歷史廣土衆民基礎深厚的民族，而不能求得完全的獨立平等和自由的。同志們請記着：「知難行易」是我們的信條，「自力更生」是我們的座右銘，我們只要能行能幹，能快幹硬幹苦幹實幹，沒有不成功的道理。我今天以最熱烈的和真實的精誠，期望本次全會的成功，祝我們抗戰建國革命大業的成功。

## 法國達拉第政府的危機

華 崗

一 達拉第「政府之地位」究竟是「較前加強」了還是發生了  
危機？

上月三十日法國同盟罷工自動結束之後，法國內閣現總理達拉第曾向全國人民發表了一次廣播講演，說：「罷工運動業已失敗，十一月三十日將爲歷史上之紀念日，法國內政外交兩方面之和平與理性政策業已成功。」又說：「總罷工之失敗，足證全國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任……法政府已能克服內部糾紛，政府之地位已較前加強。」這裏，達拉第顯然是犯了抹煞事實與顛倒事實之錯誤：



第一、這次法國同盟罷工完全是按照原定計劃自動結束，根本談不上失敗。據法國總工會所發表的公報：『政府雖出以高壓手段，防止同盟罷工；但京城與各省私營工業，大部分均皆實行罷工，即公用事業，亦有中止服務情事。礦工，海員與碼頭工人，則全部參加罷工。冶金業，紡織業，皮革業，化學業工人參加罷工者，達百分之七十五乃至九十五。』（巴黎三十日哈瓦斯電。）又據塔斯社巴黎二日電：『法政府雖恐嚇及抑制工人反對特別法令，但十一月三十日總罷工在工業區及工人住宅區頗為成功。在巴黎省私營工廠罷工者，占百分之九十，在私營及未被徵用工業中，計礦工罷工者百分之百，冶工百分之八十，化學工業及紡織工人百分之六十。』可見達拉第雖用壓迫手段抑制工人，而法國同盟罷工依然如期實現，且原定計劃，本係在三十日罷工一日，一日終了罷工結束，亦正係自然邏輯。任何虛偽巧妙的辭令，都掩飾不了這個鐵的事實。

第二、這次法國的同盟罷工，乃係法國現政府危機所產生的一個結果，並不能包括危機的全部，縱使罷工失敗，也決不能就等於解決了法國現政府的危機。恰巧相反，這次法國同盟罷工和過去幾次同盟罷工一樣，正表示了他們維護人民陣綫綱領的力量，正表示了法國工人大眾要以羣衆鬥爭方式來挽救並克服現政府的危機。如果達拉第不立即結束他的反共政策，及早尊重法國人民大眾的意志，執行人民陣綫的綱領，那末，這個舉行一天而現今已告結束的同盟罷工，未始沒有重現的可能。

第三、如果法國現政府之地位確實已經較前加強，那末相因而至，法國的國際地位也就應該較前提高才對。可是，正當達拉第自欺欺人的廣播講演發表不久，墨索里尼就想襲用希特勒的故智，向法國公開提出要素還科西加，及都尼斯領土了，而且據羅馬三日路透電：意大利在目前所以敢實行新索取領土運動，正是『利用法國國勢略為削弱的機會』。



由此可知，目前擺在法國現政府面前的正是危機而不是『較前加強』。所以現在我們應該研究的祇是危機的實質究竟何在，而不是有無危機的存在。

## 二 法國現政府危機的實質

達拉第與他的同僚曾經不止一次向世界宣稱：『法國不能擺脫經濟總危機，是因為四十小時工作制的緣故，而且工人不增加工作時間，國防的建設也就無從進行。』所以他會盡九牛二虎之力，要來反對四十小時的工作週，好像只要工人每週多做四小時的工作，法國立刻就能繁榮起來似的。這是何等無恥的謊言！誰不知道：現在有了四十小時的工作制，法國還有差不多四十萬的完全失業工人和一百萬的部份失業工人，倘若沒有四十小時工作制的話，這些失業數目馬上就要增加三分之一，而且誰也曉得破壞四十小時工作制，不過是新的更嚴重的進攻的前奏，所以如果不把這種趨勢加以制止，則法國的民衆，將要吃更大的苦頭，而達拉第內閣的危機也決無法減輕下去。

至於講到國防，那末，誰也應該知道工人們對生產與國防之努力，是超過那兩百家大資本家萬萬的。事實上破壞國防或對國防怠工的正是那些托洛斯大資本家，而決不是工人大衆。所以一切『懶惰浪潮』與『工人不關心國防』的口號，完全是污蔑工人的說法，完全是兩百家大資本家對國防怠工與擴張剝削的掩飾及護符，而達拉第千方百計想要取消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亦無非是爲滿足寡頭金融資本家的慾望，而增加工人大衆的痛苦，而削弱人民陣綫的基本力量，這是法國現政府危機實質所在的第一點。

第二、『法國人民誠心誠意的保衛共和國和國家的安寧，維護在法律中寫着的自己的一切權利，他們一致的團結起來，反對破壞人民陣綫底社會立法的全部企圖。』然而達拉第却擅用國防法令並濫用權力，剝奪人民的民主權



利，抑制工人罷工，逮捕罷工工人，如此即等於客觀上縱容並助長法西斯主義，那得不造成法國現政府的危機。

第三、法國在過去兩年間所以能抵抗法西斯的逆流，阻止戰爭的挑釁，一方面依靠於國內人民陣綫的團結，另一方面即依靠他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保衛法蘇協定。但從這兩月以來，達拉第對外政策，却已步步追隨英國，尤其是在慕尼黑協定中的出賣捷克行爲，差不多是等於自撤藩籬，使法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爲減低，使意大利竟公然敢於向他索取科西加島與都尼斯領土，這難道還不是法國危機實質之所在嗎？

### 三 什麼是「和平與理性政策」？

達拉第此次廣播演說又曾自誇他的措施是「和平與理性政策」，我們根據上面的簡略分析，不難看出達拉第口中的「和平與理性」究竟包含着什麼意義。然而，真正的「和平與理性」是不應該受到這種污辱的，而保存共和民主優良傳統的法國人民，尤其是有鬥爭經驗的工人羣衆及其先鋒隊——法國共產黨也決不能讓達拉第把法國共和國引導到黑暗災難中去，而會起來運用真正的「和平與理性政策」去克服並挽救危機。如果說當兩年前法西斯火十字團那樣猖狂的時候，法國共產黨的人民大衆能够毅然奮起組織人民陣綫以保衛共和民主解除法西斯的武裝及組織，那末現在當着人民陣綫受到威脅與剝蝕的時候，他們當更應該起來團結人民陣綫的基本力量，並用大衆鬥爭的方式去克服當前的危機，因爲他們明白地知道：「若是工人階級不起而守衛共和國，那末，這個共和國必定會被出賣，而且會被號稱共和派的人親手出賣。法國人民中共和派份子堅決性的程度，將依靠於工人階級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堅決性。」這次同盟罷工與科西加島與都尼斯及法國人民反意保土及效忠祖國的運動，顯然就是法國人民陣綫新階段鬥爭的開始。



他們曾進行了鬥爭，而且仍然鬥爭着，力謀爭回四十小時的工作週和確定一切社會法律的不可侵犯性。反對非法擅用國防法令，保衛民主共和，阻止法西斯的蠢動。保障領土與主權的完整，要求一切共產黨員和社會黨的同志們，和人民陣綫的全體參加者一致行動起來，加強工人階級的兩大政黨應有的團結，反對金融寡頭和反動派的一切威嚇，鞏固人民陣綫不可溶解的團結。

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一切挑釁行爲，目的都在侵害民主製造戰爭。而這都想以法國共和國做犧牲，所以站在目前法國人民與共和國的利益上，只有上述的辦法，才是真正『和平與理性』的政策，只有這種政策的推行，才能克服並挽救法國當前的困難與危機。

#### 四 中國人民應取的態度

自慕尼黑協定成立，同盟罷工發生以後，國內言論界對於法國問題異常注意，在這方面的批評文字也大爲增加，然而多半都失去了正確的立場，尤其是失了中國抗戰利益的立場，因此有許多批評文字簡直都成了無理的謾罵，而且有許多幸災樂禍的分子，唯恐法國人民陣綫不破裂，有的說法國人民陣綫已經沒落，甚至公然替人民陣綫做起『誄詞』來，好像法國人民陣綫的破裂或沒落，對然中國有什麼利益似的。

如果我們真個『以中國人民的立場』，『去探究法國政局的轉變』，那決不應該有這種幸災樂禍的心理與咒咀人民陣綫的態度。因爲我們的抗戰乃是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戰爭，對於以反法西斯爲職志的外國人民陣綫（法國人民陣綫自然在內）不但不應加以無理的反對，而且應把他看成友軍。這並不是說我們應盲目的『歌頌』他，更不是說我們中國也需要人民陣綫；不是的，我們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一致對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不需要人民陣綫，然而從這裏我們也絕對得不出就該去反對外國人民陣綫的理由。



而且我們基於『聯絡民主國家儘量爭取外援』的立場，對於法國人民陣綫的發展和鞏固，只有同情與歡迎，而決不應該出以咒罵和反對。正因為現在法國达拉第政府離開了人民陣綫，不能執行人民陣綫綱領，所以法國對於中國抗戰還不能有大量直接的援助，我們對於這種情形自然應該有所批評，並加以積極的影響，贊助法國人民去挽救並克服他們這種危機。贊成他們對於达拉第的反動政策，金融寡頭的進攻及德意法西斯的威脅，能夠及時的給以有力的還擊，為鞏固人民戰綫而奮鬥。

十二月五日

## 建立地方報紙和敵後報紙

馮英子

### 一 兩個任務

許多中心城市的陷落，許多重要交通路綫的棄守，我們的主要陣地，不得不從城市而移入廣大的鄉村，用新的戰略來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同樣的，配合這一戰略的新聞宣傳工作，亦應該走入鄉村，走入敵人的後方，以新的形式與新的內容，來完成歷史的使命。

什麼是新的宣傳，這裏，我們覺得可以提出如下的二種任務：

第一、迅速發展地方報紙。



第二迅速建立敵後的新聞宣傳機關。

以下，我們來談到這兩種任務的內容與實行問題。

## 二 爲什麼要發展地方報？

抗戰以來民衆動員的不够，方法不對是一種原因，但宣傳不够也是一種原因，而宣傳不够和地方報的不發達也有很大關係。

因爲地方報紙的不發達，大部份鄉村民衆就不知道世界大事，不知抗戰的各種情況，另一方面，政府的命令也無由下達，無由使民衆澈底瞭解，少數不良官吏可以任意曲解政令，作出與抗戰不利的事情。爲了使上述缺點的逐漸減除，發展地方報紙實爲當前的急務。

地方報紙的需要如是其急，但我們來看一看我們國內的一般報紙情形。根據德人羅文達先生抗戰以前的調查，我們國內報紙分佈的情形如下：

『中國報紙總銷數，在一百萬到二百萬之間，其中有一百六十五家報紙，佔有全國銷數百分之八十，如果中國人口總數是四萬五千萬，則每個中國人每年只得一份到兩份的報紙……中國報紙畸形現象，乃是集中於幾個中心地點，上述的百六十五家報紙，分配於二十九個城市……農村報紙，剛剛發軔，雖然也有三十到五十個農村報紙，然每報銷數不過數百。』

這是抗戰以前的情形。但這情形已經足夠說明地方報紙不發達的一斑。而抗戰十六個月後的今天，因通訊，交通等等困難的增加，地方報紙又增加許多阻礙。



今天的抗戰局面，比以前更艱難，我們要克服困難，取得勝利，地方報紙正是喚起並督促每一個角落裏的民衆去克服艱難的有力的工具。

### 三 怎樣辦地方報？

但怎樣辦地方報紙呢？

提到這個問題，大家一定會搖搖頭，說上幾個『難』字的。在事實上說，確實是一個極其難的問題。譬如在未辦之先，人才是問題，經濟是問題，印刷是問題，既辦之後，廣告成問題，發行成問題，新聞來源成問題，一切一切，無往而不是問題，馬星野先生在『發展地方報紙芻議』一文裏，就在『困難之所在』一節中提出了不少『困難』。

但我們今天整個國家局面也非常『困難』的，爲了保證我們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任何困難都應想法去克服，去擊破它。譬如人才有困難，但我們今天決不能等到有了人才才辦。又譬如說下級政治機構不良，影響了地方報紙的發展，但我們決不能等到下級政治機構改善以後，再辦報紙，相反地，我們應該以報紙的力量，去督促去改善下級政治機構。

所以，我們覺得今天的問題不是辦的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辦出來的問題。我們以爲地方報開始的形式不一定要十分好看（能够做到好看的當然更好），沒有鉛印，油印的也好，內容不必要十分嚴格，不一定要有社論，有副刊，應有盡有，只要能夠報導一些消息，反映一些抗戰的情形就行。在艱苦的行程中，一定可以使它逐漸提高，內容逐漸充實，達到理想的目的。

根據這種辦法，如能有二三個入，一具收音機，一副油印機，（可能用錘靈印字機印最好）立刻可以支持一張地



方報的生存。

#### 四 用什麼方法使民衆接近地方報？

在半封建的中國農村，地方報紙即使克服了一切困難，能够出版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由於我們民衆教育的不普及，鄉村民衆十分之八九都不識字，讀報是不可能的。所以，用什麼方法來使民衆接近地方報，這一問題也應該注意到。

地方報工作人員，不只是能够收電，紀錄，採訪，編輯，油印等就行，而同時必須是一個有愛國熱情有工作興趣的救亡工作者，必須注意到報紙如何使民衆接受，換句話說，一個地方報紙的工作者，必須同時是一個民衆教育的工作者。爲了擴大報紙對民衆的作用，我們應當幫助民衆讀報，使他們接近報紙，愛護報紙，使他們對報紙發生興趣與信仰。

怎樣來幫助民衆讀報呢？最簡單的方法是組織讀報班，這個讀報班可由地方報的工作人員發起，以當地的熱心救亡份子爲骨幹，三人一班可以，五人一班也可以，當地方報出版以後，讀報班的班員立刻就分別在交通要道，茶肆酒樓，以及其他公共場所，開始讀報工作。把報中所刊登的消息一條一條讀出來，而附以簡單的解釋。

自然，有些人會覺得這樣的工作非有專家來主持，就不容易成功。其實專家也不能樣樣都專，何況中國專家很少，如果這些事都要等專家來做，則地方報將永無普及之一日。我們以爲凡是有一些社會科學基礎常識的熱心救亡人員，都可使他們擔負起這個任務，使他們在工作中來學習，來進步。



## 五 迅速建立敵後的新聞機關

當武漢廣州失守以後，我們這個人口衆多的國家，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處於敵人的淫威之下。這些民衆，除了被屠殺，被姦淫，被摧殘以外，敵人還要用無恥的宣傳麻醉他們。

敵人的報紙，不斷散佈着毫無根據的謠言，如什麼「潼關危在旦夕」，「馮玉祥逃往鄭州」，「重慶恐怖之絕頂」，「國府動搖益甚」等等。敵人漢奸主持的「北平新民報」，「時事快報」，「蘇縣新報」中，不時可以看見這類無恥的誣蔑。

敵人這種無恥宣傳，應當增加我們的警惕。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我們要使淪陷區域的同胞，個個「人心不死」，個個覺得「國事大有可爲」，然後才能動員他們參加抗戰，爲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

根據這一任務，就必須迅速建立敵後的新聞宣傳機關。這裏有幾個問題應當提出討論的。

第一、敵後的新聞宣傳機關，建立在那些地方最適宜？

第二、什麼人去主持這些工作？

第三、工作的形式與內容如何？

關於第一點，根據淪陷區域的實際情形才可判定，譬如在山西一帶，我游擊隊勢力雄厚，民衆發動較好，比較容易建立。其他地方或較困難，這要看實際情形來決定。

用什麼人去主持這些工作，這裏可以採取如下的方法：第一、登記各淪陷區域中流亡出來的新聞工作者，第二、登記各淪陷區域中流亡出來的熱心救亡青年，然後施以適當的訓練，派回去工作。所謂適當的訓練，我們以爲內容最主



要的還是對抗戰的正確了解，加強他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與認識。

關於工作的形式與內容，在形式上，我們覺得最好能刊發各種報紙，但這種報紙可以使它儘量簡單，因為形式的簡單，一方面可以便利工作，一方面可以將需要的工具，減低到最少限度，便利展開工作，便利收拾攜帶。

這種工作的理想的工具，是一架油印機和一架收音機，工作最主要的對象是出版一種八開到十六開的油印報紙，而且要固定在一定的地方出版，依據戰爭的形勢，隨時流動，深入民間。

在內容方面，因為他所處的是敵人的後方，各種危險經常潛伏在左右，不容易像普通的地方報一樣，從容地採集消息，編輯新聞。所以，我們覺得它除了簡短的電訊以外，最主要的應該在駁斥敵人的無恥宣傳這一方面，多做些工作。

譬如說：在敵人報上登載了一段「華方和平運動漸起」的謠言，我們可以舉出我們如何團結，如何堅決的種種事實，來指出他的「無稽」；其次，更可以根據這一事實，說明敵人挑撥離間造謠中傷的陰謀，希望民衆不要相信，更加團結起來，予敵人以打擊等等。

配合這兩種工作地方報和敵後宣傳的開展，國內的廣播事業與新聞檢查制度，自然也有改善的必要。關於這點，第二屆參政會開會時，曾通過了『擁護抗戰建國綱領，確立戰時新聞政策，促進新聞事業發展』的提案，提案裏面有詳細的建議，我們不再談到，只期待其早日實施。

在抗戰正從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今天，願賢明當局與同業諸公對此問題能有更多的注意。

十二月十四日重慶



# 意教士間諜案破獲經過與真相

——新華日報通訊——

## 專稿一

在桐柏、大洪、武當山脈的中間，是以老河口為中心的一塊大平原，襄河橫貫着流過去，十字式的公路架在它上面，這裏是豫鄂陝川邊境交通的樞紐。自我軍武漢撤退後更成為鄂北政治軍事商業的中心地。

一百年前，這裏就有德意天主教徒來傳教。在那麼長久的日子裏，他們在穀城、石花街、老河口……等地普遍建立起大規模的教堂、學校、醫院、育嬰堂來，實行「佈道行善」。也就在這些日子裏，他們的田地一天天增加了，財產一天天豐富了。穀城觀音堂一帶的農民大部分種他們的田，住他們的房屋，借他們的債。農民有訴訟，只要神父講句話就完了。神父，在這裏老百姓看來，是那麼大那麼高啊！

抗戰以來，中國民衆天天受敵人的殘殺侮辱，救國熱情普遍高漲起來。老河口有些中國天主教徒也有良心有熱血，他們不願做奴隸，曾發起為國祈禱。天主堂裏那兩個意神父竟大罵發起的教徒，並罰不准做彌撒。（天主教最重的罰法）在他們的學校裏，不准講抗日，一個小孩子在牆上寫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幾個字，給意神父看見了，一邊叫傭人塗掉，一邊嚴厲查問，要抓着開除。這些意神父還時常和我們老百姓講：「你們抗戰太早了一點，現在不會打勝



了！』可憐有些老百姓竟誤中了他們的毒素！

原來，這些意神父是敵人的間諜，是借敵人的手來殺我同胞的劊子手！他們和××一個大漢奸有着密切關係，那大漢奸曾來過老河口一次。他們利用手下兩個傭人，一個叫張子固，一個叫李清榮，一次二次三次的到我們飛機場去，探聽中國空軍的情形。他們時常叫張李兩個漢奸送信到石花街天主堂去，一路上打聽我軍隊的情形，軍火軍米儲藏的地方。他們對高射砲的調查也很清楚。他們還放信號，那種將官放紅的信號，那種將官放綠的信號。（這些都有張李兩漢奸的供詞證明。）

起先，關於這裏漢奸活動，本戰區司令長官部方面已偵查出綫索，特別派黃高級參謀來辦理。黃參謀首先就逮捕張子固等三人，嚴加訊問。經過誘導之後，這些漢奸經良心的責備，才如實供出來。黃參謀當即會同警察局，出人不備，在天還未明，突然宣佈全城戒嚴，派員搜查天主堂。搜查的時候，意神父表示很鎮靜。警察把每個房間都搜查過，當查出無護照手槍一把，子彈五盒，和收音機一架，以及許多無綫電重要零件。最後，在毛廁旁邊，從地下掘出一架無綫電發報機。兩個間諜神父完全變色了。發報機還用布包着，完整地埋在下面。

證件找到了。消息傳出去了，民衆激憤得流下淚來。他們的房屋被炸燬了，骨肉被炸死了，他們知道都是這些意間諜作的祟！他們在這裏有田地、房屋、生命、財產，還有祖宗的墳墓，現在戰綫還沒逼近，却有意大利間諜神父作幫兇，使我們同胞不能安居樂業，怎麼不痛恨疾惡呢？

十二月十日的前夜，在全城的牆壁上，每個角落裏，民衆們都自動的貼上鐘除漢奸的標語。全城的民衆都蹬腳捶胸。似乎不打死這些間諜漢奸們，心頭總會那麼難過。第二天中午的時候，中山公園已擠滿了人。大家等不及會議，五千人的拳頭高舉起，表示出一個意見：『到天主堂去趕走間諜神父！』數千人衝上到天主堂去的街路了，男的，女的，老的，



小的一塊兒擠過去。有些店員和工人拿着竹竿木棍準備去打個痛快，千萬人的聲音一齊叫：

『把天主堂間諜神父趕出去！』

『打倒做日本軍閥走狗的意神父！』

『殺絕漢奸！』

到天主堂的前面，我們的軍隊警察已嚴密佈置着，民衆們憑着熱血，衝了幾次，幾次給軍隊和警察攔住。民衆們狂叫：不達目的誓不甘休！一定要把假仁假義殺人不見血的無恥神父趕走！民衆們叫啞了喉嚨，還是在叫；他們立在西北風裏，忘記了冷，忘記了凍。最後，大家決定開大會。就在人羣裏面，七個代表站起來了。民衆向他們提議，許多人的意見還是兩個意見：

『把天主堂的一切財產交中國籍神父管理！』

『限二十四小時內要間諜神父滾出中國去！』

代表到裏面去了，他們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商店老板，他們憤怒到極點，堅決的向間諜神父提出民衆的要求。神父們沉默了。半晌，遞給代表們一張紙條：

『逕啓者：本教堂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經老河口警察局依法檢查，當查獲手槍一支，子彈五盒，無線電收音機及無線電收發報機各一架，並其他無線電各種重要零件，實行間諜行爲，均屬事實，願於一星期內離開中國，所有本教區內財產，所辦醫院孤兒院學校等一切事業，統交中國籍神父管理，均受中國政府及當地民衆團體指導，敬請 貴代表團轉達貴國民衆。此致』

老河口民衆代表團

老河口教區主教（簽字）



間諜神父們全部答應了民衆的要求，不過他們出境的期限改爲一星期。民衆勝利了！他們用自己的力量達到了他們偉大的目的！爲着使這件事澈底完成，在第二天中午，民衆們又集合起來，拖着長長的隊伍，前面打着旗子：「老河口民衆鋤奸示威大遊行。」他們向警察局請願，向當地駐軍請願，要求監督間諜神父出境，並嚴辦被捕漢奸。

我們相信政府是能够遵照民衆的意志的，除在七天內限間諜神父離開中國外，其餘被捕的漢奸，也要按輕重處罪。

現在政府已將事實真相通電全國同胞了。這事件的意義純粹是反漢奸，反幫助日寇的間諜。我們不反對宗教，更不反對意國人民。誰幫助敵人，我們就反對誰！

全國老百姓團結起來肅清一切間諜漢奸，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爲爭取最後勝利而戰鬥！

（一九三八，十二月二十二夜）

## 專稿二

在鄂北的十三縣，幾乎到處都能看到天主教堂尖尖的樓房高出雲端的豎立在短小的茅房羣裏，在光化縣的老河口鎮豎立着的天主堂更是美麗宏大。老河口本是鄂北的咽喉，商務繁盛，交通要道；雖然祇是小小的一個鎮市，却有十五萬人口，更有番茶館兩家，外國人在老河口這小鎮市的影響可見一般。

老河口的天主堂有兩個意大利神甫：一個是費樂理（H. Forroni）一個是底裏諾（G. Denino）費樂理是主教，四十六歲，來中國已經有十六年了；底裏諾是當家神父，五十五歲，來中國已經有二十九年了。他們都說着滿口熟



練的中國話。這兩個神甫和其他的意大利神甫一樣，除了掌管教堂之外，還設有學校醫院。費樂理和底裏諾除了在老河口天主堂設立化美小學，宏慈醫院和孤兒院之外，平素用高利貸的方法剝削老百姓的血汗。

自從我國抗戰以來，費樂理和底裏諾就開始向我國的民衆和化美學校的學生作各式各樣不利於抗戰的宣傳，並且規定不准祈禱中國抗戰勝利；老百姓正在不滿意，正在懷疑意大利神甫的舉動行爲，却看到費樂理和底裏諾熱心的爲傷兵看護，真弄不清這兩個意大利神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根據第×戰區司令部的文化工作者，政工人員，偵查隊的嚴密偵緝，才確實曉得原來費樂理和底裏諾假藉傳教看護的美名，暗中破壞中國的抗戰；向兒童宣傳不利於抗戰的言論，向老百姓散佈謠言，更毒狠的是向傷兵刺探我軍情。

原來，在鄭州破獲漢奸的案件中，就曉得老河口教堂同鄭州漢奸機關有密切來往。這次第×戰區司令長官部，根據各方面的報告，用迅速的手腕在十一月二十四日逮捕了這兩位意大利神甫用的庶務李清榮和外交張子固。二十五日逮捕了意大利神甫貸給二千塊錢開吉星照像館的館主靳吉甫。靳吉甫供出是因爲漢奸嫌疑由鄖陽逃到老河口的。張子固李清榮更明白的指出老河口天主堂是國際間諜機關，兩個意大利神甫指使他們刺探軍情；曾受底裏諾神甫的指使到飛機場、石花街和沿公路各地帶調查飛機的停落，汽油庫的所在地，要人的往來，駐軍和過境軍隊的番號。李清榮更供稱：「收音機是有的，在神父房間，看見神父直帶着耳機子，手中接着一個東西，有很小吱吱的聲音，他時常用，我給他在東亞電料行還買過三次電呢！」

依據着這供詞在十一月二十八號老河口警察局在清晨五時到天主堂嚴加搜查。在底裏諾神甫的房裏搜出盒子槍一枝，子彈五盒，無線電機零件一大箱；更在廁所旁及糞缸裏搜出收報機發報機各一具。費樂理和底裏諾最初還



在狡辯終於因爲人證物證都在，於是供認有間諜行爲，更承認鄂北的漢奸全是他們所調遣的，幾次在老河口敵機的轟炸，也曾指示過目標。當局於是監視了費樂理和底裏諾，並且令老河口教區內所屬各個教室裏的中外神父限一星期內集中老河口待命。

老河口的民衆聽到這消息之後，沒有不憤恨這假借慈善救世爲名，暗中做國際間諜的意大利的神甫的。同時當地的文化站，文化隊，又在廣泛的宣傳，深入地講說，於是在十二月十日在老河口中山公園民衆舉行了示威大會，擴大肅清漢奸消滅間諜運動。參加的老百姓有四五萬人，經過天主堂示威之後，男的女的少的擁滿了中山公園。大會決定請求政府機關嚴懲間諜漢奸之外，更決定派代表質問意大利神甫。在數萬激昂的羣衆監視之下，費樂理和底裏諾親筆簽名具函給民衆代表團，承認間諜行爲，並願意在一星期內離開中國。

幾萬顆心沸騰着，幾萬個面孔笑了。他們不會用槍，不會用刀，不會用飛機和大砲；用的是羣衆的力量消滅了漢奸驅逐了間諜。每個人心裏印上了兩個醜惡的意大利傳道者的面孔，每個人怒吼着「老百姓勝利萬歲！」「肅清間諜漢奸萬歲！」在會場的角落上一個提着手杖的老者在說：「今天老百姓可出了一口氣！」

## 文藝的通俗化問題

梓年

中國的通俗化文藝運動，由於抗戰的要求與作家的努力，在一年多以來，不可否認的已有了許多成績，得到了許多進步，這個進步，和其他部門的進步一樣，在速度與程度上，還未趕得上客觀形勢即抗戰形勢的進展，還未能滿足客



觀方面的要求即人民大眾的要求。爲了要使這個運動更開展，更深入，更猛進，前兩日在渝的許多熱心從事通俗文藝運動的朋友們開了一次座談會，來檢討過去的工作，找尋更好的方法。在這裏，願貢獻個人的一得之見，以供朋友們參考。

所謂通俗化，無非是說要使作品容易爲讀者——廣大的人民大眾所了解，所接受。這就是說，要使你所說的所寫的，是人民大眾心坎上的話。在這裏起決定作用的是什麼呢？內容，還是形式？我想我們的答覆應當是：第一是內容，第二是形式。還有一點，內容比較不通俗而形式比較通俗的作品，比到內容比較通俗而形式比較不通俗的作品，在通俗化運動上所形成的缺點要更大些。這我想是無需多說，大家都可以從各人的實際經驗中找出許多實際印證的。

如果根據了這兩點來檢查我們過去的通俗化文藝運動，我們應當說些什麼呢？我想我們應當說，第一是，內容方面的問題，第二是形式方面的問題。

個人覺得內容方面我們還應當努力的有兩點：第一，要使文藝向更多的方面去發展。過去我們的作品，是描寫敵人的殘暴，戰區人民的慘痛，前方戰士的英勇，救亡工作者的奮鬥等等。這當然是很好的。但我們可不可以再從國際人民大眾對我們的援華運動，尤其抵制日貨運動與拒絕裝卸日貨的鬥爭來取材來描寫呢？可不可以再從敵國人民大眾反戰鬥爭及敵人前綫的困難，如士兵的厭戰反戰，運輸接濟的困難等等來取材來描寫呢？不但可以而且還應當這樣做。這可以使讀者從整個國際形勢來了解中國抗戰的意義，從我國的多助與敵人基本力量的薄弱來了解我們抗戰有勝利的前途，以堅定其對抗戰必勝的信心。這是第一點。

第二，要使作品的內容更接近於讀者——廣泛的人民大眾的切身利益。過去作品的內容原已都是抗戰的現實的反映，一般的說，已是切近於全國人民的利害了。但我們可不可以再從各地不同的特殊生活條件上來取材來描寫，



以激發抗戰的迫切要求呢？如農產物的賣不出去，日常用品的價格騰貴，工農生產事業的破壞等等，可不可以取作文藝作品的題材呢？可不可以從難民的顛沛流離中來取材描寫，以指出我們的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去和敵人抗戰呢？但可以，而且還應當這樣做。這可以使人民大眾所感到的敵愾同仇，不只是出於義憤，而且還是爲了自己的生存，這可以使所激發起的抗戰力量更爲堅實與強韌。

這是關於內容方面的問題。

講到形式方面的問題，要比較複雜些。首先我們要說，文藝通俗化的必須要在形式上容易爲廣大人民大眾所了解接受，這一命題，決不應從單方面去了解成爲「爲人民大眾所高興所歡喜。」自然，你所用的形式如果真的是讀者易於了解與接受那自然就可以使他高興與歡喜。用是否能獲得讀者歡心做個尺度來測量作品形式方面的是否通俗化，當然是可以的。但這只是一面。我們所要求的是讀者的了解與接受，使他高興與歡喜，只是使他易於了解與接受的一個條件，而不是一「止於此」的目的。這是我們談文藝通俗化的形式問題時的基本出發點，要時刻抓緊，不容模糊。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曲調上，體裁上，詞句上，來講求使讀者愛唱愛讀自己的作品，主要的還要注意到這種曲詞，體裁，詞句，在文藝運動上講是否要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形式上通俗化的够不够，不在於民間所流行的各種形式是否通通都已用到，而是在於表現的方法是否已經儘可能地運用了爲人民大眾所習用的各種形式；是否已經有了足够的形式——舊有的或新創的——來表現各種形態與活動。這是說，民間所流行的各種曲調，體裁，詞句，並不是完全都可以用，很有些不應當用的與不適用的，我們要把它們摒棄。同時，很有一些外來的曲調，體裁，詞句，可以補充當地原有表現法上的不足，不致有不易了解的障礙，我們就應當儘量採用。而且還不妨將根據中國舊小說中有權威的著作以及好的譯本，創造出新的形式來。形式方面的



通俗化運動，一方面是要依靠舊形式來使作品易於了解，同時也要在運動的過程中使形式更豐富起來，語言曲調的素質更提高起來。『舊瓶裝新酒』並不是任何舊瓶都可以裝新酒的，很有一些舊瓶是太醜陋，太破爛，新酒裝了進去就要敗壞的，因此，

第三、在研究如何儘量應用舊形式的時候，仍就離不開『內容決定形式』這個原則。這是因為，一方面，通俗化運動，主要是要力求內容的切近於人民大眾的生活，力求能够提高大眾的意識，激發他們高度的熱情，因此，在採用一種舊形式時，就要注意到是否有『削足適履』使內容受到損傷以至變質的弊病。另一方面，一種舊形式的採用，不一定就是肯定它為一種很好的文藝形式，而只是因為用它來表現最易使讀者了解。這就是說，當我們決定採用某一舊形式時，是要看它是否最合適於所要表現的內容。

第四、我們却不因此就反對某些已經不適於現代文藝的舊形式，牠們在抗戰時候通俗化運動中的努力。例如各種舊戲，總是很少有人能够肯定它可以發展成為新文藝，但我們却不能否認它在抗戰時期已經盡了不少的力量，因此，我們對於各種舊戲在通俗文藝運動中努力，是非常歡迎的。

這是形式方面的問題。

最後，我們要講一講文藝通俗化運動的一個根本問題。文藝通俗化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支生力軍。所謂文化，就是人們對於自己生活的覺醒，對於自己生活清楚地，正確地意識到它的意義，對於自己生活有計劃地作出各種努力。而文化運動，就是來提醒大家對於自己生活的意識，激勵大家對自己生活做各種努力。艱苦的生活好像一道圍牆，把大家困住了；人們終年偏促於生活的營謀，看不到自己生活遠景。文化運動，就是要這堵生活的圍牆上開許多窗，使大家透透空氣，使大家看到了和自己生活外面的關係，和整個世界的關係，使大家看到有些什麼出路可以從圍牆



內打開出去，因此，文藝通俗化運動須要使作品內容切近讀者的生活，須要直接從廣大人民生活中來採取材料，其任務，並不止於要來描寫實際生活，而是要在生活描寫中，顯現出這種生活在整個世界中的意義，顯現出這種生活有沒有什麼出路，有些什麼出路，要材料，怎樣才能走上這些出路。換句話說，實際生活，只是一種作者要用它來解釋一個新的東西，來點醒大家，恍然於一種過去還未明白的道理，這樣來鼓起大家向前努力的勇氣與決心。

因此，我們認為，在文藝通俗化運動中，不只形式要有不斷的改進，就是內容，也要有不斷的改進；文藝運動，不只在形式方面是一種揚棄的過程，在內容方面，也同樣是一種揚棄過程。

同時，我們可以說明，我們在前面說「內容決定形式」並不是否認文藝運動本身的是在對形式的研究，而只是說，在形式的研究上，始終脫離不了「到底是那一種形式是適合於表現所要表現的那個內容的形式」這個問題。所以在這裏，不是降低了形式的主要性，恰恰相反，正是把它的主要性提高到它應有的程度。

十二月十七日



# 論自由

一夫

## 一 什麼是自由

『不自由，毋寧死』是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爭取自由的普遍的口號。美國獨立宣言中的民主政治三大原則，第一條就主張『人民有不可侵犯的生命，自由，求幸福等權。』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也宣稱『人生而自由，人權應當平等，』並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為『法國自由元年。』而臨時代表大會宣言也鄭重指出『惟抗戰乃能解除壓迫，惟抗戰獲得勝利，乃能組織自由統一的即各民族自由的中華民國。』足見自由問題在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都非常重要，我們不能不提出來專門討論。

但是自由的概念，是錯綜複雜的，往往有人為着自私自利的勾當，而加上冠冕堂皇的自由的名詞，來淆亂聽衆，譬如中國為民族自由而抗戰，而日寇反而宣言這次侵略戰爭，是解除中國人的壓迫，與建設東亞自由和平『新秩序』的『聖戰。』有些人以卑鄙邪惡的個人主義為自由主義，有些人以為一切政府，一切權威，都是免不了的禍害，所以一定要儘量限制它拘束它。還有人以為自由是無限制的，任何社會的唯一任務，就是努力增進無限止的自由。甚至輿論界對於通敵求降的汪精衛，發了嚴正的批評以後，上海某英文報的社論，還說按民主自由的原則，各人有自由發表政



治主張的權利，攻擊他，制裁他，是違背民主自由的原則的。以上這種意見，不是別有用意，就未免曲解自由了。

自由之所以往往被曲解，就因為這本身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大家可以用觀念論做出發點，憑空討論，說得好像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來有意無意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我們要瞭解自由問題，非從社會上具體的環境中去研究不可。

個人思想與行動的自由，與他的社會的經濟政治結構，有很密切的聯系。人們在某種經濟政治的關係中，就有某方面與某種程度的自由。離開了社會的實際環境，就不能講懸空的自由。譬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由，與財產制度是分不開的。所有的生產工具，包括生產輿論的工具如報紙，無線電與電影，以及教育制度，全為資本家所控制，而思想的自由發表，又非通過這種工具不可。勞動大眾，不能自由運用這種發表的工具，而說還有言論自由權，未免是自欺欺人之辭。因為在龐大的社會裏，沒有這種發表的工具，個人的言論，不能使別人聽到的。

在勞苦大眾的生活方面說，他們除了勞動力以外，便一無所有，他們必須為資本家工作，而且任意被剝削，工作的時間與報酬，以及工作的環境，全由資本家決定的，而且因為有許多失業的工人們在廠外等着要求工作，逼得他們不得不聽從資本家的條件而努力工作，以求維持職業。所得的進款尚不能溫飽，那裏還有金錢與時間，去自由享受教育與娛樂。一有經濟危機就要受到減工資與失業的威脅。這種生活，與資本家的任意揮霍，到處享樂的情形，誰有自由，誰沒有自由，是不言而喻的。

因為經濟的限制，在其他生活方面的自由，也隨着受影響。譬如從前中國富翁，可以有三妻四妾，窮人就無錢結婚，現在在法律上雖然不准納妾，但可用離婚再娶的方式來補償。在美國因為離婚手續費太貴，使普通勞苦大眾，無錢正式離婚，於是『遺棄』變成美國窮人離婚的唯一辦法了。至於女子因為沒有經濟地位，大多數不得不以結婚為職業，終身依靠丈夫，在廚房裏做一世的奴隸，很少有離婚的自由。中國以前女子不獨不能要求離婚，而且夫死不能再嫁，要



守着『從一而終』的美德的。

在法律上窮人的訴訟，因為無錢請律師辯護，只好任人支配，而富人則可請許多大律師為他設法避免法律上的責任。窮人往往為生計所迫，不得不挺身走險，犯法入獄，而有權有錢的人，決不會做小偷的，他們犯的是賄賂與搜刮的大罪惡，但因為地位關係，法律不能制裁他們，所以蕭伯納說：『小偷得進監獄，大盜却入國會。』這和中國所謂『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一樣是精闢之語。

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因為生產工具是公有的，取銷了人對人的剝削制度，人們不能再靠着財產來施行特權，而自由的範圍也隨着變更。勞動大眾都可以享受各種自由，他們有合理化的進款，有餘暇的時間來受教育及其他文化的享樂，他們不獨有言論自由，而且可以自由運用無線電台，印刷所，電影，使他們的意見可以傳達到全國。生病了，國家有醫生免費醫治，老了有養老金，不論那種工人，每年都有假期，可以自由旅行與休息。中國人的『積穀防饑，養子防老』的名言，他們覺得毫無意義了。儲蓄對於歐美與中國人是美德，因為這可使他有備無患，以防不測，但在蘇聯，變成小資產階級的惡習了。因為只有在蘇聯，各人可以今天有錢今天自由享受，所有個人的『不測』與『患難』都有國家代他們擔當着，自己不必顧慮。女子們大多已脫離了廚房的奴隸生活，出來參加生產，參加國事，處處與男子絕對平等。因為生育與生理上的不便，國家又給以特別保護，使她們在工作方面，享樂方面，沒有一處不與男子一樣自由。德國作家雷翁·傅克脫惠格（Lion Feuchtwanger）說：『這種對於自由的概念，現在已變成蘇聯公民的一種真理。那種存在在一般所謂民主國家裏的，能夠對於政府提出些無關緊要的抗議的自由，雖然也許好的，但在蘇聯的人民看來，無疑的，沒有了失業，沒有了老年時代的貧苦，以及沒有了對於未來子女担心的自由，是更來得好些。』（註一）在蘇聯社會

（註一）雷翁傅克脫惠格著，吳大琨譯，莫斯科記，生活書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出版，四八—四九頁。



的人民，所以有更大的自由，就因為他們有社會主義的基礎。所以斯大林特別指出『只有等到剝削的制度消滅掉，沒有了人壓迫人的存在，沒有失業與貧窮，每人不致有失掉工作，家庭與食物的恐慌，到了那種境地，才有真正的自由。』

(註二)

由上面的討論，我們知道自由的概念是相對的，不是絕對，因為自由的程度是隨着環境改變的。同時，在某一種環境中，對於某種行動，以為是自由了，而同樣的行動，在另一環境裏，便覺得是自由的障礙。譬如在中國，自己有牛的農民，比起沒有牛的農民，在生產方面自由得多了，而且收穫可以增加，在生活方面是一個很大的保障。就是在蘇聯集體農莊開始的時候，也以『將來每人可以自己有一頭牛』來表示集體農莊生活的富裕，號召農民加入。但到現在情形不同了，作者在一九三五年親自看到有的集體農莊的農民，不要牛了，他們的理由是『自己養牛太麻煩，太不自由。』他們說：『以前因為我們生活沒有保障，自養着牛，在耕種方面，與牛乳的供給，就有很大的幫助，現在集體農莊的出產，已很富裕，我們的生活已有保障，我們做工以後，要洗了手到集體農莊的圖書館，公園或體育場去享受文化生活了，誰願意回家以後，再去費工夫侍候牛呢？』同時集體農場中有養牛的專家，比我們自己養得高明多了，所以我們將國家給我們的牛，全交給農場養了，自己可以自由些。』

## 二 個人的自由從集體中獲得的

有的人以為集體生活，是消滅個人自由的，因為要有自由行動，所以不得不離開集體生活。但是實際上正是相反。

(註二) 斯大林與外國新聞記者 Mr. Roy Howard 談話，引自 John Strache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Radom House, N.Y., 1936 p. 210



在集體生活中，個人才能得到自由，離開了集體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因為我們的意見與行動要通過了別人才能有美滿的迅速的實現，不然就沒法表現了。拿漂流在孤島的魯濱遜來說罷，他的自由，是受着極大的限制的，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因為每日的生活問題，逼他非自己種地自己做一切為個人生活上所必需的工作不可，雖然他是文明水準很高的社會裏來的，但他的工作的成績，與野蠻的土人，沒有多少分別。因為『衆擎易舉，』『獨木難支大廈，』獨自要做各方面的的工作，決不能實現他所理想的成績。

倘若社會上有許多人，各人都不願別人而自己自由行動，結果必互相牽制着，阻礙着，抵銷着，弄得一事無成。只有將個人的意見，個人的行動，寓在集體的合作社生活中，才能更自由地表現着，更容易達到目的。因為在有組織的集體中，各人可以依類別人，共同協助着，來努力他們所要實行的公共計劃，比個人施行起來，要容易得多。譬如工人們受資本家剝削，起來要求改善生活，他們雖各有要求的自由，但倘若各人個別要求，資本家即可個別處置以開除相恐嚇，使各個人不得不唯資本家之命是聽，倘若有人再要抗議，則無疑地是被開除了事。而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希望，就是可以『分而治之。』但是集體要求，就有極大的力量，有罷工的武器而各人的個別要求，在集體行動中，就可更自由地達到目的。

又如農民的生產，自耕農在一小塊土地上，不管如何努力工作，因為他不能用機器，請不起專家指導，對於生產有各種限制，決不能自由達到很高的目的。但是蘇聯的集體農莊，是將許多自耕農組織起來，共同合作生產，有機器代替人工，有專家指導改良，不獨生產量遠超過自耕農的成績，不獨物產品質較以前優良，而農民本身因為分工合作，可以各有專門，不多幾年，自己變成了蓄牧，種子，土壤等等專門家了。因為他們有機會可以做各種試驗來改進生產，可以學習解決農業上各種問題，同時農村生活也慢慢地達到城市生活的水準，他們不獨有公園，學校，圖書館，無線電，報紙，並



且有許多以前不識字的男女農民，現在能到莫斯科參加各種全國會議與國家事務。這種機會，以前連夢想也不敢夢想的，而現在都已見諸實行了。機會的增加，也就是自由範圍的擴大。

舊的自由觀念，僅在於解除限制，而現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給人民的自由，不獨是限制的解除，而且是新機會的創造。因為蘇聯沒有了階級的分別，更沒有資本家互相勾心鬥角的競爭，國內全體民衆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大集體，而人民在這大集體的生活，就有許多以前意料不到的機會與自由。例如一個在蘇聯工作多年的美國工程師對人家說：『以前我在美國不過是一個汽車工廠的工程師，那時候的工作範圍，只限於一廠的活動，現在我在蘇聯，所有的改良方案已被全國各汽車工廠採用，而我被派為全國汽車工廠的顧問了。這種自由在別國是斷乎得不到的。』其實在蘇聯，不管是誰，只要工作最優秀，就有做全國顧問的機會，有一個鄉下擠牛奶的女孩子，忽然一舉成名，受到國家榮譽獎章，因為她擠牛奶最成功，她的方法立刻通行到全國，而全國各地都去信請教她。斯泰哈諾夫的運動，也就是其中更為顯著的例子。所以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接見的時候說：『我們建設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以便使各人的個性能真正自由，我們建設它，為的是真正的個人自由。』(註三)

人民所以擁護國家，因為國家是現在人類最大的集體，它能給國民一切所需要的機會與自由，否則人民即要起來革命，從新組織合乎人民需要的國家。倘若國家被人侵略而失却自由，國民除了做亡國奴外，根本就談不到什麼是自由，一切受人限制，正如『覆巢之下無完卵』，誰都不能逃出這亡國不自由的範圍。至於漢奸們做到登峯超極的大傀儡，誰都知道不過是一個奴隸總管，處處奴顏婢膝，仰人鼻息，他們的地位，以執行主子的意志週到與否而決定，他們不獨出賣民族，同時也整個兒出賣自己。倘若民族被壓迫被滅亡，而人民還能有同樣的自由，誰都不會犧牲了一切去



抵抗了。正因為先有民族的自由，然後才能有個人的自由，所以才大家要齊心合力去奮鬥，像臨時代表大會宣言指出說，『今日致力於抗戰乃為他日享有自由之左券也。』

而中國在抗戰中所以能發揮偉大的力量，其重要特點也。在乎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個偉大的集體。人民在大集體中，更能發揮抗戰的自由，不像阿比西尼亞受意大利壓迫後，無法繼續抵抗，因為大國人衆地廣，資源豐富，人民聯合以後力量的偉大與持久，不是小國所能辦得到的。日本帝國主義，在過去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使中國停留在『一整散沙』的狀態中，使中國分為幾個小部分，可以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因為國家分裂，人民就不能聯合在一起去自由發揮抵抗的力量了。即使抵抗，也變成幾個阿比西尼亞而相繼被併吞罷了。

但是個人在集體中的自由，不是沒有限制的，因為在集體生活中，應當顧到全體的利益，大家互相配合着，才能共同團結合作。英國名作家韋勃夫婦指出：

『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只有一部分的機會，開放給集體中的人們。無論何人倘若他越出了他自己分內應得的機會以外，不獨搶奪了別人應當享受的一部分的機會，並且發生了不平等，而顯然要減少在團體中各個人的總自由。倘若社會團體，使英國輪船公司的主人與其家族，有一個旅行於瑞士與意國的長而糜費的假期，而幾百個碼頭上卸貨的工人們與他們的家屬，所得到的只有強逼的失業的無工資的假期，這樣不獨損害了後者，而且減少了集體的自由，聽說列寧有一次曾經注意到而談諧地說：『是的，自由是寶貴的，因為如此寶貴，所以一定要有限制。』』（註四）

集體倘若不將機會在各個人方面平均分配，便要發生矛盾，而團結就因之發生問題。團體中磨擦衝突，鬥爭等最



主要的原因，就在這機會與自由的分配問題。但在和諧的集體中，各個人仍不能完全自由，仍要以大局為前題，限制着各個人的行動，使他不出本分的範圍。各個人所以能遵守自由的限制，不是因為各個人願意在集體中犧牲自由，乃是因為他知道倘若他尊重集體的意志而犧牲一部分的自由，在另一方面，集體可以給他更大的自由的保障，所以才肯犧牲。譬如，在抗戰階段上，各階層各團體的人們為着整個民族的利益，不得限制一點自己的部分的利益，來服從抗戰，因為抗戰成功了，它們就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而且有獨立自由的國家給它們保障。這種為集體而限制個人一部分的自由，好像人們拿出一部分進款，付保險費一樣，目前雖然犧牲了一部分的進款，但日後的生活，更有保障了。

為使集體團結而相當限制各個人的自由，不得不用集體的紀律去規定各個人的自由範圍，去制裁越出範圍的個人。紀律越嚴明，集體越能團結，各個人在集體生活中的機會與自由，也越有保障。倘若個人不服從集體，少數不服從多數，全體不服從幹部的領導，則組織必趨鬆懈，集體生活便無法進行了。集體生活，好像一個音樂合奏，需要各種不同的樂器配合着，再加上領袖的領導，方能合奏和諧的曲子。每一個不同的曲子，便需要各種樂器來不同的安排；韻律的改變，需要全套樂器的和諧的集體的配合。因為要保守和諧與一致，所以不得不將不適應的聲調除去，否則就不成曲子了。集體的紀律，就是要除掉這不合拍的聲調。

至於幹部領導的失策，或者對於個人的自由，有許多不必要的干涉，唯一補救的方法，就是民主。所謂民主，並不是每一件事，都得全體討論全體表決了才能執行。特別是國家大事，決不能如此辦法。最要緊的是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來決定國家整個為人民謀福利的綱領，或者由政府來制就綱領而得到民衆的同意，則政府就不是與民衆對立的團體，它是執行民衆意志的幹部，是為民衆服務的領導機構。它的一切行動，只要本着綱領的路線，就是集體一致要求的路線。等到社會產生了新的情形，然後再決定新的路線。這樣不斷地努力為羣衆謀幸福，可以使羣衆了解只有集體



的行動，可以使各個人得到幸福，而鐵的紀律，決不是爲着幹部的利益，也決不是爲着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爲着集體的利益，而執行的。紀律越嚴明，同時生活制度越民主化，則各個人在集體中，越能發展積極性，越能團結在幹部領導之下，發揮集體的力量，去執行集體的意志。

紀律與民主決不是對立的，而且反是相成的，越民主化越可有紀律。沒有民主而有紀律，不是集體的紀律。民衆不肯爲這種紀律奴役的，結果只有反抗與分化。倘若是民主的紀律，那便是集體自己的意志，越可制裁個人，越可團結。因爲制裁少數違反集體意志的人，就是對於全體民衆的自由保障。

當民族在危急存亡的關頭，越需要團結着去發揮集體力量的時候，越要求集體的鐵的紀律。在抗戰期間，任何國民絕對不能違反戰時國策之決定而公開自作主張，因爲這種違反國策的公開主張，不獨表示他個人的叛變，而且是分化集體的抗戰力量，危害着整個民族的生命自由。國家理應迅速地給以嚴厲的制裁，而制裁的結果，反過來又可加強民族團結。倘若汪精衛在決定國策時候，提出和平的意見與理由，要求大家討論，這是可以的，而且大家當給以相當考慮，研究他的主張對民族是否有利，這是民主的步驟。但是抗戰國策早已決定，而又得到全國人民一致熱烈的擁護，並且大家正犧牲一切而支持着這持久戰，在這時候，誰都沒有權利在作反集體的主張，更不應以公開方式來號召，何況又是身居黨政要務的領袖，更何況是通敵求降的漢奸主張。爲鞏固集體利益計，只有用鐵的紀律，來消滅破壞集體的分子，來保證集體的自由。

### 三 自由是奮鬥得來的

一個民族的自由，或一個人的自由，都是自己奮鬥得來的，不是別人賜與的。歷史上每一個民族每一個階級，在得



到它的自由以前，都經過一番激烈的奮鬥。在法西斯蒂帝國主義集團侵略弱小民族的現階段上，為民族自由而奮鬥，是具有特殊意義與使命的。我們知道全地球上二十萬萬人口中就有十二萬萬人（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六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附屬國的被壓迫民族；而帝國主義的宗主國人口却只有三萬萬四十三萬人（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十七），這就是說，在宗主國壓迫民族內，平均每一個人就有四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內的奴隸。同時世界上法西斯半法西斯及其他專權的國家，有三萬萬一千三百萬人（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十五·四）（註五）在法西斯集體中，有日德意為軸心，皆以戰爭侵略為手段，並且這軸心又日漸擴大，侵略又日益瘋狂。我們的民族抗戰，不獨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而戰爭，同時也為削弱法西斯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增加全世界反戰反法西斯運動的力量，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同時也是協助日本被軍事法西斯控制下的民衆，為他們爭取自由。這種抗戰是革命的，正義的，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一戰爭失敗，則不獨我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失却自由，同時加強了法西斯的氣餒，對於其他民主國家與被壓迫民族，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因為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與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與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是分不開的。

對於中華民族本身，只有這次抗戰勝利，才能把中國半獨立的國家變為獨立自由的國家；把被壓迫的民族，變為獨立的自由的民族。所以臨時代表大會宣言指出：『抗戰之目的在求民族之生存獨立，必須民族爭回生存獨立，然後此民族所立之國家始有和平之望。』所謂獨立，平等，自由，都是分不開的。而爭取的方法，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努力團結一致和奮鬥。

（註五）參 Rado, Atlas of Today and Tomorrow, London, 1938p. 196及徐懋庸何幹之等著，社會科學基礎教程，



但是奮鬥是要求犧牲的，只有全體人民團結起來，願意犧牲一切，去爭取民族自由，最後勝利才是我們的。十九世紀中頁爲意大利爭取民族自由的領袖瑪志尼說：

『人人從全體的福利裏追求他自己的福利，認全體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並且其餘的人也同樣情願爲這一個人犧牲他們自己的利益，人人總是情願爲這個公共家庭的全體犧牲他自己，並且其餘的人也同樣情願爲這一個人犧牲他們自己。到了這個時候，現在壓迫人類的那些禍害，大多數都消滅了，像天邊的濃烟到太陽出來就消滅了一樣。』（註六）但是這種自動的犧牲，與被動的奴隸式的犧牲，完全不同。後者是無報酬地被剝削，而且沒有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而前者是自己願意參加的，有自由意志的，而且各人參加犧牲的時候，已預先看到犧牲的結果——民族的獨立平等與自由。他不是以犧牲爲目的，他是以犧牲爲爭取民族自由的應有的義務，他與民族抗戰勝利，民族自由解放，打成一片，他是自動地自由地參加的。他不以此爲不可避免的必要條件，他是歡迎這種可能性當作他的願望。同時也只有他與集體打成一片的時候，才能有這種忠勇的奮鬥，才能使他的犧牲，成爲集體與個人的無上的光榮，神聖的任務。

自由是非常寶貴的，只有光明的正大奮鬥，才能爭取得到，用妥協的方式去求自由，其結果只有斷送自由。我們知道捷克的自由，是怎樣被英法用妥協的方式斷送掉的，使德國法西斯蒂兵不血刃，而併吞大塊領土，並且使捷克全國，不得受它的控制。還有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工會領袖們，在法西斯蒂奪取政權的時候，只圖與法西斯妥協，不爲德國勞動大眾的自由而奮鬥。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們在國會中演說，極力擁護法西斯政權。因爲第二國際反對德國法西斯的殘暴，他們提出抗議，並且退出第二國際，以表示對法西斯的忠誠。到五月一日勞動節的時候，他們努力領導工人們參加，但是工人們已拒絕了他們的領導，而法西斯蒂發現他們已經不能在工人方面起作用，即不再利用



他們了，五月二日他們就被捕下獄，而法西斯工運負責者宣布說，他們『或許自認忠於希特勒，但是他們還是在監獄裏比較好一點。』他們或許自己也想不到這樣委屈求全，與法西斯政府妥協的結果，不獨出賣了勞動大眾的自由，而且也斷送了自己的自由。（註七）

爭取自由，雖不能妥協，但也不能好高務遠，不切實際。最顯著的是有些青年，被托派的階級高於一切『左』的論調所迷惑，以為這是最徹底的為無產階級爭取自由的信條，而不瞭解被日本壓迫的大集體，是整個民族，不瞭解無產階級的領袖列寧的指示，他說：『被壓迫民族底每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反對壓迫的，那普通民主主義的內容；正是這一個內容，我們（無產階級）無條件地贊成。』（註八）這些青年在現階段上，民族解放的階段上，仍標榜着階級利益，階級自由高於一切，他們既要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又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結果，便分化了民族大集體的陣線，被敵人所利用，有意無意地執行了漢奸的任務，出賣了民族自由與階級自由。

所以用妥協與急進的方式，爭取自由，結果反而失却自由。最大的原因，在乎對於現實沒有準確的瞭解。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沒有準確理論的行動，就是盲動。所謂準確的理論，就是對具體現實各種關係的準確的瞭解。我們用自然科學，瞭解了自然界，就可不受自然界的控制，就可按着自然界的規律來運用它。例如原始人對於閃電是驚懼的，而我們瞭解了電的規律與作用，就可自由運動，為我們服務了。一個醫生或一個工程師的一切行動與思維的自由程度，是根據他對於問題瞭解的程度而定的。對於社會也是如此，唯其能準確瞭解現實的社會

（註七）參 R. P. Dutt, *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Martin Lawrence, London, 1935 p. 129;

and John Strachey, *What are we to do*, Victor Gollancz, London, 1938 pp. 177-8

（註八）列寧，*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三七〇頁。



變遷的狀況，才可得到準確的社會變遷的法則，可以預先料到各種變遷的結果，可以估量如何利用優勢，如何免除劣勢，來達到所希望的目的。能理會到各種必須的條件而運用它們，就有了自由。我們不是以現在的一切來控制將來的結果，我們以估計將來的一切可能性，來充實與調整現在的行動。能够這樣熟慮與審察，我們的行動，就有了自由，就有了成效。這與下棋相彷彿，棋國手是懂得棋子各種步驟的變化，他預料着最近將來的各種可能性，來決定他的行動的步驟。不會下棋的不是亂走盲動，就是『舉棋不定』，誰有行動的自由，誰可操勝算，就要看誰能瞭解局勢與運用得法來決定了。

現階段民衆爲民族自由而奮鬥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把自己組織起來，變成一個有團結的集體。各地民衆，按着切身的利益與特殊的需要，大家自動組織，然後統一着聯合着，造成了各黨派統一戰線的基礎，而羣衆有了組織，才可開始負起這爭取民族自由的偉大的使命，而各個人也才能在集體中自由發揮他的奮鬥的力量。同時各階層各集團的民衆在全民族的大集體中，必須保持自己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與組織上的相對的獨立性。這樣一面可以滿足各階層各團體本身的特殊需要，一面來服從民族的統一性，使各團體在民族整個大機構中，各自站在民族抗戰的崗位上，盡量自由發揮崗位上的功用，與整個民族在行動上配合着，變成有機的抗戰總力量。組織沒有獨立性是違反民主的，不能發展各階層各團體本有的力量，倘若獨立性不服從統一性，則力量不能集中。只有民主集中制，才可一面充分保持各階層各團體的己利益，以免過於被侵軋而失却自由；一面變成全民族分不開的一個機構，去適合團結抗敵的總要求。

#### 四 在爭取民族自由的過程中民衆應有的自由



此次民族解放戰爭，是長期的鬥爭，同時要在抗戰的過程中建立三民主義的共和國，以充實抗戰力量，使抗戰建國，兩相輔助，以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民衆本着這個大前題，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他們得運用所有的一切人力物力與知識，能發揮偉大的力量，同時還要不斷的自力更生，去產生各種新的力量。這種力量的發揮與產生，應該是自由的，應該受政府保護援助的。沒有自由，就不能履行他們的隨便那一種義務。因為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的，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的。倘若只有義務，沒有權利，民衆決不會踴躍參加的。因為民衆在現階段上有享受自由的權利，並且假如有任何阻力，妨害民衆的自由，剝奪民衆的自由，民衆就有努力為自由爭取自由的義務。

但現階段民衆要求的自由，並不是極無限制的絕對的自由。民衆所要求的自由，是按着具體環境所允許的各種必不可少的自由。現在中國正在擺脫半殖民地的封建殘餘，同時中國也沒有進到社會主義的階段，民衆應有的自由，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國民應該享受的自由。現階段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進步的階級，而民族資產階級所要求的各種自由，只要運用得法，是與全體民衆可以共同享受的，而且必須與全民族共同享受的，因為新興的進步的資產階級，正在負着時代付與的使命向前邁進，它的興趣，常常大致與全體民衆的興趣符合的。

自從全面抗戰以來，全國民衆，已漸漸團結在三民主義的抗戰建國綱領之下，來盡民衆應有的責任。但是政府直到現在，還沒有使民衆得到充分的自由。這是民衆在抗戰建國階段上，所受到的很大的阻礙，同時也阻礙了抗戰建國順利的進行。過去對於民衆自由種種不合理的箝制，應當從速解除。而且戰事已進入第二階段，政府更需要民衆的支持，爲了擴大大人力物力與知識的動員，民衆的自由，有進一步的迫切要求，同時也是提高政治效力的基本條件。

民衆在抗戰建國過程中，向政府要求的自由，大致可分爲政治的自由，思想教育的自由與經濟的自由。而這三方面，又互相配合着的，我們爲討論方便起見，不得不分別說明。



在抗戰建國綱領中，早有明文，規定人民於不違反三民主義之最高原則有言論出版集合結社之自由。但在實行方面，至今始終沒有貫徹，內地各處仍有封建勢力壟斷着一切，使民衆不能發表抗戰的言論，有的純粹抗戰刊物，橫被禁止與沒收，使許多人民至今還不明白抗戰的意義，而民衆的集會結社還不能積極推進，使各地不能盡量動員，不能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知識出知識的地步，甚至有些土劣地主們，自己有錢不出錢，反而強迫窮苦大眾，既須出力又要出錢。抽調壯丁，本是人民應有的義務，因爲民衆不能組織，民運不能開展，使抽調壯丁，還等於拉夫。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不免除，抗戰建國的力量是永遠不能充分發揮的，倘若人民能充分運用言論出版集合結社的自由，一面宣傳一面組織，民衆同時可以用組織的力量來爭取機會平等，不使土劣地主們，再有無理剝奪窮苦大眾自由的機會，而抗戰建國的能力也可大大地提高。同時使民衆有着直接政治的訓練，爲日後加入真正民主參政機關的準備，倘若民衆沒有政治訓練，不會有真正民主的參政機關的。

在思想教育方面，民衆所要求的自由，也是非常迫切的。因爲大多數民衆，自從民國以來，仍有着封建式的意識形態，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不懂得什麼叫自由，也不會來爭取自由，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政治經濟的落後性，反而濫用自由，發揮着個人主義，個人風頭主義，派別的活動，以及個人利益高於民族利益，的惡劣傾向，這種情形，是不利於抗戰建國的。怎樣普及抗戰教育，怎樣努力思想的鬥爭，來剷除種種惡劣根源，應當給民衆以努力於思想教育的自由。民衆有了思想教育的自由，則民族意識可以一面普及一面提高，使各個人都有審察力，創造力，選擇力，以及對於環境的應付能力。這都是自由國家的民衆所不可少的自由能力，也是抗戰建國的決定因素。

中國民衆的最迫切的自由，是吃飯自由。他們一面受到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和封建勢力的剝削，終歲勤勞，不得一



飽而一面感到失業與災荒的威脅無法謀生，因而死亡的每年不知有多少。這是國家很大的損失，人民很大的痛苦。政府應當積極改良民衆生活，積極發展國防經濟，來啓發廣大羣衆的抗戰熱忱與生產熱忱，藉以支持長期抗戰。同時，保證民衆的思想教育，言論，遊戲等各種自由，不是一紙命令一條法律所能奏效的，主要的是先有吃飯的自由，然後才有餘力去發展其他各種自由的機會。

政府發展國民經濟，當努力於大衆的經濟自由，對於少數資本家與大地主的發展，應當給以限制，以免抗戰勝利以後，國家經濟權，僅操在少數人手中，使他們有謀自己特權的機會，重蹈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而大多工農羣衆，仍被壓迫而得不到自由。民生主義的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原則，當具體地切實運用，保證大多數民衆有經濟自由。總之，現階段民衆所要求的自由，是民主國家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思想教育自由與經濟自由。臨時代表大會宣言說得很明白：『祇有給予人民以自由，使人民與國家在實際生活上打成一片，纔有真正的統一。』因爲『政治之自由，爲吾民族生存之保障；經濟之自由，爲吾民族生存之憑藉，惟能合吾民族之力，以共保之，乃能合吾民族，以共享之。』要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目的，只有切實努力實行對民衆的諾言，才能使民衆積極發揮偉大的力量，協助政府，共同建立自由的中華民族。



# 民衆運動論

吳大琨

民衆運動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經是差不多爲每一個支持抗戰的人所接受了，但關於民衆運動的本質，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以及當前中國民衆運動所應走的途徑，這些問題却未必爲每一個今天從事民衆運動的人所大家一致討論過，同意過。在這抗戰走上新階段，中國的民衆運動又須有廣大的新的展開的今天，無疑地，關於民衆運動的這些基本問題，在從事民衆運動者之間，以及在廣大的羣衆之間是都應當有一個一致的認識的。下邊是我個人對於這些問題的一些瞭解：

## 一 民衆運動的本質

什麼是民衆運動？它與政黨運動有些什麼不同？這問題是我們所必須要首先解答的。

民衆運動是民衆（對政府而言）爲了要完成當時民衆的共同要求而所發生的一種帶羣衆性的（即不是少數人的）組織活動。

因此，民衆運動，在它的本質上說，是非常廣泛的。只要是人民所組織的團體，它在爲某種目標而活動着，我們都應當把它看作是民衆運動中的一部份。



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不同，因為政黨運動雖然也有組織，也是爲了要完成某些羣衆的要求而從事的一種運動，但第一，政黨的目標是集中在政治，以取得政權爲目標的，而民衆運動則不然，民衆運動與政治上的活動雖然不可分，（而且必然也是應當與正確的政黨活動合流的）但民衆運動除了政治上的要求之外，還有其他的各種要求。民衆運動者只想推進政治的改革，但他本身並不想就此爭取政權。（一部份民衆運動者後來進入政治生活那是私人問題）民衆運動者除了一般的政治工作之外，他還有人民自身的各種組織工作，教育工作，生活福利工作要做；而所有這些工作，也都並不是單純的政黨活動所能解決的。這可說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不同的第一點。

其次，民衆運動，因爲它的性質上的廣泛，所以參加民衆運動的人也就必然可以非常衆多。差不多只要是人民，那麼，我們在理想上，是都應當把他吸收進民衆運動中間去的。而這一點與政黨運動就又是不同的。政黨——我們知道是由代表着社會中某一階級利益的人，同時是對政治絕對有興趣的人所爲了要達到他們的目的而組織的。因此參加政黨的條件，當然，必須要相當的嚴。任何政黨不能使全體人民都成爲黨員，但民衆運動者却是可以而且必須使全體人民都成爲民衆運動參加者的。這可說是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不同的第二點。

不過，民衆運動既然是民衆爲了要完成當時民衆的共同要求而所發生的一種帶羣衆性的組織活動，因此當然，民衆運動一定也是有它的時代性與階級性的。

在封建時代，或封建時代以前，人民還不會有自覺的時候，不用說，真正的所謂民衆運動是不可能有的。民衆運動的產生，嚴格地說來，應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產生以後，因爲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產生以後，所謂人民中間的有力份子（如工、商界人士以及文化智識份子）才可能在社會上佔到地位，同時也才可能有權起來與問政治，在這以前，人民即使受到了無窮的壓迫，至多只能有暴動，有某種限度內的秘密結社，（這些都是民衆運動的畸形形態）



但經常的民衆組織活動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們說，嚴格地說來，民衆運動應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建立起來了而後有的。

民衆運動的產生，果然有着所謂時代的限制，而民衆運動的內容，自然更是有着時代的限制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或封建統治尙未被推翻的時代，那時民衆的共同要求，（即民衆運動的目標，）當然一定會集中在脫離一封建統治的這一點上，而在這時候，資產階級的人士也一定會是參加民衆運動最踴躍者。到資本主義後期，那時民衆運動的目標，就由於環境的改變，必然會漸漸地傾向於使資本主義否定的道路上去，而民衆運動的踴躍參加者，這時，也就轉向到職工階級這一方面去了。所以我們可以說，由於時代環境的不同，以及參加民衆運動人士的階級成份不同，各時代的民衆運動的性質，因此也就會不同。但不論民衆運動的性質如何不同，有一點，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一時代的民衆運動，必然是配合了社會的改革方向發展的。民衆運動，決不可能離社會環境而獨立，而是正相反，被決定於當時的社會環境的。

## 二 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

明白了民衆運動的本質，再來談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那就比較容易了。

前邊已經說過，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不同，但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却是極密切的。

民衆運動開展的結果，民衆爲了要能貫徹它們的要求，必然會對最能代表多數民衆利益的政黨表示擁護，同樣，政黨，爲了要能取得民衆的擁護起見，也必然會對民衆運動的開展給予最大的幫助。民衆運動而如果不能與正確的政黨運動配合，那麼這民衆運動就將不能在政治上發生作用，同樣，政黨運動而如果不能與民衆運動取得配合，那麼



同樣的結論：歷史上有很多的政黨，往往是在民衆運動的發展中形成的，同樣，也有很多的民衆運動是在政黨的鼓勵下產生的。但不論政黨運動與民衆運動，二者之間有多少密切的關係，這二者之間在性質上的不同，却還是存在的。

現在一般人的誤解，往往就是因爲將民衆運動看成了與政黨運動完全相同的東西。因此在從事民衆運動的時候，就使得民衆運動的作風有些類似政黨運動化；同時，甚至因此還有人認爲，在今天只要從事政黨運動就夠了，民衆運動的一切好像都是應當服從政黨運動的決定的似的。我們不能不認爲，抱着這種見解的人，他對於民衆運動的認識是錯誤了。

但與這同時，另外也還有一些民衆運動者，他將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的關係看成太互相對立的東西了。彷彿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就絕對不應與政黨發生關係，而政黨中間的份子就更絕對不應來參與民衆運動。對於這種將民衆運動看成完全是「超然」一切東西的意見，我們也不能不認爲是錯了。

事實上，民衆運動與政黨運動是可以沒有對立的，而且也是應當沒有對立的。

民衆運動，有民衆運動的特殊性，也可說是獨立性，因此，無論誰在從事民衆運動的時候，（即使他是一個政黨的黨員）我們都應當要求他尊重民衆運動的這一種獨立性。把民衆運動而企圖作成某一黨某一派的「私產」這是不可能的。但民衆運動也並不是沒有政治性的。如果某一黨某一派，他能在實際上幫助民衆運動的發展，或者代表民衆的利益，那麼民衆運動的發展結果，也當然會是對於這某一黨某一派表示擁護的。

在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內，政黨與政黨之間應當有一種合法的競爭，但誰是這些政黨的最後裁判者呢？就是民衆，而且是有組織的民衆。所以民衆運動的發展，在這一意義上說來，我們正應當承認它是政黨政治發展



的。前提沒有充分的民衆運動的發展，是也決不可能有充分的政黨運動發展的可能。

### 三 中國當前民衆運動的動向

現在要說到我們當前中國民衆運動應有的動向了。

中國過去的民衆運動且不談，自「九一八」以後，尤其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示威運動以後的民衆運動，我想是誰都應當承認中國的民衆運動，是集中在「救亡」這一目標下的。而且，我想這七八年來，民衆運動所在中國政治上起的作用——抗戰，以及國內團結的終於實現——是應當算是中國民衆運動力量的偉大表現的。

但也正因為當前中國民衆運動的目標，是集中在「救亡」這一目標下，所以中國當前的民衆運動就有了一個特徵，它表示了統一戰線的特徵。在歷史上，各國各時代的民衆運動總多少帶有與統治階層對立的意味，但在中國當前，因為主要的目標，只是「救亡」，所以不但不與統治階層有什麼對立的關係，而且正相反，民衆運動是應當爭取與統治階層完全合作的前途的。

中國當前的民衆運動，必須強調統一戰線，因為統一戰線可說就是現階段民衆運動的目標，統一戰線有幾方面：就政府與民衆的關係說，民衆應當與政府合作，政府也應當與民衆合作。在今天，如果還有人從事民衆運動而對政府採取對立的態度，那當然是錯的，可是在今天，如果政府中間的人還認為民衆運動的開展是對政府不利的，那也就是錯誤的。民衆運動的與不與當時的統治階層對立，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問題，如果客觀的事實需要對立，那麼即使提倡「統一」也還是會「對立」起來的。當前中國的環境既需要「統一」中國的民衆運動當然是會向與政府「統



至於就民衆運動與政黨的關係說，那麼，前邊已經講過，本來就是不衝突的，當然更要爭取「統一」了。不過，抗戰到今天，有一件事實表現得非常嚴重的，那就是不論大家對民衆運動的重要性，已經有多少認識，可是中國目前的民衆運動，無論就它的數量上說，或者是質量上說，還都發展得太不夠。

今天，我們要使抗戰勝利，那麼動員全國民衆，使全國民衆都能有組織地參加抗戰，不用說是絕對必要的。而且今天抗戰已經進入新階段。所謂「新階段」也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展的新階段，爲保證統一戰綫的鞏固，以及爲了保證今後「民主共和國」建立的基礎，民衆運動更是有絕對發展的必要的。但今天中國的民衆運動還不夠開展。這不開展的理由，丟開了客觀上的條件來說，那麼在主觀上，一般從事民衆運動的人，他不能抓住現階段民衆運動的特徵（或者雖抓住，而抓得不够緊）就該是一個最大的理由。

因爲不能抓住現階段中國民衆運動的特徵——或者甚至還不能瞭解民衆運動的一般性質——因此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就在工作上表現出了它的不够展開統一戰綫。在工作上不是因爲與政府有了對立的意味，不能展開工作，就是因爲與任何政黨有了對立的意味，而也因此不能展開工作。（一部份人把民衆運動的作風政黨化了）

果然，一件事情的造成，往往是多方面的。我們不能單將民衆運動的不能開展，完全歸過於當前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在政府方面，在政黨方面有一部份人士對於民衆運動的瞭解，事實上的確也須要修正的——但至少過去中國的民衆運動是雖然已經認清了目標——統一救亡的目標——可是却還不會能大踏步的做去，總是一件事實。

在這抗戰已走上新階段的今天，民衆運動如果還停留在過去比較狹窄的圈子內，不能有飛躍的進展，這對於抗戰，對於建國，都是不利的。

爲了要建立新的獨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國，我們民衆運動者應當克服過去的作風，而向新的方向邁進！



# 十九世紀的歷史

譯  
By Professor E. Tarle

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十九世紀的歷史是特別的重要。因為在十九世紀中，經濟，機械和工業，科學和文學，音樂和造型的藝術，都以從來未有的猛烈和速度發展着。同樣無雙的是國家政治結構的突變，不斷的戰爭和革命，這些變更了當時整個國際常態，影響到歐洲國家間的國際關係，並且時常改變國家的界線。差不多在全部的十九世紀的行程中，工業布爾喬亞在他們的階級中是佔着領袖和統治的地位。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財政資本才開始形成，它到二十世紀的初期在所有的前進資本主義國家中霸佔了全部的勢力。十九世紀準備了從舊型的資本主義轉化到獨占的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發展中最高和最後的階段——到帝國主義的過程中，所需的一切條件。

十九世紀的布爾喬亞同時在數條陣線上進行鬥爭。第一，當十九世紀前半部的時候，在那些在資本主義前進的路中豎立着和以前封建地主多少有關係的地主階級和貴族階級的國家中，布爾喬亞對他們堅持地繼續着鬥爭，一直到他們失敗為止。第二，在那些在十九世紀開頭還不會完全統一的國家中，布爾喬亞以不斷的爭鬥來爭取國家統一。恩格斯寫着說：大的統一國家的建立變成了歐洲統治的布爾喬亞的普通的政治機構的唯一的形成了。商人和工業家急切地要求着一切種類的地方限制的廢除（不同種類的滙票，手工業的設立權在二個相距不過數里的區域中有着不同的法律，雜多的地方立法，居住權的限制，不同種類的度量衡制度，以及各式各樣的通貨等等）這些都是



阻止和限制着商業的進行。

「此後，很明顯的，這些統一『祖國』的傾向全都是根據着一個物質的基礎。」（註一）

那些引到建設一個統一的意大利的戰爭（一八四八，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和一八六六）引到建立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戰爭（一八六四，一八六六，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完全是上述國家中的布爾喬亞的強烈的高過一切的「企求統一的意志」的表現。第三和最後，布爾喬亞更堅持着一種鬥爭，使他們的階級能夠統治一個被他們剝削的階級的全部人民，更高過一切的是去反抗工業無產大眾，這種階級鬥爭繼續着全部的十九世紀，並且一天一天地尖銳化了。

十九世紀是一個無產階級形成的世紀，這是一個最偉大最前進的歷史上的力量，他們的任務是去廢除一個寄生的資本主義和去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在這種崇高的理想下，這些十九世紀最前進的人們是在爭鬥和捨去他們的生命。

無產者自覺地爲了他們階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目的而進行的階級鬥爭，組成了全部十九世紀歷史的年表。這種無產大眾反布爾喬亞的堅決的鬥爭，早已在不同的世紀中發生了。它是以極不同的形式，並不時常以同等的力量，而取着各式各樣的狀態。第一次無產大眾的騷動是於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在里昂開始，加上英國的「憲章運動」，然後，經過了路易非力澂（Louis Philippe）時代的堅決鬥爭，再進一步而發展到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戰爭，從一八四八年這繼續到第一國際和巴黎公社。然後，從巴黎公社經過了商會的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一直到第二國際活躍的最初數年。在所有這些爲了政治的「價值」的鬥爭的烽火中，凡一切布爾喬亞所誇爲全宇宙人類的偉蹟，

（註一）Engels, The Role of Violence in History.



都已經燒得連痕跡也沒有了。

「議會式的民主共和……這常常是布爾喬亞國家中的最完備和最前進的制度。」（註二）

它現在早已爲布爾喬亞毫無猶豫的棄絕了，當布爾喬亞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後，知道了拿破侖第三的半專制政權，要比共和對他們更有利益和更安全。在西歐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布爾喬亞立即加入了反動的陣營，和官僚及保皇黨，和封建主及教會聯盟，他們的統治是布爾喬亞新近得到了無產大眾的幫助而推翻的。同這一色一樣，完全爲了同樣的顧慮，德奧的布爾喬亞在一八四八年事件以後立刻很快的和極願意的和普魯士的半專制主義妥協，甚至於回到了奧國的全極權政府，資產階級，當他們的統治是嚴重地被威脅着時，是準備隨時屏棄掉任何的「自由」——甚至是一切的公權——反而去同情一個獨裁政權，只要它能答應以決定的和殘忍的手段去壓服革命的無產階級。法西斯主義是一切以前爲世界歷史上所記載的的布爾喬亞獨裁中的最兇暴的，最震動地卑污的，最厚顏地野蠻的一種形式。在全部的十九世紀中，布爾喬亞從來不曾經驗到像他們在現在所面對着的程度，就是他們已經註定着死亡，和他們的地位是出乎尋常的不穩靠。正因爲如此，在十九世紀中，除掉階級鬥爭特別尖銳的時期（像巴黎公社時期一樣，）布爾喬亞獨裁的政權從未曾建立過（特別是在某一個時期的年代中，）這種像中世紀殘酷一樣的政權，恐怖的暗室，一個政權根據着每一個已經知道的對失敗的階級的殘殺的方法，像今日的法西主義一樣，它完全根據於這種形式的鎮壓。但是，無疑的，這種政權是僅能存在到某一個時期。

讀者們在讀到十九世紀的文化一定也會注意到當布爾喬亞特別尖銳地覺到無產階級革命活動的威脅時，他們在文化生活上立刻就變成異常反動；他們全然忘掉了福爾特爾（*Voltaire*）的傳統，屏棄了在宗教範圍內的自

（註二）列寧選集二十卷，一一九頁（俄文版）



由思想拋除了從十八世紀所遺下來的對宗教的懷疑哲學，他們轉向教會和僧侶而企圖從後者那裏得到幫助和保護。「我們的仇敵並不是鄉村中的教士，而是社會主義的說教者！」那些以前曾經一度崇尚自由思想的布爾喬亞而為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震嚇了的第也爾（Theiers）、梵羅（Falloux）以及其他的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喊着。這次布爾喬亞所經驗到的惶恐而刺激他們去同僧侶們聯盟的事，就是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末年期也還不曾放棄。正當這個時候，差不多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一個法國最知名的布爾喬亞文學家，保爾鮑治（Paul Bourge）和一個聞名的文藝批評家，白路乃底愛（Ferdinand Brunetier）宣稱說「科學是破產了」，宗教將是個人道德和社會的唯一基礎！

雖然，甚至於是一個彼給於的課題，在全部的十九世紀中，這種反動文化並不敢侵佔到自然科學的奠基者中間，他們的發明是敗壞了宗教的迷信。達爾文（Darwin）、萊也爾（Layelle）、赫胥黎（Huxley）、孟特列夫（Men delevy）、賽希諾夫（Sechenov）、漢姆好志（Helmholtz）、白奈特（Claude Bernard）、白爾退羅（Bertello）、馬希尼科夫（Mechnikov）、柏士端（Pasteur）完成了許多人類巨大的偉蹟。只有現在，法西主義者在這個自然科學的領域內也表示着驚愕地惶恐，而盡可能地想去撲滅那些自由的科學探究工作的光輝。在慕索里尼在意大利，希特勒，鄂培爾，哥林，羅森堡在德國，以及他們的熱心的學樣者匈牙利和其他國家所做的可恨的事業的光線之下，極清楚的，以前在一八六四年那個為世界反動道德領袖的教皇，庇耶士第九（Pius IX）地宣布着所有一切的主要的科學成功全都是「一個差誤」的這種奇蹟，在現在的法西國家和這些「差誤的」科學的鬥爭中，又尋到了許多熱烈的同情和積極的幫助了。現在的教皇庇耶士第十一在慕索里尼的意大利急忙的去發揚那張為庇耶士第九於一八七〇年在立憲的意大利所創的禁論是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這樣，我們在十九世紀已經看到很多的東西包括在政治領域裏的和反動道德的領域裏的，這些到現在剛才結成繁榮之花。那是很明白的，在方才的分析中，十九世紀將是未來的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假使現代的法西斯主義的像野獸一樣地的激怒叫它是一種危險，那末每一個人應該承認這一個危險是十足地有根據的。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的時代這種危險當然並沒有像列寧和斯大林時代的那樣尖銳，那樣惶恐和那樣持久。

十九世紀是工人階級鬥爭的最大的歷史上的學校，在這個過程中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是第一次完形底出現，各式各種的政治的經濟的無產階級的組織也開始存在着。却當十九世紀前半的終結，馬克斯恩格斯的永生的學說是天才地被發見了。這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闡明了全部的過去和預見到將來國家的前途。在歐洲思想史中共產黨宣言將永遠地被認為說明全部過去的歷史和預見未來的最深刻的分析。這是確實的，即使馬恩二人在以後再沒有根據科學社會主義去寫許多有價值的歷史的經濟的和哲學的著作。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和其他馬恩關係人類歷史的許多科學創作，就是從原始共產社會開始，終止於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運動，十二月二號的「政變」，克拉明（Crimean War）戰爭，和巴黎公社的歷史，都是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馬恩二人的這些科學創作在無數人民的文化生活上遺留下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同時更領導着此後無產階級和所有工人大眾反抗榨取他們的壓迫者的政權的新戰爭的思想。在馬恩的策動下，第一國際的創立變成了代表「宣言」上所表示的主要意見的組織的最初發軔的光榮的例子，這些意見就是爭取無產階級的聯合，拋棄他們的鎖鏈而去征服全世界。馬恩的學說不只是在人類最近的將來的全部歷史中結成一朵燦爛的花朵，並且它將為此後無產階級爭取勝利的戰鬥精神和力量所由來的不盡的泉源。它已經教導那些戰士們去爭取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使他們明白失敗僅不過是暫時的，在任何嚴重的打擊之下，他們是沒有理由去失掉勇氣的。當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號



拿破崙第三絞死了法國的第二共和的時候，在一八四八年看快要實現的革命之夢的希望是遭到了一個巨大的打擊，這使許多的思想家，甚至於包括許多革命精神非常強烈的（像格爾岑（Sertzen））失望了；他們開始以為那老邁的歐洲將注定了腐敗和死亡，她的前途是完全沒有希望了。但是，却當此時，馬恩二人是正在埋頭組織無產階級，準備未來的新鬥爭，沒有一天曾經失掉了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樂觀的前瞻。

社會主義的奠基者，他們自己並不會固定的從他們的學說中得到樂觀，但是他們却能夠鼓勵此後相信他們的學說的戰士們的樂觀情緒。

馬克斯，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開始把他的希望寄給俄國。他預見了在俄國土地上的革命運動的風起雲湧地發展。在他死前的三年，馬克斯和恩格斯一起對俄國的革命運動寫下一段預言，說這個運動：

「……在這個鬥爭以後——那可能是一幅嚴重的圖畫——不可避免的將引到一個俄羅斯公社的建立。」（註三）

馬克斯和恩格斯二人都沒有親眼見到巨大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和它在俄國的勝利，但是多麼光輝呀，他們告訴了我們為什麼今日的帝國主義布爾喬亞要激起那樣無比的憤怒和驚愕，當他們見到蘇聯代替帝俄出現在地圖上，一個為全世界被榨取階級的真實的朋友，和支柱而現在占據着歐洲的衛兵的地位的時候。

俄國在十九世紀的世界政治上佔着一個極大的地位，從拿破崙戰爭時代，當一八一二年開了歐洲人民反對拿破崙的血戰的先聲起，一直到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參加中國事件時止，俄國大大的影響到人類的命運。沙皇政府的活動時常去絞死西歐的自由主義運動，革命時馬克斯主義的奠基者一些也沒有差去叫沙皇的俄國為歐洲防

（註三）馬恩全集十五卷，五五二頁（俄文版）



止革命的衛兵。但是的確敵視沙皇的勢力在十九世紀中開始是極慢，往後是急速地成長了。從十二月革命者和黑爾岑（Hertzen）到 Petrashevtsy，從 Petrashevtsy 到 Chernishevsky，到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革命者，從 Zemlevoltzy 和 Narodovoltzy 到革命的馬克斯主義散佈時開始，再一直到青年的列寧和他的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最初的同志們的活動的時候——當所有反專制反剝削政權的爭鬥的時候發展到存在着很多數量的戰士。在十九世紀之末專制政體的執政依舊存在着。雖然，它從前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意識形態上的基礎是已經在極大的動搖中。「歐洲的衛兵」在過去時常出境去援救外國的皇室和教堂的，現在被威脅到連自救也來不及。這距離俄國人民在俄國加入的十九世紀的戰爭期間所表現的英雄的行爲去進行一個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本國的劫掠者和外國的干涉的時候，已經不遠了。

但是，俄國不只是在十九世紀佔着歐洲的衛兵的位子；在同一個世紀，俄國還在世界文化上據着一個最優越和最有勢力的地位。古代的希臘給全世界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埃斯希爾（Aeschylus），梭孚克勒（Sophocles），菲地亞斯（Phidias），意大利給全世界以但丁（Dante），米開蘭傑（Michael Angelo），黎奧那多，達·芬奇（Leonardo de Vinci），法國——福爾特爾，盧梭（Rousseau），雨果（Victor Hugo），德國——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英國——莎士比亞，拜倫（Byron），俄國在世界鬥場中到得晚一些。雖然他的歷史要比其他國家晚得多，不過，單獨在十九世紀她就給全世界以普式庚，哥哥兒（Gogol），託爾斯泰，和杜思退夫斯基——十九世紀文藝中的四大巨人。「那末，我們怎能不希望她的將來呢？」那是已故世的著名出版家山姆把（Marcel Samba）在他的一次演說中所說的話。我們都知道俄國在十九世紀中不僅給全世界這「四大巨人」並且還有許許多多有價值的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但是，山姆把，在他給我們這一短串名字的時候，他是極小心地在分析不



同的國家所給與全世界文化總寶庫的不滅的供獻，他僅僅舉出在文學上和藝術上坐着第一把交椅的巨人，僅僅是這些巨人在他們的範圍內給全世界文化以極大的影響的。

照一般的承認，十九世紀是一個俄國文學給全世界以無比的供獻的世紀，當曼里曼（Prosper Mérimée）和最初的譯者們「發見」了普式金而把他介紹到歐洲，當賴登希答特（Redenshtedt）「發見」了勒蒙托夫（Lev Montov）當那著名的法國文藝批評家盤夫（Saint Beuve）開始寫到哥哥兒和當第二帝國時代的巴黎在第一次出演“Requiescant”時得到巨大的讚賞和不斷的笑樂者的時候，縱橫全世界的俄國文學還不過剛剛在開始它勝利的行進。屠加捏夫（Turgenyev）的散文對福祿爾培（Flaubert）左拉（Zola）莫泊桑（Maupassant）烏爾巴哈（Auerbach）凡比爾黑根（Spielhagen）的巨大影響也不過是後來託爾斯泰，杜思退夫斯基在十九世紀末所給於歐美影響的一個啓示。西方的文藝批評家和小說家異口同聲地承認在戰爭與和平，愛挪，卡拉林那，復活出現以後，在罪和罰，拉卡馬左夫兄弟（Karamzov Brothers）出版之後，對於的細緻的文學的要求的澎漲使舊式的寫法變成不能再繼續下去，全世界的讀者們都覺到這心理分析的細緻文學已經開始大踏步的向前開展了，它所開的道路在十九世紀的起初和中葉，大文豪巴爾扎克（Balzac）司得特兒（Stendhal）和福祿爾培，狄更士和山乾來（Theckeraay）所想要起頭走的。在十九世紀末，當俄國作家的名字聞名得越多，它對於西方文學的影響也越大，同時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這種影響在二十世紀又全部的被吸收了去。幾個英國雜誌在託爾斯泰死後批評着說，「自從莎士比亞以後，在文學上這世界中是再沒有一個人比託爾斯泰所學的盛名再大了。」龍那却爾斯基（Lunachersky）在一次公開演說中，同許多英法德和斯干的奈維亞（Scandinavian）的文藝批評家有着同樣的意見，說「杜思退夫斯基同以前一樣依舊為世界文學的霸主。」非常小心去讚賞外國人的 Paris Sorbonne 給一個



俄國的奇才，託爾斯泰和杜思退夫斯基加入一個稱號，說是「十九世紀俄國的凱斯特（Castor）和包勒（Pollux）」是文學上的二個巨人。」十九世紀給了全世界這許多的大思想家和革命的民主者像白林斯基（Belinsky）道布郎里包夫（Dobrolinbov）和却爾尼希夫斯基（Chernishevsky）

既然在十九世紀的創造的文學的領域內，俄國是佔着第一把位子，她的地位是非常的，無比的和不可否認的，但是她在其他領域內，地位也是異常崇高。他們供獻這些藝術家，像蘇里可夫（Sorikov）拉賓（Repei）凡來却琴（Verechagin）殺魯夫（Sarov）在音樂的領域內，他們給我們以葛林加（Glinka）摩茲沙爾格斯基（Musorgsky）萊姆斯基——科爾沙可夫（Reinsky——Krosakov）達爾哥密格斯基（Dargomigsky）賴希馬尼諾夫（Rahmaïsnoff）脫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在科學上，他們供給了被稱為「同由格列特（Englid）一樣」的天才數學家，羅巴去夫斯基（Lobachevsky）化學家孟特列夫（Mendeleev）和物理學家勒白特夫（Lebedev）關係後者湯姆孫說，「勒白特夫的實驗的結果使我望而却步。」古生物學家V·科凡勒夫斯基（Kovalévsky）達爾文說古生物學的歷史將因他而劃成二個時期：先科凡勒夫斯基時期和後科凡勒夫斯基時期。俄國人在讀「十九世紀的歷史」的時候，將永遠不要忘記，這個世紀是正同上一個世紀當第一次俄國人在世界上佔到重要的地位，當第一次使世界人民知道她的巨大的潛伏力以及在他們之中的才力和道德力量的時候一樣，他們現在正在開墾着一條新的路徑，這將指示給全人類看他們未來應走的道路。



## 關於知行問題之研究（哲學研究）

陳伯達

在中國哲學史上，有兩個大問題：一個是名實問題，一個則是知行問題，而嚴格說來，前一個問題就是哲學上的本體論問題，後一個問題則就是哲學上的認識論問題。

在中國哲學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名實問題，而且還能給以唯物論的解決的，這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哲人，當時下層社會的代表者——墨子及其門徒；而墨子及其門徒並且還由名實問題進而初步具體地提出了知行問題，初步具體地解決了知行問題。（偽古文尚書『說命』篇，有傳說關於『非知之艱，行之難艱』之說，但這篇本係偽作，所以還不够作為那最早提出知行問題的根據；就歷史的發展說來，殷代的人也還不能這樣鮮明地提出知行問題。孔子有幾處提到言行，如所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言忠信，行篤敬。』可說他已是接近地提出了這問題；但是較明確地較具體地提出問題，而且能對於問題真正去處理並加以初步的正確解決的，還是屬於墨子。）墨子曾引過一個很好的例子，來闡釋知行的問題；他說現在有個盲目的人說：『皚』就是『白』，『黔』就是『黑』，這話就使是明目的人也是不能變更的。但是如果給盲目的人拿取一件白而又兼黑的東西，他就不『知』道那是『白』的那是『黑』的了。所以，我說盲目的人是不知白和黑的，不是根據於他的概念（名），而是根據於他的實踐（取）。（『貴義篇』）從墨子所引證的這



一個例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墨子的意見是把『行』看成『知』的基礎的。墨子認為，盲目的人雖則口中會說出黑和白，但却不能在行為中辨出黑和白，所以就是不知黑和白。關於這點，墨子正是把實踐和行為看成是知的準則。同時，在這里我們也正可以看見：墨子不是把知行看成分裂，而是把知行看成統一。墨子關於知行問題的了解，正如他對於名實問題的了解一樣，乃是近代中國辯證唯物論之原始的先驅。

後代在哲學上展開了知行問題的，乃是明代一個唯心論的大哲——王陽明。王陽明是主張『知行合一』的。如說墨子是初步具體地提出了知行問題，那末，可說王陽明則是明白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問題。『知行合一』——在墨子那裏，還是原始的性質，而王陽明却把這問題明白地提了出來，這是王陽明的展開問題上的一個進步。但是，如說墨子會原始地具體而微地解決了知行問題，却又可說王陽明則沒有解決了這問題。因為他是唯心論者，結果他不能正確地處理這問題，也不能解決這問題。王陽明的辯證法，是唯心論的辯證法，因此，要正確地處理這問題，要解決這問題，就需要把王陽明的倒置的唯心論辯證法再倒置過來。

王陽明認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看成『最初』，看成『開始』，這是王陽明唯心論的癥結所在。事實上，『行』是『知』的基礎，也是『知』的最初出發點。哥德是說得對的：『開始為動。』（或譯『泰初有行』）人類經過『行』（實踐），去接近世界，把握世界，改變世界，因而把握着真理，所以，『知』正是從『行』中取得的；『知』把人從盲目變成明朗，『知』又反轉而作用於『行』，增強『行』的力量，成為『行』的指南，使人能自覺地，更進一步地，更有效地以至最有效地，去把握世界，改變世界，把『自在之物』變成『為我之物』，並從而又改變着真理，發展着真理。我們對於知行合一的關係，正是作如是觀的。誠然，在王陽明的學說中，是含有接近唯物論的因素的；比如王陽明說：『今人却謂必先知而後行，且講習討論，以求其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始終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在這裏，



王氏是認爲不行就是會終身不知的，求知就須依賴於行。雖則如此，但是王氏在其整個學說中總是貫串了唯心論的曖昧的；比如，王氏說：『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這樣，王氏是把知行的關係混淆不清的，而且是把知行二者同等平列起來。

近代中國首先重新提起了知行問題的，爲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大胆地把自己的思想從所謂『知易行難』的舊說解放出來。中山先生引證了歷史的事實而道破了一個真理：人類的發展，首先是從『行』出發的，而『知』是在『行』中不斷地發現和獲得的。中山先生說：『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其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猛進之進步也。』人類歷史的發展，首先是依賴於人類的『行』——人類的實踐。人類依賴行去獲得自己生存的方法，去從事生產，去獲得自己的衣食住。行是歷史基本的動力；沒有行，就沒有人類社會的存在，就沒有社會的變革，就沒有人類的知識；沒有行，就是人類社會的絕跡和智慧之燈的熄滅。成爲人類思維（『知』的最高形式）的機關——人類的頭腦，如歷史所證明了的，這首先就是從人類的勞動實踐（行）中發展起來的。而這就有如中山先生的所謂『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除了『行』，人類就再沒有可以取得『知』的道路，而當人類從『行』中取得『知』的時候，這就是使人們能正確地或更正確地去『行』，更鼓舞了人們『行』的勇氣，使人們能更容易地，更輕快地，實行『行』的步驟，達到『行』的目的，使人類社會能更大踏步地向前邁進。這是中山先生的所謂『知之更樂行之』，也有如中山先生的所謂『因已知而更進於行』。毫無疑問的，中山先生關於知行的學說，在這些方面，比起王陽明關於知行倒置的觀點，是進了一大步；在這些方面，王陽明一般地是唯心論的，或陷於唯心論的曖昧，而中山先生却轉向於唯物論以至走上唯物論。同時，在實質上，中山先生的所謂『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和『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却已自發地接近於正確的『知行合一』的見解。這正確的『知行合一』的見解，不是王陽明倒置的唯心論的『知行合一』，而



是合理的辯證唯物論的『知行合一』。(中山先生曾批評了王陽明。是的，王陽明關於知行問題的唯心論倒置，正是該受到批評的。)

近代工業在中國的初步發現，中國革命運動的實踐，自然科學的輸入，達爾文進化學說對於中國人所起的發覺振聵的作用（赫胥黎的『天演論』在清末，經過嚴復翻譯到中國來，一時轟動了中國的人心，社會科學的初步影響，這樣，就引起了近代中國人在前一個革命的時期已能要重新來提出自己祖先所提出過的問題，並可能重新根據許多歷史的經驗和許多科學新發現，來初步體會這知行的問題。特別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實踐，使得這個知行問題，成爲新歷史實踐的一個迫切的問題。承認『行』爲『知』的最初出發點，這對於中國革命運動就有很大的意義；這首先是在於打破中國人沉迷、遲暮、苟安的惡習以及空虛改良的幻想，激起人們的實踐活動。不但在清末，有不少人藉口『先求知』來企圖阻止或緩革命的實踐，而且在辛亥革命後，恰又有不少人藉口『知易行難』來阻止革命的貫徹，進行與反革命妥協，以謀苟安，而把革命打銷。如大家所知道的，也如中山先生的自述：他的『從事於知易行難一問題，以研究其究竟，幾費年月』這是在辛亥革命之後，而且是由於辛亥革命失敗苦痛的教訓所引起的，並且，孫中山先生的公表自己的學說，還是在民國七年，即在中國革命運動另一個新紀元——五四運動的前夜。不和這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聯系來看，我們是不能了解近代中國知行問題的發展的。

把『知易行難』的舊傳統思想倒轉過來爲『知難行易』這會是中山先生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革命，是對於一種舊傳統思想的反叛。本來革命者一方面要善於繼承舊的最好的最優秀的文化思想傳統，另一方面却正需要看到舊統治傳統思想中所含和所存在的那種麻痺人心的渣滓和毒素，那種蔽翳人民耳目聰明的舊統治者的傳統教條，因而加以批判，加以抨擊，加以變革。舊統治的傳統思想傳統教條中所存在的渣滓和毒素，時常能成爲阻止民族



覺醒的很大禍害，這事實是我們在古今中外革命史上所遇見了的。中山先生在革命的實踐中正是遇到了這種禍害，而且是因為遇到了這種禍害，於是更挺身而出，為新的思想而鬥爭。中山先生在其『孫文學說』的序言上，對於『知易行難』的舊說，曾做了這樣沉痛的呼喊：『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祇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從中山先生的呼喚中，我們可以更加證明：為革命而進行思想的鬥爭，是一個怎樣重大的工作。

革命的知行問題，用近代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革命的理論是和革命的實踐密切聯系中形成起來的，是從革命的實踐中，在革命的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比如，中山先生的革命實踐就早於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的產生；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是經過了相當長期的革命實踐活動，並且是在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基礎上，而產生了的。同時，革命實踐的往前發展，又必不可免地要使革命的理論更加充實起來，更加擴大，更加具體。比如，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根據於中國革命實踐的發展，從而『因時而演進』的。五四以後，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時候，三民主義的思想，比起同盟會時代的三民主義思想，已表現了劃時代的充實，已擴大得多，具體得多了；而且這時候革命方法（三大政策）與革命原則（三民主義）的結合，是更無比地豐富了革命原則（三民主義）的革命生命。

理論（知）一經被形成，被發現，這理論（知）如離開了實踐（行），這理論便是僵死的，不值錢的。這正如列寧對於共產主義所說的：『沒有工作，沒有鬥爭，只有一點從共產主義小冊和書籍裏面所得的關於共產主義的呆板知識，是一文錢也不值的，因為它會繼續從前那種理論與實踐的分離，這種分離是舊的資產階級裏最令人厭惡的一種表現。』必要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必要把理論轉化為實踐，必要隨時在實踐中檢驗自己的理論，並且進一步地又



把實踐轉化爲理論，使理論走上新的發展。本來關於理論的發現和學習，就是爲的去指導實踐。『理論假使不和革命的實踐聯系起來，就要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如果不受革命理論的指示，就要變成盲目的實踐。』（斯大林）

理論和實踐聯系起來，理論轉化爲實踐，理論的力量即成實踐的力量。馬克思『理論一旦把握了大衆，就變成物質的力量。』理論是精神的力量，這精神的力量又可變成物質的力量。中山先生在其言論中不斷地提到在革命中精神力量的偉大。完全正確的，精神力量在革命中的表現是極偉大的，而這種精神力量的所以偉大，就是因爲它是把握着大衆，因此，這精神的力量即成爲物質的力量，即成爲摧毀敵人之物質的力量。這精神的力量怎樣能變成物質的力量呢？因爲經過革命的實踐。革命的實踐（行）是革命的理論（知）與實踐（行）之結合的基礎，也是使精神的力量變成物質力量的橋樑。而且，在革命實踐的基礎上，這種物質的力量，就又再轉而進一步地去組織新的精神的力量，強化精神的力量，這也就是這種物質的力量同時也又轉化爲精神的力量。比如關於『抗日才能救國救家』和『抗日需要廣大人民的動員』的理論，一旦經過深入民間的實踐，把握大衆，這就引起着廣大人民的奮起，掀起着民族革命軍，這樣，這理論，這精神的力量，就變成物質的力量；而這物質的力量，在實踐過程中證明着自己確能給日寇以極有效的打擊，並更從而獲取許多關於爭取抗日最後勝利的經驗與教訓，這就要更興奮廣大人民抗日的志向和決心，更在各方面充實關於抗日的理論，更便利於展開全國抗日精神上的總動員，這樣，這物質的力量同時也又轉化爲精神的力量，而這精神的力量，經過抗日的實踐，又不可避免地要轉而成爲更強大的抗日的物質的力量。

知行是歷史的範疇。行是具歷史性的，知也是具歷史性的。人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對於自然，對於社會，發展爲各種不同的『行』，也發展有各種不同的『知』。比如，中國人最早的時候是『鑽木取火』，後一個時候，則擊石取火，在近代，則用火柴。同是取火，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却表現了取火方法之知行的不同。比如，在同盟會時候，中國



民主革命，是三民主義的，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民主革命，也是三民主義的，但這三民主義却已較明確地規定了『反帝國主義』並提出了『直接民權』提出了『耕者有其田』而且還把三大政策和三民主義結合起來。在目前，三民主義以抗日為第一，而實現三民主義，首先就要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同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鞏固和擴大，又正必要以三大政策為基礎。）同是三民主義的革命，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却表現革命的目標、方法及方法的表現形式之知行的不同。比如，在法國大革命時代，那時無產者還幼稚，就不能提出由資產階級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轉變問題，但在一八四八年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馬克思已提出了這個問題，而在二十世紀時代，列寧、斯大林在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就把這個問題更具體化了。

不能把『知』『行』限制在千古不變的一定範圍內。沒有一種人在一定歷史時代內的『行』能說是已完結了人類歷史永久的事業；也沒有一種人在一定歷史時代內的『知』能說是已達到了人類知識最後的界限。關於這點，是知行問題最重要的一點。否認了這一點，那就是否認了歷史的進化，同時，歷史的進化也必將推翻了這否認。秦始皇認為他所『行』的事業，不但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絕後』的，認為他的帝位可由一世傳至萬世；然而，中國的歷史很快地就已推翻了秦始皇的謬見。孔子的門徒，舊時代的帝王，把孔子『君君臣臣』的學說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認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百世而不惑』，然而，中國的歷史發展，終究動搖了孔子道統的王位，終究發現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所以，把『知』『行』看成歷史的東西，這對於我們並不僅是關於過去歷史的興趣，而特別是關於歷史的奮鬥，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求歷史向前發展和擁護歷史向前發展的人們，他們力行以求知，又用知去力行。他們同意中山先生所答責的『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他們力行以求知，而求知，就是為的力行，為的便於



解決和實現所提出的『行』的問題；而解決和實現某一種『行』，同時還爲的轉變到另一種『行』的領域，並把『知』進一步地發展起來，充實起來，而這『知』又是爲的更進而便於解決和實現另一種『行』的問題，由一種『行』的歷史階段轉變到另一種『行』的歷史階段，同時，在『行』的歷史基礎上，由『知』的第一步轉變到『知』的第二步。人們的『知』、『行』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進行的，而人們又不斷地經過『行』經過『知』去改變歷史的條件，去創造歷史的新條件，使得人們更往新的『知』、『行』邁進，使得人們得一步復一步地向『由必然的王國進於自由的王國之飛躍』使得人們得一步復一步地走向『成爲自己的社會存在的主人翁，因之，也就成爲自然界的

主人，成爲自己的主人——成爲自由人。』（上面括弧中的話，引自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知行是具歷史性的，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進行的，然而，人們每一次把歷史事業推進一步的『行』，都是使得人們得進一步地接近自由的王國，逐步地走上而『成爲自然界的主人，成爲自己的主人——成爲自由人』；人們每次從『行』中與『行』相適應並爲『行』所考驗而獲得的新『知』，總是把人類的知識推進一步，是逐步地把握了絕對真理的部分，逐漸地逼近於絕對真理。『從近代唯物論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看來，我們接近於客觀絕對真理的認識之程度，是爲歷史條件所限制的；但這種真理之存在，以及我們不斷逼近這種真理的事實，却是沒有限制的。畫像的一般外觀，是爲歷史條件所限制的，但畫像中反映出客觀存在的模型，却是無條件的真實。所謂歷史條件的限制，就是說，在那種狀況之下，我們對於事物本質的認識，着着進步。例如，煤油質中的阿力柴林的『發現』或原子中電子結構的『發現』，是爲歷史的條件所限制的；但是，每一種這樣的發現，是『絕對客觀的認識』之前進一步，却是無條件的，總言之，一切意識形態，都爲歷史所限制；但一切科學的理論（與宗教迥異）都有客觀真理即絕對的自然與之相呼應，這却是無條件的真實。』（列寧）所以，或者把人類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知行給以無限制的誇大（如一



般守舊派所最露骨地表現的，那是不對的；或者看不見人類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知行之逐步的進步意義和進步作用，而一概加以抹煞，那又是極荒唐的。

人類的知行是歷史地朝向着『自由的王國』這自由的王國，就是沒有剝削和奴役的大同共產主義社會，在那自由的王國中，人類的知行，將得到一個有如『海闊縱魚躍，天空任鳥飛』的自由新天地（雖則魚躍在大海和鳥飛在天空，還是要為一定的海面和一定的天空界線所限制）在那自由的王國中，人類的知行不是就中止不前了，恰恰相反，那裏人類的知行，將更開足馬力，大踏步地突飛猛進；同時，那時人類的知行，也將更表現了合一。

知行是歷史的，同時人類的知行，又必要經過歷史的考驗。人類的知行的是否正確，經過歷史的考驗，就完全被證明出來。在清末，有人想經過君主立憲的改良道路去『維新』中國，這種人咒咀革命，認為革命足以召滅亡和瓜分之禍；然而歷史事實却證明了：君主立憲的道路在中國是不可能的，而革命決不會召滅亡瓜分之禍，反之，却正是因為革命的沒有貫徹，所以就引起了帝國主義者侵略的貪婪，引起了民族災難的重疊而至。辛亥革命後，有一些革命黨認為『革命功成，革命黨消』，進行和反革命妥協，以為中國政治從此可走入太平軌道；然而，歷史事實却證明了：革命黨人和袁世凱妥協，恰是授給袁世凱以刀柄，使他得在帝國主義幫助之下來屠殺革命黨人，荼毒天下，並且使袁世凱敢放胆地去出賣民族，簽訂二十一條，鑄成『五九』的大國恥。在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鑒於革命失敗的苦痛，鑒於新俄革命的成功，於是毅然決然規定三大政策，有人被帝國主義者所煽惑，就『相驚伯有』地說：『這不是『赤化』嗎？『赤化』是會亡國的呀。』然而歷史事實却證明了：中山先生的決定是不錯的，三大政策實是救中國的門路，是實現三民主義的門路，因為自從實行三大政策而後，國民黨的革命精神大大發揚了，廣東革命根據地逐步鞏固了，革命勢力一日千里地發展了，廣東統一了，北伐得到了偉大的勝利，中國人民第一次實現了反帝的驚人大事業——把漢濁英租



界收回了。一九二七年後，有人認為要在中國實現工農代表會議的政治制度乃是『海外奇談』。然而，歷史的事實却證明了這種政治制度在中國許多地方是曾經實現了。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的一切慘痛奇禍的歷史事實又證明了以下的『知』、『行』：國共的繼續分裂，不抵抗和親日的政策，不但不能終止日寇的侵略，而且恰是無限地啓發日寇侵略的狼子野心，而救中國必要抗日，抗日必要國共合作。是的，中國革命全部的歷史，同時也就是考驗關於中國革命的知行的歷史；這一切歷史的考驗，對於我們民族今日的抗日事業，對於我們將來歷史的事業，恰就是給我們投射了引路的光明。

中山先生說：『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後知之。』在這意義說來，行是『易』的，知是『難』的。可是這『知』如不再經過『行』的考驗，這『知』就還是存疑的；而『知』如離開了『行』——如上面我們已提到過——這知就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真實還是不真實的論爭，乃是純粹經院學派的問題。』（馬克思）所以，行是知的準繩。『從生活的立場來看，實踐應當是認識論之第一根本的標準。』（列寧）這是第一。第二，人們要把『知』在『行』中實現起來，這時常不能是一帆風順或易如反掌的；這時常是要經過極艱苦的奮鬥，而有些人在這種艱苦奮鬥中有時就會表現了落伍，表現了退步。所以，『行』也本是一種艱難的歷程——特別是一切革命歷史所證明了的，更特別是中國革命的歷史所證明了的——事業愈大，艱難曲折就更多；人們的是否真『知』，並是否能為其真『知』而奮鬥（行）到底，這也是要在這『行』的艱苦歷程中考驗出來。中山先生關於辛亥革命前後的黨人，這樣地說過：辛亥前『黨人當時有奮厲無前之宏願魄力，卒能成破壞之功，而建國後則失此能力，遂致建設無成，此行與不行之效果也。』所以，『行』終是『知』的基礎的，『行』終是第一的；沒有『行』不能得『知』，沒有『行』亦不能把『知』實現。



人們從『行』中得到『知』這表現人們可能把這『知』在實際中具體地再現出來；然而『可能』的東西還不就是『真實』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轉化為真實，這首先是要依賴實踐（行）經過實踐（行）。季米特洛夫說：『只有正確的路綫是不够的。』這話也正是意味着只『知』是不够的。比如，經過國難歷史的慘痛教訓，關於『抵抗則國存，不抵抗則國亡』的真理，是為一般中國人所承認的了；關於『團結救國』的真理，是為一般中國人所承認的了；而經過蘆溝橋事件一年中抗戰的經驗，關於『必要持久戰，才能最後勝利』的真理，也是為一般中國人所承認的了。然而，只承認，只知道這些真理是不够的，而是必要在實踐中，從各方面腳踏實地，不言行相違，不放鬆一絲時間，不留一個空隙，去組織一切力量，動員一切力量，去為實現上述的全部真理而奮鬥，否則，就不能真正地克服我們亡國的危機。

所謂『行』是第一，這並不是說，『知』一定要落後於『行』，理論一定要落後於實踐。這見解是錯誤的。是的，先前的歷史是曾經這樣過了的。然而歷史的發展却已使人類能够使『知』不落後於『行』，能够依賴過去歷史的知行之積疊，提出預見，成為『先知』，以指揮歷史的前進，以指揮未來的歷史。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蘇聯馬克思主義者的農業學家會議上關於蘇聯土地政策的著名演說，這樣說過：『……尤其農村經濟方面……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理論上的思想沒有趕上實踐的進步，實踐的進步與理論的發展兩者之間有些距離，但是，理論工作不但需要趕上實踐，而且要超過它，武裝我們的實行家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奮鬥。……大家都知道，理論如果是真正的理論，它會給實行家指示方針，指明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有把握，使他們相信我們事業的勝利。』革命者不但不應在實踐中忽視理論，而且絕對必要珍重理論的學習，隨時從實踐中領會理論，並隨時用理論去指導實踐；而且絕對必要努力培養自己關於事業之理論的先見，趕上實踐趕過實踐，以便明智地領導實踐的前進，獲得革命事業的成功。『沒有革命的理論，



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這是列寧的名言，這名言就必要為每個革命者，每個共產主義者在自己的實踐工作中所永遠記取的。我們還一定要記取：『實踐工作者忽視理論的傾向，是違反列寧主義的精神的，而且對於工作也是包含着大的危險。』（斯大林）同時，我們又要了解，理論之所以能這樣地成為實踐的指導，就又因為它是歷來的實踐經驗之總和，是世界革命運動的『綜合歸納起來的經驗。』

綜合上面的一系列問題看來（『行』是『知』的基礎和準則，『知』對『行』的指導作用，『知』『行』的互相轉化，『知』『行』的歷史性，『知』『行』之受歷史的考驗，『知』應該趕上『行』並趕過『行』——這一系列的問題，）我們可以了解關於知行的合一，並且我們應該去發展知行的合一。誠然，這已不是王陽明唯心論的知行合一，而應是在近代歷史實踐的基礎上，在辯證唯物論的基礎上，集合我們先哲——從墨子經過王陽明到孫中山先生——關於知行問題的最好思想之大成，而加以新的發揮，並且是把王陽明唯心論的『知行合一』倒置過來的知行合一。



# 不知名的軍隊

林珏

致遠叔鑒：

現在您已經到上海了吧？

那天您到總司令部去了以後，他們派人到家裏來調查兩次，後來把您通行證，衣服，和我父親爲您預備的二十七元國幣一同帶到山裏去了。

昨天鄉公所送來一張條子，說總司令部替我們借付了十九元錢給叔父，四號上午您已經回上海去了。這大概是真的吧？我父親很惦記您，請快寫一封回信來！專此，敬頌

健安

尙勤謹上

讀完信，我望望致遠肥碩的面孔；他在笑着，笑的儀容中含蓄了安慰，欽敬，和愉快。

『你好不好把住在山裏那幾天的經過，講一點給我聽！』

『好的。』他爽快的答應了我。



『從無錫下車步行往蒲台走；過了草橋坪不遠，就聽見有碎屑的槍聲。太陽已經西沉了，黃澄澄的田地，好像一只大茶盤子一般，襯托在腳底下，我有一點胆怯；但是，這附近沒有旅店，也看不見村莊，甚至連行人，也都是半天遇不着一個。』

『又往前走，槍聲越來越清晰。老遠一組沒有葉的樹林子裏，露出幾間錯落的屋頂，因為在火車上我聽人家講過，說那裏的村莊平常不容易有生人走進去，所以就決意繞道連夜趕奔蒲台。』

『過了滲河天氣漸漸的沉黑了，眼前橫着一片灰茫茫的夜霧，不容易找出正確的道路，好在兩三年前那兒都是我常相往還的地方，所以心裏還覺得有些把握。這裏的莊稼，有十分之三還在田裏直立着，兩尺多高的麥莖，在胯骨上掃來掃去。我不敢快走，惟恐衝進日本兵的陣地，白送上一條性命。後來槍聲突然混亂了一陣，彈頭噲噲的撞着雲雀，我實在害怕了，就在麥田裏坐下來。』

『距離蒲台已沒有幾何路，但是周圍只有黑茫茫的一片，狗的狂吠，和槍彈運行的火線，三五個，或一連十幾個，在黑暗中互相交組着。』

『我身上漸漸給夜霧搭濕了；天空從混濁中清透出來，這時候槍聲不像先前那樣密積，不過狗的狂吠，却比先一刻來的更兇。冷風彷彿針刺一般，穿透了衣服，我從麥田裏爬起來，麥稈叢雜的拌結着，一脚踢去，堅硬碩大的麥粒，沙沙的舞落。』

『這回我有點轉向！槍聲早就停了，然而我始終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聽了再聽……等我認清方向，證明前邊確實寂靜了的時候，天色已經黎明了。』



「離蒲台還有半里多路，有兩個武裝農民，從柳叢裏鑽出來。」

「到啥地方去？」我猛然嚇了一跳，半天磨說出話來；他們就更認真的問我：「從啥地方來的？」……

「我一一回答了他們；後來由兩個農夫中的一個，把我送到尙勤家裏去。」

「尙勤全家，也都一夜沒有合眼，我到了，尙勤父親，就立刻寫一張詳細的姓名，住址，和職業的條子送到鄉公所去；天亮以後，參加作戰的武裝農民回來，才知道昨天夜裏的槍聲，是日本兵從太倉往無錫運送軍需的卡車，被山裏的中國軍隊截去了。」

「蒲台新設立一處農民識字學校，有時候也有各處來的劇團，在這裏作戲。全村有七十幾個武裝農民自衛團，和附近幾個大村莊，正式軍隊都有密切的連絡。所以縣城雖給敵人佔據一年多了，但是在蒲台這些地方，還和平時一樣，忙着冬天的莊稼，和準備保衛自己的家鄉。」

「吃過中飯，我剛剛躺下想休息休息，鄉公所就派人來把我找去。」

「鄉長是一個熟人，我進去，他正陪着兩個制服不大整齊的中國兵，在那裏談話。」

「噢，沈先生。」鄉長忙着立起來：「總司令部派遣兩位弟兄來，要請您過去談談」……

「我心裏立刻一跳，臉上泛起了兩塊紅熱。」

「不要緊，到那總司令部問一問就可以回來。」一個兵士很謙虛的說：

「你放心，沈先生，決磨意外的囉嗦，你去吧！」鄉長也從旁慫恿着。

「我們三個人從鄉公所出來，一直往東，走了四五里路，前邊橫着一條很寬的河浜，兩個兵士突然停住說：「沈先生，對不起請你受點委屈；因為道路我們不願意叫你知道，我們必得把你的眼睛蒙起來。」他倆不等我應允，竟自動手，



把我的眼睛用帶子纏上。

「又走了一段他們喊着『小心，上船啦！』我試探着往前邁一步，覺得腳底下觸着木板，就連跌帶扑的爬上去。

「水低低的打着船板，約摸有一個鐘頭，我們才止岸；這回步步漸高，道路又凹凸不平，所以常常跌交。爬過兩道山嶺，我已經滿身是汗了。

「兩個兵士常常和路上的哨兵答問口令，我心裏只有焦煩，所以一句也聽不清楚。等眼睛解開，我們已經到了一個生疏的地方：太陽也只剩半個紅紅的輪盤，燃燒在西北一角的天邊上。」

致遠吐一口唾沫，用舌頭醮醮嘴唇。

「四周全是山嶺，雖然不甚險峻，雜枝亂樹，障住了眼睛的視線……不多工夫我們就到了總司令部的所在地了；那兒已經上燈了，小房子在山谷裏羅列着，有些用樹枝新架起來的草棚，或假借兩塊石頭交叉的犄角，或利用深陷的岩穴……兵士們就在這些小棚子裏來回穿遶。

「山梁上燃着篝火，一羣大小不齊的人影在火燄的周遭蠕動。

「我被領進一個農人住宅；房間裏滿是蒸氣；油燈在北壁下一張供器桌上跳盪。桌邊上圍着七八個人。

「『沈致遠來啦！』兵士喊：

「一個滿臉鬍鬚的人，從供桌旁邊繞過來。另外那幾個人，也一齊往我臉上望一望。『沈先生，從啥地方來的？』他溫和的問：

「『上海！』我規規矩矩的立着，心窩裏總像揣着小鬼子似的跳動。

「『沈先生在上海作啥生意？』他又問我。



「從前在南市開店，打仗以後就在租界上擺布攤子。」我回答他。

「上蒲台來有啥事情呢？」他臉上稍微有點嚴肅。

「向虞尙動的家裏討債！」我心裏比以前跳的更利害。

「他欠你多少錢？」

「四十六元。」

「他問了半天，又從頭至腳把我看了一遍；才說：『你在這兒住幾天好不好？等我調查調查再派人送你回去；反正你自己也找不上路。』我知道立刻回蒲台不大容易。於是點首承應了。

「還是先前那兩個兵，把我領出來，轉過另外一個山角，前邊完全被夜霧掩沒了。」

「問我話的，那是什麼人？」我問走在右邊的那個兵士。

「參謀長！」他簡短的回答。

「總司令呢？」

「還在山裏。」

「哨兵喊問口令，兩個士兵答應着。滿山閃爍的燈火，只是看不清房子的輪廓，他們把我送到一間石穴門口，交給另外一個兵士，自己去了。」

「石穴裏只有一盞油燈，所以洞裏還異常的黑暗，我進來石壁下，早有兩個人在那裏打酣。守門的兵丟給我捆稻草，然後把穴口掩起來。」……

「第二天很早，有一隊兵，把和我住在一起的兩個人帶去，……後來我知道，那兩個人當中，一個是日本特務曹長，



一個是給敵人作翻譯的漢奸。都是前天從運輸車上打下來的，昨天參謀長親自問過三四次，然後還給日本特務曹長拍了一張小照，才送到這裏來的。

「早餐是麥米粥，有當地農民送來的鹹青菜，送飯來的時候守門的兵，還特別告訴我，少吃一點，午間有大米乾飯，這在我雖然不大起勁，但是他自己確很高興；」也許還有旁的好東西，都是日本兒子孝敬的。」他笑嘻嘻的跑出去。

「飯後我要求到外邊去曬曬太陽，兵士有的負槍去接換勤務，有些在山梁上開會，也有些和農村中的孩子們胡調，這時候在一間草房門口正有一羣婦女，在那裏聚精會神的傾聽一個兵士講話，我走近了才看出來講話的兵士，也是一個長頭髮尖調調的女人。

「兵士平均的年齡都不過二十歲的樣子，分不出來那一個是官長，或那一個是弟兄，都同樣的活潑，像一羣在遊戲的孩子似的。

「到處都聽見有人在講午間吃白米飯，一個兵說：「不知道這回日本兒子送來牙膏沒有？上次我塵分到。」又一個說：「也許還有牛肉罐頭。」孩子也時常插嘴說：「有香烟，你可分給我一包哇？」我羨慕他們，但是我抑止不住我心裏的煩燥。

「你看我們這兒好不好？」守門的兵士問我：

「「唉，好。」我沒有一點精神回答他。

「這裏的住戶很少，差不多到處都是士兵，就是僅有的農民，也都雜在士兵中，不仔細看，不容易分辨出來。

「當時我看見有兩個男人和四個少年婦女，被送到一個農民的家裏來，後來我聽兵士們說，他們是村長的親戚，從槍坪逃來的，還說那四個女人中有兩個都被敵人污辱過。



「午餐的確是大米飯，只是沒有牛肉，也沒有更好的小菜，就是白米飯，也多少帶點烟火味了。」

「下午箭橋送來兩個間諜，許多人圍在一間山洞裏問口供，問完以後又送到我住的這間山洞裏來；我心裏非常難過，同時怕間諜好像比怕見那一臉鬍鬚的參謀長猶甚一倍。」

「晚上多虧把我掉換到一個草棚子裏去，這兒是政治工作隊的臨時宿舍，白天他們全到附近各村莊上工作去了，晚上回來的很晚，初見有點生疏；不到一刻鐘大家就互相接談起來。他們興奮的講給我不少關於工作的軼事，也三番兩次的勸我跟他們一道工作，他們很需要能夠寫鋼板字的人。」

「草棚裏夜間比山洞裏更冷，我本來身體就有點支撐不住，在草棚裏睡了一夜，第二天簡直不能動彈了。腰腿痛，頭漲得像一塊硬鉛一樣，心裏煩燥的要命，甚至我覺得這回恐怕到了我生命的結束。」

「參謀長午間來看看我，後來派四個弟兄把我送到後方醫院裏去。」

「周圍盡是錯落山頂，醫院在兩山的峽谷上，並排四個黧黑的山洞，雖然是白天洞內也需要點着油燈，洞內有六個傷兵，和一個病人，護士都是十七八歲的女學生，她們非常慇懃和靄。醫院設備很簡單，每人只有一只竹床，和一條不大清爽的棉被。入院後大夫給我診視以後，配了一茶杯咖啡色的藥水，又另外借來兩條被，叫我發汗……晚上總司令到病院裏來慰問，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個子，身上的軍服已經辨不正確的顏色了。他先看看傷兵，然後到我的床邊。「您是沈先生嗎？」他非常和氣，摸摸我的頭說：「靜養幾天吧，你來的時候很不好，正與日本運輸車同時，所以開頭人家都拿你當間諜。」起初我有點討厭他，他走後護士告訴我他就是總司令，我又覺得他可親了。」

「過了兩天我的身體已經復元；但是送我回去的消息還一點沒有。我決定找總司令去問問，出了醫院，第二個山洞是電報間，老遠就聽見嗶嗶的收發報機的響聲，這時候正遇見士兵往這裏運送子彈箱，箱上都印有昭和的年號，我



猜想，這一定是日本軍閥送來的禮物。

「總司令住在另外一個山洞上，那裏堆着山似的子彈，和槍械，士兵們在來回穿邊！」

「你幹什麼？」一個兵問我。

「我找總司令！」我回答：

「他指給我，坐在草廩上的一羣人；我跑過去，總司令忙着站起來，「沈先生，你已經好了？」他笑着問我：

「我請他派人送我回去；他說：「你在這兒幫我一點忙吧，回去路上也很困難，這個年月，能為國家盡一分力量，死了心裏也太平。」

「我家裏老少七八口，全靠我一個人維持生活，請總司令幫助我！」我哀求他；後來他尋思了一會兒說：「好吧，你先在病院裏等一等；那末你還到不到蒲台去呢？」……

「去呀，他們已經給我領錢啦，要不到錢我回去全家也得挨餓。」

「好吧！」他又坐在草廩上和旁人搭訕去了。

「我回到醫院，我的床位已經給新送來的傷兵佔據了；他們是昨天晚上在公路上襲擊敵人的卡車而受傷的，一共四個人，一個傷重的，今天早晨在山前死掉了。」

「下午有一個兵來把我領出來，天空長着很厚的雲彩，山裏霧氣很大；他照舊把我眼睛蒙起來；和來的時候一樣，又不知道跌了多少交，坐了差不多有兩三個鐘點的船，也爬過幾條不高的小嶺，後來在一個橋邊上，他把我的眼睛解開，交給我四十六元國幣和一張通行證：

「前邊就是蘇州，你快走進城還能來得及。」送我的兵回去了。



『今天接到尙勤的信才知道軍隊裏，替他還了我十九元錢；但是我始終不知道這個軍隊的名字。』我噙住了口，又用舌尖舔嘴唇。

我彷彿失掉知覺，好像我看見了一羣虎生生的戰士，在山野間蠕動。  
眼球上熱刺刺的有淚了……。



## 編後記

第一卷總算結束了。編者在這六個月內，差不多完全限於「苦戰」狀態中，真所謂「筋疲力竭」而又「焦頭爛額」。現在想從第二卷起，關於本刊編輯體例，略有改變。大致分欄如下：

- (一) 一月展望 評述一月間國內外時事動向，並予以正確的分析。
- (二) 專論 討論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民運等等的重要問題。
- (三) 學術研究 凡關於文化思想的研究，文藝理論的探討的文字，皆包括之。
- (四) 譯述 精選各國重要著作或全譯或摘譯，使讀者明白世界的一般動向。
- (五) 作品
- (六) 時論選輯及其他

總之，過去六期，編者深深感到編輯方面，不够活潑，嗣後想從增加讀者的趣味方面入手，但也不放棄過去那種嚴謹的立場。

W 二月十一日



# 論 自 由

公 論 叢 書 第 六 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日出版

全書十二輯每月十日出版一輯

定價每冊三角預定半年六輯

一元六角全年十二輯三元

編 輯 者 公 論 社

出 版 者 譯 報 圖 書 部

發 行 處 譯 報 管 理 處

愛多亞路一一七號

經 售 者 本 埠 各 大 書 店



## 本刊第三期 目錄

思想家的魯迅

中國政治外交的一般形勢

十月革命與孫中山先生

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際

慕尼黑協定成立後的國際形勢

世界作家的反法西斯陣線

戰爭恐慌下之世界金準備現狀

日本的國民儲蓄與公債消化問題

日本最近經濟狀況的分析

近代歐洲政治演變之動力

政黨論

風裏雨裏

時論選輯(五篇)

編後記

## 第四期 目錄

青年的任務

中國統一論

保衛大西北

德國國社黨反猶運動的透視

希特勒的歐洲

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

蘇聯內戰的經驗和教訓

時論選輯(五篇)

戰時的輿論與宣傳

論拉丁化中國文字

紀念王嘉音君

紆迴集

楊家港

編後記

## 第五期 目錄

中國抗戰的迴顧與前瞻

偽滿軍反正問題的透視及展望

一九三八年歐洲

目前國際形勢的總檢討

美國中立法之演進與前瞻

德意助日侵華真相

日本戰費的過去與將來

舉債增稅比較論

歐局的過去與將來

時論選輯(七篇)

論集體生活

關於「藝術大眾化」

破碎的商籟詩

外交界中之小說家

一個結核菌裂開了一朵血花

編後記